


中国近代史

下 册



上海师范大学
历史系中国史组编

目 录

第七章 甲午中日战争

第一节 日本军国主义蓄谋侵略朝鲜、中国和清政府的避战求和	1
一、日本军国主义蓄谋侵略朝鲜和中国	1
二、清政府的腐朽和避战求和	5
第二节 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	8
一、日本不宣而战	8
二、平壤撤退和黄海大战	11
三、日军侵入我国国境。清军全面溃败和人民的抗日斗争	14
第三节 清政府卑屈求和与《马关条约》的签订	19
一、清政府的求和活动。美国帮助日本讹诈中国	19
二、《马关条约》的签订及其严重后果	22
三、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清政府赎回辽东半岛	24
第四节 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割占台湾省的斗争和资产阶级对清政府战败投降的反	

响	26
一、中国人民保卫神圣领土台湾省的抗日 武装斗争	26
二、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和广州起义	32
三、康有为及其发起的“公车上书”	36
第八章 戊戌变法	
第一节 甲午战后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	41
一、〈中俄密约〉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 起划分势力范围的前奏	41
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	44
三、美帝国主义的“门户开放”政策	50
第二节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和 发展	52
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发展和维新 运动的兴起	52
二、改良主义的政治团体和报刊	64
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高涨和封建 顽固势力的反扑	67
第三节 戊戌变法及其失败	72
一、百日维新	72
二、顽固派发动政变	75
三、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	80

第九章 义和团运动

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83
------------------------	----

一、人民群众反侵略、反洋教斗争的高涨·····	83
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85
三、义和团在斗争中发展壮大·····	92
四、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	95
第二节 八国联军的武装进攻和义和团的英勇	
反抗 ·····	98
一、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	98
二、清政府的宣战骗局·····	100
三、帝国主义策划下的“东南互保”·····	101
四、义和团英勇抗击八国联军·····	104
五、八国联军在京、津地区的野蛮暴行·····	109
六、沙俄强占我国东北和它在东北的骇人 暴行·····	111
第三节 义和团运动期间资产阶级各派系的活	
动 ·····	115
一、改良派对义和团的攻击和自立军起事·····	115
二、兴中会的惠州起义·····	117
第四节 <辛丑条约>的签订。义和团运动的伟	
大历史意义 ·····	118
一、<辛丑条约>的签订·····	118
二、义和团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	122

第十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 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一步加深 ·····	126
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全面深入·····	126
二、列强在中国的角逐和日俄战争·····	130

三、英国对西藏的侵略	134
四、适应帝国主义需要的“维新新政”	135
第二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	138
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138
二、资产阶级爱国民主运动的勃兴和革命团体的相继建立	141
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反孔宣传	146
第三节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领导下的政治思想斗争和武装起义	158
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	158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162
三、同盟会领导和影响下的各地武装起义	166
第四节 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蓬勃发展	169
一、帝国主义和清政府对人民加紧压榨	169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	171
三、义和团余众举起“扫清灭洋”旗帜继续斗争	173
四、南方诸省的会党起义和大江南北的抗捐抗税斗争	174
第十一章 辛亥革命和清王朝的覆灭	
第一节 清朝反动统治的危机	177
一、“预备立宪”的骗局和清朝统治的危机	177

二、民主革命潮流的高涨	183
三、保路运动	186
第二节 武昌起义和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188
一、武昌起义	188
二、全国革命高潮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分 化瓦解	193
三、各地反动势力的篡权活动	197
第三节 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反扑和南京临时政 府成立	199
一、帝国主义干涉辛亥革命的罪恶活动	199
二、袁世凯东山再起	203
三、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	207
第四节 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果实和辛亥革命 的失败	210
一、南北议和与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果实	210
二、临时政府北迁和辛亥革命的失败	216
三、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217

第十二章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酝酿

第一节 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反袁的白朗起义 ..	222
一、资产阶级对袁世凯政权的幻想和民国 初年的政党组合	222
二、袁世凯向资产阶级民主势力的进攻和 “二次革命”	225

三、白朗领导的农民反袁武装起义	229
四、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最后破灭	230
第二节 俄、英对我国边疆的侵略和日本灭亡	
中国的“二十一条”	233
一、沙俄对我国北部和西部的侵略	233
二、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和西姆拉会议	239
三、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山东及其灭亡中国 的“二十一条”	241
第三节 中外反动派尊孔大合唱和袁世凯复辟	
帝制丑剧	244
一、中外反动派尊孔大合唱	244
二、袁世凯的帝制丑剧	251
三、护国运动	253
第四节 军阀纷争和护法战争	255
一、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纷争	255
二、张勋复辟	259
三、护法战争和军阀的激烈争夺	263
第五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酝酿	267
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267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斗争的发 展	271
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其发展	273
附地图	279

第七章

甲午中日战争

第一节 日本军国主义蓄谋侵略朝鲜、 中国和清政府的避战求和

一、日本军国主义蓄谋侵略朝鲜和中国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残余的封建经济及天皇制的国家机构结合在一起的。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保留着半封建土地制度。资本家或由旧式封建特权商人脱胎而来，或是兼实行半封建剥削的大地主。以皇族为代表的贵族阶级，一面继续占有大量土地，一面投资金融企业，拥有巨额股票。这种与封建残余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制度，对本国的农民、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压榨，致使国内市场特别狭窄。日本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为了用对外扩张争夺殖民地来解决资本主义发展同国内市场狭小的矛盾，便使日本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过程中，天皇制政权起着重要的作用。明治政府以武力和扩张作为最高国策，叫嚣“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它还提出“富国强兵”的口号。军阀头子山县有朋公然叫嚷：“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大资产

阶级、大地主阶级用武力向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日本在逐渐形成为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的过程中，表现出特别野蛮和强烈的侵略性。它的狂妄计划是：第一期征服我国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我国东北和蒙古，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又把征服朝鲜，作为侵略中国大陆政策的基地。

明治维新之初，日本侵略者立即实行他们的“征台论”。出兵侵略我国台湾，吞并琉球。一八七五年琉球的吞并，鼓舞了它进一步侵略朝鲜和中国大陆的野心。同年，日本军舰侵入朝鲜的汉江，挑起事端，炮击江华岛。一八七六年，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攫取了开仁川、元山为商埠，日本商品得免纳关税，日本纸币得在朝鲜市场流通，日本船只可在朝鲜沿海自由航行和测量，以及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权利，破坏了朝鲜的主权。从此，日本开始了侵吞朝鲜的罪恶活动。

《江华条约》后，日本侵略势力从各方面向朝鲜渗透，对朝鲜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和搜括。一八八二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仁川条约》，又取得很多侵略权益。一八八四年，法国挑起了中法战争，日本侵略者也蠢蠢欲动，利用清政府的困难处境，出兵朝鲜，对清政府进行要挟。第二年，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关于朝鲜问题的《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今后朝鲜遇有事故，中日两国如要派兵，应互相行文通知。这就埋下了中日战争的伏线。一八八七年，日本参谋本部拟定了一个狂妄的所谓《征讨清国策》。它计划在侵华战争发动后，日军以大部分兵力进攻北京，以部分兵力占领长江流域的战略要地来阻止江南清军北上，配合对北

京的进攻。日本军国主义者还妄想在战后将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辽宁省盖平县以南地区、山东登州府（山东半岛）、舟山群岛、台湾、澎湖列岛和长江两岸十里左右之地，划归日本版图。同时，将中国其余地方，分割为东北、江南、华北、青藏、内外蒙、甘肃、准噶尔等几个小国，分别属于日本。这个计划还规定，“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发动进攻”。

为了制造对外扩张的借口，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一八九〇年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抛出了所谓“保护利益线”的侵略理论。他叫嚣什么日本的“国家独立自主之道，其途有二：第一，守卫主权线；第二，保护利益线。主权线，指国之疆域；利益线，指与主权的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①这就是说，只要日本侵略者宣布，某一国家、某一地区与它的利益有关，它就可以在“保护利益线”的名义下，任意加以侵犯和占领。这是彻头彻尾的强盗逻辑！日本军国主义正是运用这套强盗逻辑，把朝鲜和我国的东北、台湾等，都说成是在日本“利益线”的范围内，是所谓日本的“生命线”，在国内大肆煽动战争狂热。

日本政府以朝鲜、中国为侵略对象，加紧扩军备战，到一八九三年，日本已拥有一支现役为六万三千多人，预备役为二十五万多人的新式陆军部队，和一支六万多吨位舰只的新式海军。一八九三年四月，明治政府成立一个叫做“经办出师准备委员会”，五月，决定成立一个直属天皇的战时大本营，以筹划和指挥日本侵略军的作战。同时，训练了大批“浪

① 大山樾《山县有朋的意见书》第二〇三页。

人”，组织侵略性团体，不断潜入中国、朝鲜进行间谍活动。日本间谍窃取了清政府各方面的情报，对清军内部情况了如指掌。在战争发生之前，日本侵略者已绘成包括朝鲜和我国东北三省、渤海湾在内的军用地形详图，上面标明这些地区的每一座小丘和每一条道路。有一个叫做波纳尔的欧洲人，曾经获得这份地图。他后来十分肯定地指出：这份地图本身就是日本早已蓄谋侵略中国的证据。

日本在扩军备战的同时，加紧外交活动，争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它的支持，特别是美国的支持。甲午战争前，英国和沙俄处心积虑地不断从南北两面控制和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德国，在工业方面迅速发展，至八十年代，美国超过了英国而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位，德国超过了法国成为第三位。美、英、德、法和沙俄这几个侵略强盗，都妄图蚕食鲸吞中国。但在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美国正忙于控制拉丁美洲，准备掠夺夏威夷和菲律宾，然后再大规模地侵略中国，所以它一面以伪善面目在中国出现，一面在幕后积极扶植日本发动一场侵华战争，用亚洲人打亚洲人，以达到它侵略中国的狂妄野心。在日本方面，它虽野心勃勃，急于对外扩张侵略，但国内资源贫乏，无论在财政上或军事上，都还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因此，日本政府采取了一面侵略、一面从属的方针，即是一面对中国和朝鲜加紧进行侵略，一面依靠比它强大的西方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作为后盾。美国正感无法分身与英、俄等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便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支持日本，它还派出军事专家协助日本总司令部制订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作战计划。日本把一切准备就绪，伺机挑起一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

二、清政府的腐朽和避战求和

自一八八九年西太后玩弄的归政给光绪帝的把戏以后，在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帝党和后党两股官僚势力。这时，面对着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严重局势，他们分成“主战”与“主和”两派。帝党主战，主要是想在战争中削弱后党的权力；后党主和，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后党、帝党在和战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两党争权的激化。帝党虽然主战，但对如何战胜日本侵略者，并无具体办法，光绪帝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等主战派没有实权，只能利用皇帝的上谕和朝野的舆论，督促和迫使李鸿章出兵作战。

李鸿章是后党中的实力分子，他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要职，有一支全付新式装备的反革命武装——淮军，和一支实力相当雄厚的北洋舰队。他的对外政策，一贯主张避战求和、屈膝投降，借以保存实力，即为他个人保持政治资本，为反动统治阶级保全镇压国内人民革命的力量。一八九四年正值西太后六十岁，这个清政府的大头子，为了粉饰太平，广受贿赂，准备大摆排场来庆祝自己的生日，更不愿打仗，对日本侵略朝鲜的问题，希望从速妥协了结。她警告主战派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①西太后的态度，使李鸿章在外交上更加有恃无恐地放手推行妥协投降的卖国主义路线。

因此，尽管当时国内舆论，和在朝鲜的大部分清军将领，都要求清政府备战增援，抵抗侵略，驱逐日本侵略势力出朝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二二二页。

鲜，但是李鸿章一概置之不理。他一意向欧美各国乞求“调停”，梦想第三者会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军，在军事上不认真备战，消极等待，被动挨打。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于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利害关系最大的是俄、英两国。六月十日，日本出兵朝鲜，和沙俄向太平洋扩张的政策，发生了尖锐的利害冲突。李鸿章素有“日忌英不如畏俄”的看法，因而在六月二十日请求沙俄驻北京公使喀西尼出面“调停”，这正合沙皇政府的侵略意图，沙皇政府电令喀西尼速即转告李鸿章说：“俄、韩近邻，断不容日妄行干预”。李鸿章得到喀西尼的口头保证后，便电令清政府驻朝鲜的代表袁世凯“静待，勿妄动”；又电令在朝鲜的清军提督叶志超“驻牙静守，切勿多事”，“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

“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屈，切记勿忘。”^① 驻朝清军在李鸿章的指示下，一直屯扎在汉城以南二百余里的牙山，不作丝毫作战准备，坐待日军的进攻。李鸿章一味幻想沙俄进行有利于中国的“调停”，沙俄虽欲借机扩大在中国和朝鲜的侵略势力，但它当时在远东的最大敌手是英国，同时鉴于它在远东的兵力还较薄弱，西伯利亚铁路刚在修建，所以，当六月下旬，沙俄驻日公使希特罗渥两次与日政府接触，得到日本“绝不想占有朝鲜”的保证后，便停止进行“调停”，而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七月九日，喀西尼根据沙皇政府的指示告知李鸿章，说俄国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本撤兵，“未使用兵力强劝日人”。^②

① 以上引文均见李鸿章：《电稿》卷十五、十六。

② 李鸿章：《电稿》卷十六。

李鸿章看到依靠沙俄的希望快要破灭，便又立即乞求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他幻想取得英国的实力援助，竟要求英国派遣舰队到日本横滨，迫使日本政府撤兵。当时英国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十分矛盾。英国起初不愿意日本发动战争，怕战争损害到它在中国的侵略利益，特别是担心沙俄乘机出兵干涉，扩张侵略势力，因此愿意出面“调停”。但是，由于英、俄的矛盾，英国也想支持日本发动战争，以阻挡沙俄势力在远东的扩张。这样，英国公使先是力劝李鸿章以“整理朝鲜内政”及“同保该国土地勿令他人占据”为谈判基础，速与日本妥协。日本则故意提出难堪的条件，暗示拒绝调停。英国知道日本政府决心要战，为了把日本拉到自己方面来，使它与沙俄对立，便于七月十六日，同意改订英日条约，宣布五年以后废除过去签订的不利于日本的英日条约。英外相在签字仪式上致辞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有利”，表示完全支持日本。日本政府为了等待改订英日条约和争取作战的充分准备时间，在中日谈判朝鲜问题上，故意玩弄“整顿朝鲜内政”的把戏，以拖延时日。当改订英日条约签字后的第三天，即七月十九日，日本大本营便命令其舰队在七月二十三日以后可以自由行动，准备开始偷袭。

利用英、俄矛盾，争取英、俄两国“中立”，是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而清政府一味依赖英、俄制止日本侵略，妄想达到“力保和局”的目的，结果全成泡影。李鸿章也屡向美、德等国表示过求助，同样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第二节 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

一、日本不宣而战

一八九四年初，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提出“逐灭夷倭”、“尽灭权贵”的口号，展开了反对本国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特别是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日本政府却阴谋借朝鲜农民战争的时机来挑动侵略战争，竭力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镇压农民起义，以便为自己出兵制造借口，把清政府拖进它预设的战争陷阱。六月二日，日驻朝公使馆临时代办杉村濬，派译员向清政府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说：“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①次日，杉村面晤袁，又表示希望清政府出兵帮助朝鲜政府，镇压农民起义。袁世凯向李鸿章报告说：“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②李鸿章对日本的保证深信不疑，六月四日，应朝鲜政府请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二千余人前往朝鲜，并按一八八五年《中日天津条约》规定，通知了日本政府。这样，清政府就上了日本侵略者的圈套。

日本政府在玩弄外交阴谋的同时，即以护送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回任和“保护使馆、商民”为名，派海军陆战队四百余人侵入朝鲜汉城，并且继续增兵。到六月底，进入朝鲜的

① 李鸿章，〈电稿〉卷十五。

② 同上书。

日本侵略军已达一万人左右，兵力远在清政府所派遣的军队之上。

李鸿章接到日本出兵的消息，大为慌张，急忙要求日本不可出兵过多，勿入朝鲜内地。日本政府对此要求断然拒绝，并无理地提出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清政府拒绝接受，提出双方立即从朝鲜撤兵。日本政府横蛮地声称决不撤兵，并作好了突然袭击的准备。李鸿章在舆论压力下不能不有所动作。他派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丰伸阿等四军，共二十九营一万四千余人渡鸭绿江，开赴平壤，另雇英轮“高陞”号等三船载运陆军二千人增援牙山驻军。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舰队在牙山口外袭击中国军舰，悍然挑起了侵略战争。这天早上，中国军舰“济远”号和“广乙”号由牙山驶回天津，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突然遭到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等的袭击。日本“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七月二十五日，……在丰岛海面上远远望见清国军舰‘济远’号和‘广乙’号。即时下战斗命令。七点五十五分开战，五分多钟后，因被炮烟掩盖，只能间断看见敌舰，加以炮击而已”。^①明白地招供了甲午战争是由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开始的。

中国军舰立即进行自卫还击。“广乙”号船身小，战斗力弱，开仗后不久又受了重伤，退出了战斗，后来驶撞朝鲜海岸浅滩焚毁。“济远”号是铁甲舰，吨位大，火力较强，舰上的士兵和某些将领，作战也很英勇，他们和优势的敌舰进行猛烈搏斗。但是管带（舰长）方伯谦是个胆小鬼，在战斗

^① 《东乡平八郎击沉高陞轮日记》，《中日战争》资料丛刊（六），第三十页。

的紧要关头，躲在船舱内铁甲最厚的地方，下令逃跑。当时，清政府雇用的英国商船“高陞”号和自备的运输船“操江”号，正在载运陆军一千多名和各种器材弹药驶来，“济远”号本有护航责任，但方伯谦为了逃命，竟丢下运输船不管。日本巡洋舰“吉野”见“济远”逃跑，便衔尾穷追，方伯谦又命令挂白旗投降。舰上士兵对方伯谦的可耻行为极为愤怒，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等发尾炮打击敌舰，连发四炮，命中三炮，敌舰“吉野”号受创，不敢再行追击，“济远”号驶回旅顺。方伯谦完全隐瞒自己临阵脱逃的罪行，谎报战功，得赏银二千两。

由于方伯谦的逃跑，使“高陞”号和“操江”号两艘运输船失去保护，结果“操江”号被敌舰俘去。敌舰“浪速”号又强迫“高陞”号投降，船上的中国士兵坚决不从，表示“宁愿死在这里，不愿当俘虏”。敌舰向“高陞”号连放鱼雷和大炮，“高陞”号上的中国士兵用步枪英勇还击，直至船沉，一千人左右壮烈牺牲。“高陞”号沉没时，日本侵略者还用大炮、机枪轰击水里的和上了救生艇的中国士兵。当时在“高陞”号上的德国人汉纳根曾目睹和记述了日军“向这只正在沉没的船上的人开起火来”的凶残行径。^①日军在丰岛偷袭，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

日军在牙山口外发动海上突然袭击的同一天，汉城日军也向南出动，准备偷袭中国牙山驻军。由于朝鲜人民采取种种办法牵制，日军进军缓慢，清军得有所准备。聂士成率军

^① 《汉纳根大尉关于高陞轮被日军舰击沉之证言》，《中日战争》资料丛刊（六），第十九—二十二页。

扼守牙山东北五十里的的成欢，叶志超也率军离牙山到东南方的公州为后援。七月二十八日晚，随军武备学堂学生于光炘、周宪章等自请率众埋伏于附近村庄，等到日军到达，予以狙击，打死日军多名，于等英勇牺牲。二十九日，日军进攻成欢，叶志超却不去支援。聂士成因敌众我寡，率军突围，向公州撤退。叶志超又放弃公州，绕道北逃平壤，聂亦跟踪北走。

李鸿章在日军发动袭击后还不愿应战，以为被日军击沉的“高陞”轮是向英商租用的，幻想英国出来干涉。在这个幻想破灭后，清政府才于八月一日对日宣战，日本也在这一天向清政府宣战。

二、平壤撤退和黄海大战

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丰伸阿等四军到平壤与叶志超、聂士成从公州北撤的部队会合，清廷竟以叶志超为清军统帅。叶志超只知尅扣军饷，置酒高会，不作战斗准备。九月初，日军万余人分途北犯，直逼平壤城。叶志超企图弃城逃跑，被左宝贵强力制止。九月十五日，日军攻平壤城，左宝贵登北城指挥士兵奋勇杀敌，予敌军以重大杀伤，在激战中左宝贵不幸中弹牺牲。马、卫两部士兵也拚命抗敌，一再击退东西两路日军。但主将叶志超贪生怕死，在紧要关头，竟下令全军撤退。当夜，叶志超首先率军趁暴风雨仓皇逃出平壤城，狂奔五百余里，渡鸭绿江退入中国境内，朝鲜全境落入敌手。日军在朝鲜大肆烧杀掳掠，许多城市和乡村夷为平地，对朝鲜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战争，是直接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因此，必然激起两国人民的坚决抵抗。清军进入朝鲜时，曾受到朝鲜人民的欢迎和支

持。大军过处，朝鲜人民“献壶餐，让卢舍”，送“蔬菜、柴草”，帮助烧饭，扶养伤员^①，并将日军活动情况报告给清军。在平壤战役中，朝鲜人民自动组织起来，拿起锄头、扁担和刀矛，抗击日军，如果清军不是那样腐朽，是可以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当清军撤出朝鲜后，一些未撤走的中国士兵，与朝鲜人民并肩战斗，打击日本侵略者。中、朝两国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用鲜血结成的友谊，是永远值得纪念的。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说过：“朝中两国人民在悠久的历史年月中共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曾互相给以帮助。特别是通过反对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共同斗争，朝中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进一步得到了加强。”^②

平壤撤退后的第二天，日本侵略者就在鸭绿江口的黄海海面上，挑起了一场激烈的海战。

当九月初，平壤告急，清政府从海道派援军到鸭绿江边的大东沟。十二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出动护航，于十六日抵大东沟。护航任务完成后，舰队准备于十七日返航旅顺。北洋舰队的行动早由美国人秘密通知日本。十七日上午，日本舰队十二艘全挂美国旗，从西南方远处海面出现，中午驶近中国舰队时，改悬日本旗。这时，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与舰长刘步蟾等议定，以“分段纵列”的阵势，起锚应战。

在这次海战中，中、日双方的舰队只数和总吨位数大体

① 聂士成：《东征日记》，《中日战争》资料丛刊（六），第十一——十二页。

② 《朝中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金日成选集》第三五一页。

相等，在装备上也各有长短。但由于北洋海军在李鸿章的妥协投降和失败主义路线指导下，平日操练不熟，纪律松弛，内部矛盾重重，暮气很深，将领多畏缩怕死，弹药奇缺，甚至炮弹和大炮对不上口径，作战准备极为不足。而敌舰队准备充分，摆好阵势，进行了快速的炮攻。中国舰队迎战时，刘步蟾胆怯惧战，企图让自己所乘的旗舰居中，躲避炮火，故意发错信号，致使队形混乱，接着，丁汝昌在旗舰飞桥上跌落，身受重伤，全舰队失去指挥。“济远”号管带方伯谦重演丰岛之战的故技，临阵脱逃，匆忙中撞沉已负重伤的“扬威”号。“广甲”号管带吴敬荣和方伯谦是一路货色，在仓皇逃跑时，恐怕敌舰追赶，沿海岸浅滩行驶，中途搁浅，吴敬荣弃船登陆逃命。与刘步蟾、方伯谦、吴敬荣等一小撮败类相反，广大士兵和部分将领是坚决抗战的。在战斗中，“致远”号勇往直前，奋力杀敌中弹最多，船身已严重倾斜，弹药也将用尽。在这危急时刻，管带邓世昌认为日本舰队中的“吉野”号是主力，如果将“吉野”号击沉，有可能打击日军气焰而取胜，下令开足马力，向“吉野”号猛撞过去，准备和它同归于尽。不幸为“吉野”放出的鱼雷击中，邓世昌同全船二百五十二人壮烈牺牲。旗舰“定远”号上的士兵，也英勇沉着作战，以猛烈准确的炮火轰击敌舰，有的炮手身负重伤，仍坚守岗位，裹伤再战。广大士兵奋勇战斗，屡创敌舰。记载甲午战争的日方著作《日清战争实记》中说：“三点三十分，‘镇远’所发的三十公分半巨弹两枚，命中了我旗舰‘松岛’下甲板炮台的第四号炮，放在近旁的十二公分炮的装药因此爆发，霹雳一声，舰舳倾斜了五度，冒上白烟，四顾黯澹。炮台指挥官海军大尉志摩清直以下，死伤达一百余人，

死尸山积，血流满船，而且火灾大作，更加困难”。①“吉野”号也受重伤，完全失去战斗力。敌舰“赤城”号被击毁桥头和前部下甲板，敌舰长以下死伤甚众，其他敌舰如“扶桑”、“西京”丸等也都负重伤，几乎沉没。一个亲身经历这次海战的英人泰莱在他的《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写道：中国军舰上的“巨炮喷着火焰和硝烟……水兵们严肃、乐观，他们当中丝毫没有恐惧形迹。有一个炮手在我去巡视的时候受了很重的创伤，……但当我再来巡视这门炮时，这个受伤的人——裹着绷带，已局部残废——却正在专心致力地作战。”②在黄海大战中，充分表现了我国广大爱国士兵敢于同敌人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黄海海战激战五个小时，中、日双方舰队各有损失，中国的损失略大于日本，还是完全可以继续作战的。但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有意夸大战败程度，强调中国舰队不及日本，采取“保船避战”方针，命令全部船舰藏入威海卫，不准出击。从此，把黄海的制海权拱手交给了日本。

三、日军侵入我国国境。清军全面溃败和人民的抗日斗争

平壤、黄海战役后，日本侵略军编成两军，于十月下旬分两路向我国国境进犯。当时，清军集重兵七十余营于九连城一带防守，除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一军外，其余各军均归淮军将领四川提督宋庆指挥。宋庆同叶志超一样怯懦无能。十月二十四日，日本侵略军二、三十人探水试渡，放一排枪，依克唐阿即率所部十二营溃逃，奔向宽甸。日军向九连城进

① 《中日战争》资料丛刊（一），第二四一页。

② 参见《中日战争》资料丛刊（六），第五十页。

犯，仅聂士成军在虎山进行了抵抗，宋庆率部自九连城奔向凤凰城，接着又弃凤凰城奔摩天岭。守安东（今丹东）的丰伸阿部是有名的“鸭蛋兵”，敌未到已逃往岫岩州。九连城、安东、凤凰城，大东沟、岫岩州、海城等地先后为日军占领。

与清军的溃败相反，东北人民自发组织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日军进犯岫岩州时，岫岩州东南桂花岭一带数十村的人民立即武装起来，迎头痛击来犯之敌，用抬枪毙敌无数，使敌军不敢轻进。敌人扑犯辽阳时，也遭到当地人民的痛打。据《辽阳县志》记载：日军陷岫岩州后，抄小路犯辽阳，吉洞峪练总徐珍集乡勇各持抬枪、鸟枪在峪南韩家岭、宋家岭等处扼守。日兵数千人来窥，甫上岭，辄击之，毙数人，遂不敢进。各乡勇昼张旗帜，夜燃火把，出没往来，虚实兼用。”^①一天，日军数百骑来犯，预先埋伏的乡勇，突然开枪狙击，敌人被迫逃跑。相持达一月之久，日本侵略军终不能得逞。自宽甸、长甸、安东、凤凰城等地相继失陷后，东边道一带人民陆续组织了十个民团，每团有勇士一、二千人，他们“均同深义愤，愿作前驱”。一八九五年一月清军反攻海城时，东边道民团认为宽甸、凤凰城一带是日本侵略军的后路，决定利用前线反攻的形势，出击敌人，钳制其后路。二月二十五日，民团向宽甸进发，在欢喜岭等地，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遭遇战，杀死日军七、八十人，缴获枪械物品多件。日军逃奔宽甸，民团乘胜追击，又击毙日军数十名，随即收复宽甸城。三月一日，民团乘胜攻长甸，击毙侵略军八十余名，收复了长甸。这些胜利，充分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战争的伟

① 《辽阳县志》第一卷，《中日战争》资料丛刊（六），第三一四页。

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①

在一路日军进犯九连城等地的同时，另一路则由海道进窥大连、旅顺。十月二十四日，日军在金州北面花园港登陆，偷运炮马辎重十二天之久，清军竟坐视不问。十一月初，日军进逼金州，守将徐邦道鉴于金州是旅顺的门户，金州一失，旅顺难保，所以向大连守将赵怀益提出建议，分兵扼守金州。赵怀益是有名的“赵不打”，拒绝徐的建议。徐邦道率少数士兵自行去金州，赵的部下要求随徐前往，赵怀益竟气急败坏地说：“我奉中堂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②，不准士兵同去。金州告急，徐邦道再次向赵怀益求援，赵仍不应，却亲自在码头督兵勇搬运行李准备逃跑。金州、大连先后失守，大连有新式炮台六座，大炮一百二十余尊，连同大批弹药，一齐送给了敌人。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向旅顺发起总攻击，守军统帅龚照瑛是李鸿章死党，贪鄙庸劣，先一日乘鱼雷艇逃往烟台，其余守将亦纷纷潜逃，仅徐邦道所部奋勇抵抗，二十二日旅顺失陷。费银数千万两经营十六年之久的旅顺船坞、炮台等防御设备，至此全部资敌。

日军侵占旅顺后，一连几天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当时目击者美国驻华使馆武官欧伯连说：“我亲眼看见许多杀人的事情。这些被杀者……是根本没有武装的。我还看见许多尸体，他们的手是缚在背后的。我曾经看到许多伤痕累累，显然是被刺刀杀死的尸体，而且我可以断定他们是在无抵抗的情况下被害的。”^③ 英人胡兰德在《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七八页。

② 熊福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资料丛刊（一），第三十七页。

③ 《英国外交文件》，参见《中日战争》资料丛刊（七），第四六二页。

法》一书中记载，此次“得免戮杀之华人，全市中仅三十六人。”^①连支持美国的报纸也难以替它掩盖这一滔天罪行，不得不评论说：“日本国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日本人今脱掉文明之假面具，显露野蛮之本体”。^②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大笔血债。当时，旅顺广大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宁死不屈，纷纷拿起斧头、菜刀、铁锤与敌人肉搏。如铁匠苑某，在日军闯进他家时，他抡起大铁锤，一锤砸死一个，一连消灭了四、五个日军。机匠陈永发手拿利斧，藏在机架后面，等日军闯进门，照准脑袋猛力砍下去，敌人立即毙命。有一个爱国少年化装乞丐，混进敌营，把毒药放进饮水缸里，使日军“死亡者踵相接”。后不幸被日军发觉，惨遭酷刑，慷慨就义。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无不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③

旅顺、大连失陷后，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对威海卫军港和港内北洋舰队的袭击。

黄海大战后，停泊在威海卫军港内的北洋舰队，还有铁甲舰七艘、炮艇六艘、练船二艘、鱼雷艇十三艘。敌舰号称二十五艘，但多数是木质小船，能战的不过十艘。一八九五年一月中旬，当日本陆军两万余人在海军护送下进犯威海卫时，北洋舰队仍藏港内，因为李鸿章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严禁舰队出海巡弋，造成了坐等挨打的局面。一月二十日，日军在威海卫的东侧成山头登陆，占领荣成县，分兵两路，

①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一五七——一五八页；又参见陆奥宗光：《蹇蹇录》第六十三页。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六页。

从后路进扑威海卫。日军先攻南岸炮台，负责防守炮台的分统刘超佩坐船逃走。炮台守兵自发起来发炮抵抗，北洋舰队也在港内发炮支援，激战两日夜，击毙敌军左翼司令大寺少将，敌官兵伤亡很多。但终因守军失去指挥，又无援军，南岸炮台失陷。接着日军又占领北岸炮台。敌军从南、北炮台和军舰上轰击港内的北洋舰队，使北洋舰队陷入了极困难的境地。可是，刘公岛和日岛炮台上的守军，与港内军舰上的水兵，仍然英勇不屈坚持战斗。

形势愈来愈严重。海军副提督英国人马格禄与顾问美国人浩威，勾结几个无耻将领，唆使刘公岛上的一部分士兵、水手哗变，声称“向(丁)提督乞生路”。^①这两个帝国主义分子，胁迫丁汝昌投降，遭到拒绝。丁汝昌又下令各管带同时沉船，以免舰队为日军所利用，而各洋员与管带不执行命令。他又召开会议，主张率领军舰，冒死突围，决不投降。而马格禄、浩威等洋员与一些懦怯贪生的将领都表示反对。丁汝昌在内外敌人逼迫下，宁死不降，服毒自杀。第二天，帝国主义分子马格禄、浩威伙同一小撮民族败类，盗用丁汝昌的名义，由浩威起草投降书，向日本侵略者投降。至此，耗费了中国人民大量金钱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就这样可耻地全军覆没了。

北洋舰队覆没后，清政府以淮军太不中用，任命湘军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统率一百多营六万余人分驻山海关内外。这是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最大的一次出兵，也是主战派的最后一试。其实，湘军和淮军同

^①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资料丛刊(一)，第七十一页。

样腐败透顶。负责指挥的刘坤一、吴大澂等都是些腐朽的官僚，卑怯怕死。驻扎山海关的各营，“竟有十营不满五营之额，八营不足三营之数”。军官克扣军饷达到惊人的程度，士兵每人月饷白银四两，实际仅发二两。竟有营官把在天津领到的军饷十万两，全数运回老家去了。这样腐朽的军队，又怎能作战！三月四日，日军分三路进犯牛庄，牛庄守将李光久正在吸鸦片，闻讯即仓皇逃走，士兵据民房英勇抵抗，但因缺乏指挥和联络，死伤近两千人。日军占牛庄后，大肆屠杀抢掠。

驻守田庄台的主将吴大澂，听说牛庄失守，他“弃冠脱剑”，连夜奔逃，各将领随着溜走，军队不战而溃。清军在六天之内连失牛庄、营口、田庄台等重镇。这是继平壤、九连城以后，陆军最大的一次溃退。清政府主战派依靠湘军的想法全部落空。由于军事的接连失败，腐朽的清政府惊恐万状，决意屈膝投降。

第三节 清政府卑屈求和与 《马关条约》的签订

一、清政府的求和活动。美国帮助日本讹诈中国

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平壤、黄海战役前，由于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主战派的意见在清政府中占优势，主和派的言行被迫有所收敛。平壤、黄海战役后，李鸿章等的求和活动在美、英等帝国主义支持和策划下又猖狂起来。一八九四年十月初，李鸿章向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提出调停请求。英国政府考虑到战争延长下去，会

损害它的商务，甚至会使清政府投入沙俄的怀抱，所以立即抓住清政府求和机会，于十月六日建议俄、法、德、美等国政府联合调停中日战争，条件是：“一、由列强担保朝鲜独立；二、由中国赔偿日本军费。”^①但各国意见远不一致。日本在接连的军事胜利下，野心勃勃，不以英国的建议为满足，它在美国的支持下，拒绝了英国的建议。

十月底，日军大举侵犯我国东北，清政府起用奕訢为军机大臣，主持和议，他请美国出面调停。接着又邀请英、美、德、法、俄等五国公使联合调停战事。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各有打算，根本没有联合的可能，美国便企图乘机操纵和谈，一方面，它感到清政府“已经受到灭亡的威胁”，为了它的侵略利益，不希望这个半殖民地政府在战争中倾覆；另一方面，它又感到日本的军力财力都有困难，继续作战，可能引起列强干涉，不利于日本，因此出面调停。十一月六日，美国政府向日本提出照会，提醒日本在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上要“适可而止”，以免列强“向日本提出不利于日本将来安宁和幸福之要求”。^②日本政府完全理解美国单独出面调停的“厚谊”，但考虑到“目前日本政府如果公开请求美国政府为中、日两国调停，可能引起其他第三国的干涉”，所以表面上答复美国说：“中国必须直接求和”，但背后向美国表示：将来中国如愿开始媾和谈判，“我国政府深愿依赖美国政府的厚谊”。^③日、美两国在暗中达成了谅解，美国表面采取“不干预”态度，说是仅仅替中、日两国传达意见，实际上是操

①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一〇五页。

② 同上书，第一一一页。

③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一一二页。

纵和谈。十一月二十一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即以“传达”日本政府的意见为名，提示清政府可直接向日本求和。这一天，旅顺要塞为日本侵略军占领，清政府求和更急，完全依赖美国。第二天，田贝电告美国驻日公使谭恩，清政府已直接委托他向日本求和，以承认朝鲜独立、赔偿军费为基础，要谭恩将此意转达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当即表示不能接受清政府提出的媾和基础，要求清政府指派全权代表与日本全权代表会谈。

正当美国出面调停的时候，李鸿章唯恐战争打下去损害他的北洋地盘和势力，迫不及待地派德帝国主义分子、天津税务司德璀琳直接到日本去求和。田贝获悉后，向总理衙门抗议，蛮横地要求以后中日双方谈判都要通过田贝和谭恩。日本政府以德璀琳“非中国大员”为借口，拒绝开谈。在田贝催迫下，奕訢乃急电召德璀琳返津。

一八九五年一月，清政府正式特派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到日本去求和。同时，依照田贝的提示，清政府聘请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助订和约，并通知科士达自华盛顿先到日本，希望他以“明智的意见，襄助代表团”。科士达虽是清政府代表团的顾问，但他一到日本，却完全为日本政府出谋划策。日本政府借口中国使臣“全权不足”，拒绝谈判。张、邵在日本受到种种侮辱，最后被驱逐出境，狼狈回国。日本政府的目的是在压迫清政府改派能担当出卖主权责任的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伊藤博文曾以私人谈话的方式，向清政府代表团成员伍廷芳说：“贵国何不添派恭亲王、李中堂，郑重其事？”^①指名要卖国贼奕訢、李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二四八页。

鸿章为谈判代表。于是，清政府就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李鸿章临行时，田贝又警告他要“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①就是要李鸿章彻底抛弃依靠列强干涉的念头，完全按照日本所提条件签约。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九日，李鸿章带着随员和美国顾问科士达到日本马关（今下关），第二天，与日本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及其美国顾问端迪臣在马关春帆楼开始谈判。

谈判是在美、日勾结下进行的，充当两国顾问的两个美帝国主义分子，一直互通声气，串演双簧。两人在表面上各为一方，互相辩论，实际上都是忠实执行美国政府帮助日本、讹诈中国的政策。在谈判中，日本侵略者气焰嚣张，竭力进行威胁、恫吓，在第四次会谈时，日本侵略者提出了所谓最后的媾和条款，书面通知李鸿章，“中国或允或否，限四日内答复。”并威胁说：“战争的后果和作战的活动都在发展着，不要以为目前尚能接受的议和条约，今后仍是可能的。”^②在美国的暗助下，日本军国主义者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二、〈马关条约〉的签订及其严重后果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与日本代表签订了卖国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一）清政府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即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

（二）日本强割辽东半岛、台湾省及附属岛屿（包括澎湖列岛、钓鱼岛等岛）。

^① 《美驻华公使田贝给国务院报告》，《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三期。

^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三三八页。

(三)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银子。

(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商船驶入上述各口岸。

(五)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各种工厂。

《马关条约》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副沉重枷锁。根据《马关条约》，中国割让了大片领土。辽东半岛是北中国门户，和山东半岛合成环抱渤海的形势，它被日本占领，就造成了直接威胁津沽和北京，向北随时可以侵入松辽平原的形势。台湾是我国沿海第一大岛，是东南沿海的天然屏障，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日本妄图霸占辽东半岛和台湾省，充分暴露它自明治维新以来梦想侵吞中国的野心。小小的日本一下子掠夺中国这么多土地，助长了帝国主义列强分割中国领土的野心，它们竞相划分势力范围，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

《马关条约》规定的赔款数目，是空前巨大的。当时清政府一年收入约银八千万两，要支付维持其统治的经费，哪有余力偿付赔款，只得向帝国主义大举借债，这就使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加强和扩大对中国人民的掠夺，从而也进一步控制清政府。而日本勒索到这笔巨额赔款，被用于发展军需生产或者与发动侵略战争有关的铁路、造船、航运等工业。日本从此确立了以机器大工业为主导的产业资本体系，加速了向帝国主义过渡，成为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之一，改变了原来的远东国际关系。

根据《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资本家可以自由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此后，帝国主义列强援引“最惠国”条款，享有“利益均沾”的特权，也取得了同样的权利。英、美、

德、法等国垄断资本便争先恐后地大规模涌入中国，开设工厂、矿山，投资铁路、航运，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恶果。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①

《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地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促使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矛盾更趋尖锐、复杂，不久，就发生了三国干涉交还辽东半岛的事件。

三、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清政府赎回辽东半岛

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是沙俄为自己日后夺取辽东而一手策动的。沙俄自侵吞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后，早对朝鲜和中国东北地方抱有侵略野心。甲午战争前，它就非常注意日本在朝鲜的扩张；战争爆发后，它更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一八九四年十月下旬，日军侵入中国东北，沙俄的一些报刊曾公开鼓吹俄国应抢先占领这块地方，“不使满洲成为日本的猎取物”。一八九五年二月一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增加沙俄在太平洋的军舰，以便应付事态的发展。在马关议和过程中，沙俄侦知日本已提出要求割让原先它准备侵占的辽东半岛，就决定进行强硬干涉，不惜一战，强迫日本退还辽东，而后由它去占领。

沙俄干涉“还辽”的提议，首先得到德国的积极支持。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二页。

德国一方面想乘机在中国占领一个海港，作为进一步从事殖民扩张的据点，另一方面，它考虑一八九一年的俄法同盟是对付德国的，如果在远东支持俄国的侵略政策，可以引导俄国向东发展，减轻俄国在欧洲对德国东境的压力，同时还可以疏远俄法的亲密关系。法国原与沙俄有同盟关系，它参加联合干涉，既表示对盟国沙俄的支持，又可以借机取得清政府对它的感激，以便将来向中国勒索报酬。

四月十七日，《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俄国政府正式邀请德、法当局联合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如果日本拒绝，即由三国海军切断辽东日军与其本国间的联系，使之陷于孤立。接着俄、德、法先后训令其驻日公使一致行动向日本提出警告。四月二十三日，俄、德、法三国驻日本公使，各根据本国政府的训令，同时警告日本政府，“应放弃领有辽东半岛”^①，并限十五天内答复。

与此同时，俄、德、法三国的军舰，纷纷出现于日本附近海面。停泊在日本各港的沙俄军舰昼夜升火，禁止船员登陆。俄国东部西伯利亚总督统率的军队，处于战备状态，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俄、德、法三国的联合干涉，使日本受到很大压力。日本政府曾试图促使美、英出面进行反干涉，但美、英不愿卷入与三国对立的战争，只允诺协助日本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迅速批准《马关条约》。日本政府既无力与三国作战，期待美、英的反干涉也没有结果，不得已向三国表示完全接受劝告，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但对中国则一点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三卷，第十二页。

不放松，坚持按原订条约批准，迅速交换批准书。并且以退还辽东半岛为名，向清政府勒索了所谓“偿金”三千万两银子。

三国干涉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完全是为了各自的侵略利益。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后，立即向清政府勒索报酬，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第四节 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割占台湾省的斗争和资产阶级对清政府战败投降的反响

一、中国人民保卫神圣领土台湾省的抗日武装斗争

《马关条约》规定割让台湾省给日本，台湾省人民纷纷反对，展开了英勇的武装抗日斗争。

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原属福建省，清政府于一八八七年改设为省。甲午战争爆发后，台湾吃紧，清政府派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帮办台湾军务”。刘抵台后将其所部两营军队扩充为八营。台湾省巡抚唐景崧与刘永福意见不合，命他离开政治经济中心的台北，去把守偏远的台南，令绅士林朝栋守台中，自守台北。

马关议和期间割台消息传出后，全国人人感到“痛心疾首，呼天无路”^①，对清政府卖国罪行恨入骨髓。各地报纸纷纷谴责李鸿章的卖国罪行，有人主张将李鸿章“明正典刑，以尊主权而平众怒”。^②上海有人在报上发出“我君可欺，而

① 《申报》，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② 转引自李时岳：《甲午战争期间辽东人民的抗日斗争》，见《光明日报》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

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①的强烈呼声，要求再战。台湾人民听到割台凶讯，“若午夜暴闻轰雷，……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哭声达于四野。”^②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台北就鸣锣罢市，人民群众拥入巡抚衙门抗议。台湾人民坚决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桑梓之地，义与存亡”，准备“和倭人决一死战”。^③他们发布讨李鸿章檄文，历数李贼卖国罪行，誓与李鸿章“不共戴天”，如果遇到李鸿章等卖国贼，“登时悉数歼除，以谢天地、祖宗”。^④这表明台湾人民对清政府出卖台湾的无比愤慨，也表明台湾人民是绝对不愿意离开祖国怀抱的。

但是，清政府对全国人民反对卖国条约的呼声及台湾人民的抗议，充耳不闻，死心塌地出卖台湾，一方面，命令唐景崧及其他大小官员迅速内渡；另一方面，派李经方去台办理交割手续。六月一日，李经方带着科士达，到达淡水附近海面，他害怕遭到台湾人民的惩罚，不敢登岸。阴险毒辣的科士达向李经方献计说：“在西方国家中，有一种普通的方法，把一个主人的巨大产业或地皮移交给另一主人，但凭一张文契，文契一经签字和交出，移交手续即已完成，不需两方亲赴该项地区。我看不出任何理由何以这方法不能适用于目前的场合上”。^⑤李经方言听计从。就这样，六月二日在基隆口

① 《论台民义愤亦足以威慑远人》。

② 《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下册，第三一一页。

③ 《申报》，一八九五年五月十五日。

④ 《台湾人民抗战檄文》，《中日战争》资料丛刊（六），第四五〇页。

⑤ 科士达，《外交回忆录》，《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三期，第一九九页。

外日舰“西京丸”上，他和日本新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匆忙签署了割让台湾、澎湖列岛的文据，把祖国的宝岛和当时的三百二十万台湾同胞出卖给日本。六月四日，日本派兵占领基隆港。唐景崧逃到厦门。防守台中的林朝栋等也逃回大陆。六月十四日，桦山资纪率侵略军，在美国纽约《先驱报》记者戴维逊伙同一些英、德商人的引导下进占台北，成立“台湾总督府”。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它对台湾五十年的罪恶统治。

唐景崧等逃跑后，台湾人民纷纷组织义军，推刘永福为首领导抗日。台湾军民团结一致，展开了英勇的抗日武装斗争。

台湾抗日义军，较大的有七、八支，各有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其中最杰出的是徐骧和吴汤兴两支义军。徐骧是苗栗县爱国知识分子，他号召台湾同胞起来进行武装抵抗，保卫祖国的领土，保卫自己的家乡。在他的鼓动和组织下，很快组成一支坚强的抗日义军，影响所及，其他地方也纷起组织义军。这些义军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显示出非凡的英雄气概，成为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主要力量。

日本侵略军占领台北后，陆军主力则自台北沿西部平原南犯，遭到台湾抗日军民的坚决抵抗。于是一场台湾保卫战打响了。

悲壮的台湾保卫战，于一八九五年六月中旬开始，大致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竹争夺战。

敌军于六月十二日分两路进攻新竹。新竹义军在吴汤兴、姜绍祖率领下，激战六日，姜绍祖壮烈牺牲，新竹沦陷。六

月下旬，敌人继续南犯，徐骧等义军英勇狙击，三次打败敌人，迫使敌人退回新竹。新竹是台中与台北间的战略要地，抗日义军决定反攻新竹。徐骧等率义军会同台北退下的两营清军，包围新竹，敌军疯狂顽抗，在新竹城外三里的十八尖山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军用大炮轰击，义军则肉搏冲锋，来回争夺，杀死许多敌人。最后，义军被迫后撤。新竹争夺战坚持了一个多月，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表现了义军顽强不屈的英勇战斗精神。

第二阶段，台中、彰化之战。

新竹失守，义军退守台中、彰化一带，刘永福派吴彭年率军两营来援。八月二十二日，敌军进犯大甲溪。我军采用伏击战术，诱敌深入到大甲溪旁，徐骧、吴彭年伏兵突起狙击，大败敌军，敌人被击毙和落水死者无数，溪水为之不流。日军不甘心失败，第二天集结主力再度进犯，侵占了大甲溪。

日军渡大甲溪进犯台中。当地义军千余人进行抵抗，青年农民林傅伏在大树上射击敌人，毙敌二十余人。八月二十六日台中失陷。

日军继续进攻，徐骧、吴彭年等率军退守彰化。八月二十八日，大战于彰化东门外八卦山，义军不怕牺牲，奋勇冲杀，杀得日军主力师团的官兵嚎叫逃窜，积尸满山，敌人收买汉奸，由小路抄袭山顶，包围我军，吴汤兴中炮牺牲。吴彭年指挥三百多战士，奋勇争夺山顶高地，最后他和大部分战士英勇战死。徐骧率领余部，突出重围，退往台南，彰化城失陷。彰化之战，义军给敌人最精锐的部队日皇近卫师团一千余人以沉重打击。一个侵略分子心有余悸地写道：“我骑兵一行迷失道路，问诸农民，农民假装亲切，事实却指示

给不可通行的狭路。当我军困顿路上，正在徘徊踌躇时，忽然枪声四起，响彻山中，眼看假装着农民的人们，三三五五，不知从何而来，拿起预先藏好的步枪，四面齐向我军乱射。……四面草木皆成敌人，……举目一看，妇女童稚全都勇敢地手携长枪向我追赶而来，”^①可见人民战争威力之强大。

台中、彰化失陷后，刘永福急派王德标率军守嘉义，杨泗洪带兵驰援前线，统率各军，反攻彰化，先后克复大莆林、云林，歼敌数百人，义军伤亡也多，杨泗洪在战斗中牺牲。九月三、四日，我军乘胜围攻彰化城。高山族七百健儿参加徐骧义军，增加了新的力量。在彰化城外展开激战，义军击毙日军山根成信少将，斩获甚多，士气旺盛，形势非常有利。但卖国的清政府不仅不给台湾军民任何援助，相反破坏抗战，封锁沿海，下令官民“严行禁止”接济台南。^②刘永福对翁同龢、张之洞等主战派抱有幻想，派人向他们求援，得到的答复是“倭有东南督抚暗中助逆之说，言于我政府，关系外交，不能为力。”^③拒绝援助，致使抗日军队弹尽援绝，无力攻克彰化。清政府这种罪恶行径，令人发指。

第三阶段，嘉义、台南之战。

日军近卫师团不断遭到沉重打击，狼狽万状，急忙从辽东调两个师团到台湾，重组“南进司令部”，以台湾副总督高岛丙之助为司令官，分水、陆两路进攻台南。十月十一日，日军大举进犯嘉义。徐骧率军迎头痛击敌人，不幸阵亡。这

① 《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资料丛刊(六)，第四六八——四六九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一一三卷，第五页。

③ 吴桐林，《今生自述》，《中日战争》资料丛刊(六)，第四二六页。

一天，王德标在城外营中埋下地雷，然后弃营进城，日军不知是计，进驻防军兵营，至半夜地雷爆炸，炸死七百多人，吓得仓皇撤退，又遭义军伏击，死伤很多。第二天，敌人猛扑嘉义城，用大炮轰塌城墙，窜进城中，义军和敌人展开巷战，逐街逐屋地争夺，杀死杀伤敌军无数，日军近卫师团长中将北白川能久重伤毙命。日军付出惨重的代价，侵占了嘉义。

接着日军进犯台南，他们一方面派“吉野”等六艘军舰攻陷打狗（即高雄）港炮台，另一方面分两路进逼台南。刘永福驻安平炮台，策应守城军。各军饥饿不能再战，十八日城陷。十九日，日军进犯安平炮台，在这关键时刻，刘永福几次向日方递送乞降书，遭到台湾人民坚决反对，最后他丢掉抗日军民，乘英国轮船潜逃厦门。二十一日，台南英国传教士福格逊、巴克莱二人引导日军入城，台南失陷。

台湾军民的抗日战争，从六月至十月共经历四个月，抗击着日本侵略军三个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面对强大的敌人，毫不畏惧，重创敌人。日本侵略军被打死打伤和因病遣回的共三万二千多人，一个中将师团长和一个少将旅团长毙命。被日军捧为所谓“最精锐”的近卫师团也丧失了近半。台湾人民在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英勇抗战中，表现出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

十一月下旬，日寇宣布“全台平定”，但是敌人未免高兴得太早了。英雄的台湾人民是不会屈服的，他们在广大农村和山林中，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台北农民群众首先组织起第一支抗日游击队，接着台湾中部和南部也先后组织起抗日武装，不到半年时间，游击队遍及台

湾全岛。他们出没无常，虚实兼用，巧妙地打击敌人，往往使敌人“一昼夜数惊”，处于“见走兽，闻啼鸟，则疑敌至”^①的恐慌状态。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到一九〇二年，前后共达七年之久，杀死敌人的文武官员和军队无数。在这七年中，日本撤换了三个总督。台湾义军虽被镇压下去，但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未停止过。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铁蹄下度过了五十年，也斗争了五十年。

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者的斗争，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是极为光辉的一页。台湾人民的英勇斗争，表明了任何外来侵略势力，妄图霸占台湾并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是绝对不能得逞的。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今天，在美帝国主义卵翼下的蒋帮还窃据着台湾，但他们的寿命不长久了。“帝国主义的豺狼们应该记住，由他们任意摆布人类命运、任意宰割亚非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②任何敌人胆敢阻挠我们完成解放台湾的神圣义务，我们就坚决用人民战争把他们彻底消灭。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

二、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和广州起义

清政府战败投降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民族危机。中国各阶层人民都掀起了挽救危亡的斗争。除台湾省人民展开武装抗日斗争外，长江一带以及江北各省人民以反对外国教会为主的反侵略斗争也逐步高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组织了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并策动了第

① 洪弃父：《台湾战纪》，《中日战争》资料丛刊（六），第三六一页。

② 毛主席：《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七日。

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

毛主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①

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年）名文，字逸仙，在进行革命活动中，曾逃亡日本化名为中山樵，遂以中山称于世。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里。他的童年是在广东的农村里度过的。广东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最早、受苦很深的地方，也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清朝反动政府最早、最激烈的省区之一。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孙中山小的时候就常听“太平遗兵”讲述当年太平天国的革命故事，受到了反清思想的熏陶。他十分仰慕洪秀全的事业，并常常自诩为“洪秀全第二”。^②

孙中山哥哥孙眉在檀香山经营畜牧农场，是个华侨资本家。他十三岁时到檀香山，随哥哥生活，入教会学校读书。一八八三年回到国内，又在香港的皇家学校、广州的博济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一八九二年毕业于西医书院。从一八七八年至一八九二年的十多年间，他一直受着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在当时的中国人中，能受到这样系统的资产阶级教育的人是不多的，这就使孙中山比洪秀全、康有为向西方寻找真理更具备了条件。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学到了不少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了解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这对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

早在檀香山学习期间，孙中山看到夏威夷人民反对美国

① 《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七页。

②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一），第二十六页。

并吞夏威夷群岛的斗争，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就决意要“恢复中华”。回国后，孙中山看到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屈辱投降，签订卖国条约，受了很大的刺激，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更加增长了。但是，和同时代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一样，他当时还没有摆脱改良主义思想的束缚，对清朝和洋务派官僚还存在着幻想。一八九四年他写了九千余言的《上李鸿章书》，赶到天津见李鸿章。在上书里，孙中山提出了改良政治的主张，指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①，要清政府仿照西方资产阶级制度，开办学校，培养人才；开设工矿企业，修筑铁路，采用近代机器生产；实行保护工商业政策。李鸿章当然不会对孙中山的上书发生兴趣，拒绝接见他。孙中山上书失败后，跑到北京，亲眼看到清朝统治集团的昏庸腐败，认识到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根本办不到的，便决心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用暴力推翻这个反动王朝。

随后孙中山到檀香山，积极向华侨宣传反清革命主张，得到了一些进步华侨的赞助。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他在华侨中创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制订了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的章程。当时，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节节败北，它的腐败情况暴露无遗，激起了人民的愤怒。孙中山认为时机大好，即从檀香山回到香港，于一八九五年二月组成香港兴中会，重新发布了兴中会宣言。宣言中指出了帝国主义列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对中国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痛斥清政府“公行贿赂”，“剥民刮地”，“暴过虎狼”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七页。

的腐败政治，提出要“切实讲求当今富国强兵之学”，以“振兴中华”，^①挽救危亡。兴中会宣言中所说明的斗争目标，虽然还带有改良主义色彩，但在会员入会誓词中，已经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目标，表明要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初步的革命纲领。

香港兴中会成立后，积极筹集经费、枪械，联络广州一带会党、绿林和营勇，准备于一八九五年旧历重阳发动广州起义。但组织不够严密，又有叛徒告密，随即被清政府镇压。广州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强烈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作为辛亥革命的先声，是有一定历史意义的。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等逃亡日本，设兴中会分会于日本横滨。接着孙中山就赴檀香山、美国、英国向华侨宣传革命。在这个时期里，他研究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代表著作，考虑了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经过研究和考察，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纵然“民权”发达，但也不是“极乐之乡”，它们的社会制度并不完善，政权掌握在豪富手中，贫富悬殊，社会动荡不安，面临着社会革命。他幻想预防资本主义的这种“顽症”，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经过改良的资本主义的“极乐之乡”。后来他所提出的“平均地权”主张，就是企图矫治他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这个不治之症。

一八九七年孙中山回到日本。一九〇〇年兴中会利用义

^① 《香港兴中会宣言》，《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一），第八十六—八十七页。

和团运动的有利时机，积极筹划第二次武装起义——惠州起义。

三、康有为及其发起的“公车上书”

当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革命活动和举行广州起义的时候，在民族危机刺激下，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则掀起了改良主义运动。发动了以挽救民族危亡为目的的“公车上书”。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年），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自幼深受儒家教育的熏陶。一八七九年和一八八二年他去香港和上海等地，接触到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感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套治国的办法，而清朝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却是那样古老闭塞。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严重的民族危机，人民的不满和反抗，这些使康有为逐渐产生了变法维新的思想。他把学西方，搞改良，当作救亡图存的真理，当作缓和阶级矛盾的办法。

一八八八年，康有为去北京参加顺天乡试（考举人）。当时正是中法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更为暴露，他认为若不赶快变法维新，危局就难以挽救了。那年十月，他写了一篇五千余字的上皇帝书（第一书），要求赶紧变法改良，否则，外国侵略将及内地，“金田之役，将复起矣。”^①这是康有为把酝酿已久的变法思想变为实际政治建议的开端，但这份仅仅表示了一点改良愿望的上书却为顽固大臣所阻，光绪帝没有看到。守旧的官僚们对这个不安分的“狂生”大为不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戊戌变法》资料丛刊（一），第一二五页。

满，康有为的这次乡试也因此落第。他回到广东，于一八九一年在广州长兴里设立万木草堂学馆，从事讲学和维新的理论著作，传播改良主义主张。他利用儒家今文经学的所谓“微言大义”，引伸和附会孔丘的学说，编造了一整套资产阶级政治改良的理论。并培养了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骨干，著名的有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等人。康有为的两部对维新运动影响最大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就是在这时写成的。

《新学伪经考》刊行于一八九一年。所谓“新学”是指王莽的“新”朝（王莽的国号叫“新”）之学，所谓“伪经”是指西汉刘歆请立于学宫的古文经学。康有为认为这些古文经书是刘歆帮助王莽创立“新”朝伪造出来的。他公然把历代奉为神圣的孔老二经书的一部分说成是假货，引导知识分子去怀疑古代的经典，这是对封建传统思想的一次大胆冲击，在政治上打击了“恪守祖训”的封建顽固势力。因此，一八九四年清政府下令焚毁这部书。

《孔子改制考》从一八九二年开始写起，于一八九七年在上海刊行。在这部书中，康有为发挥了“托古改制”的理论，牵强附会地说儒家所尊奉的六经，都是孔老二为了改革当时的社会，按照自己的政治观点，假托古人的言论而制作的，把孔老二装扮成为托古改制的大师，将六经作托古改制的张本。这种说法是极其荒谬的。孔丘是“述而不作”，什么学问也没有的满肚子秕糠的大草包，他为了反对新兴地主阶级，复辟西周奴隶制，至多只是把历史典籍加以编辑而已。何来什么“托古改制”呢？尤其是他的严尊卑贵贱使所谓“乱臣贼子惧”的《春秋》，是倒退复古、仇恨新制度的复辟经。但康

有为却认为孔老二托古改制的精神尤其表现在《春秋》之中，而《公羊传》则是正确阐述《春秋》的典籍。在《公羊传》中有所谓“通三统”、“张三世”的说法。“通三统”是说夏、商、周三代不同，当因时变革。“张三世”是说有“据乱世、昇平世、太平世”三世，愈变愈进步。康有为用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观点来解释“三统”、“三世”之说，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是按照“据乱世、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进化，当时的中国是由“据乱世”通过维新变法进到“昇平世”阶段，也就是由封建专制制度进到君主立宪制，以后再渐进于太平世，即所谓“大同”。他用这些理论来论证变法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使他的“托古改制”从“孔圣人”那里找到根据。

康有为另一本著作《大同书》，描绘了一个空想的“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世界”图案。书中所反映的“大同”思想是西方庸俗进化论学说和儒学《公羊》“三世”、《礼运》“大同”之说糅杂起来的混合物。它的根本精神是害怕和反对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乞灵于人的“本性”，发挥“不忍之心”而互相携手合作，这就是康有为所梦想的“大同”。这种否认阶级斗争的梦呓，就是要使广大劳动人民忍受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其结果只能是“同”于反动统治阶级的铁蹄之下。毛主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①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两本最重要的著作，前者着重于动摇“祖宗之法，莫敢言变”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六〇页。

的封建传统思想，旨在破地主阶级之旧，后者着力于阐述改制变法的理论，旨在立资产阶级之新。这两部著作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为变法维新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康有为不敢向封建势力直接宣战。他既要变法，又想避祸，正如他自己表白过的：“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①于是他抬出孔老二这具僵尸，借用其旗号，把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政治改革，一概插上“孔圣人”的标签，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避开斗争的锋芒，并取得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持。这里充分表现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妥协性和软弱性。

一八九五年春各省举人聚集在北京参加选拔进士的国家会试。甲午战争失败的不安气氛笼罩着整个京师。四月十七日，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在京举人群情激愤。这时，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等也在北京参加会试，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广东籍会试举人联名上书，反对批准卖国条约，在京各省举人纷纷响应联名上书，掀起了反签约的巨浪。康有为决定利用形势，推动变法运动，他起草了一封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上皇帝书（第二书），串连一千二百多个举人在这封“万言书”上签了名，于五月二日递交都察院。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家的车马接送被征举的士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它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变为政治运动的起点。

《公车上书》指出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说：辽东半岛和台湾一割，“法窥滇桂，英窥滇粤及西藏，俄窥新疆及吉林、

^①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版，第二六七页。

黑龙江，必接踵而来。”同时指出国内的阶级矛盾说：“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外患内讷，祸在旦夕。”^①提出了挽救危机的四项办法：一、“下诏鼓天下之气”，即要求皇帝下诏罪己，大行赏罚，提拔知兵善战的军官，处分辱国降敌的大臣和不作战备的地方官吏；二、“迁都定天下之本”，即要求迁都长安，将二亿两赔款充军费，暂不对日求和；三、“练兵强天下之势”，要求选将、练兵、购械，与日决战。这三项还只是“权宜应敌之谋”，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书中又提出第四项：“变法成天下之治”，要求发奋变法，推行富国、养民、教民政策，改进工业、农业、商业、货币和教育制度。并提出一项改革官制的建议，建议地方设立定期更换的“议郎”，这些“议郎”不仅供皇帝谘询，还可议论政令。这项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求清政府向资产阶级开放政权。第四项的要旨在变法，是康有为这次上书的中心内容。

康有为的“万言书”没有递交到光绪帝，但它的全文却辗转传抄，风行一时，上海、广州等地还刊印了“公车上书记”，广事宣传。从此，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得到了广泛传播。

康有为在这次会试中中了进士，并被任为工部主事。但他没有去就职，而致力于维新的政治运动。

^① 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二)，第一三三、一四〇页。

第八章

戊戌变法

第一节 甲午战后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

一、〈中俄密约〉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划分势力范围的前奏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这个“瓜分狂潮”中，沙俄扮演了一个穷凶极恶、阴险毒辣的重要角色。它为了独占中国东北，并以此作为扩大侵略的基地，诱胁清政府订立密约，攫取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和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中国境内的权利。

甲午战争时，沙俄所修筑的西伯利亚铁路已敷设到外贝加尔湖。为了加速实现对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沙俄企图使这条铁路穿过中国东北，直达海参崴，认为“这是一条大为缩短、便宜和迅捷的路线”^①，不但可以较绕黑龙江北岸路线缩短七百俄里，节省经费三千五百万卢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②这样，沙俄就可以随时出动武力，把清政府置

① 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第七〇页。

② 《财政大臣维持的节略》（一八九六年四月十二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六九页。

于它的控制之下。为此，沙俄侵略者处心积虑地要“用种种方法将中国北部的铁路网转入己手，首先要将由外贝加尔穿过满洲到海参崴的干线握在手中。”①

当干涉还辽问题刚结束，沙俄政府就以“共同防日”为诱饵，向清政府提出借地修路的侵略要求。它不管清政府是否允许，就派遣大批技术人员擅自进入中国东北勘测路线。当时在清政府内部，不仅以西太后、李鸿章为代表的联俄卖国路线更为抬头，就是一向接近英、美的地方大官僚如张之洞、刘坤一之流也有“结俄为援，以保中国”的主张，认为以后“凡与俄国交涉之事务，须曲为维持”。②清政府内部表现出来这种投靠沙俄的倾向，给予了沙皇政府肆意勒索，扩张势力以可乘之机。

一八九六年五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清政府本拟派曾任驻俄公使王之春往贺，但沙皇政府早想乘此机会进行敲诈，认为同这样一个地位不太高的中国官吏谈判，不能达到自己的侵略要求，就借词说王之春“位望太轻，难于接待”，公然拒绝，并暗示非派李鸿章去不可。清政府乃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祝贺，并任命他去英、法、德、美等国递送国书。

一八九六年三月底，李鸿章带领大批随员由上海出发赴欧。英、法、德诸国都想争夺这个老卖国贼，劝他先往西欧，但沙皇政府毫不放松，特派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乘专船到苏伊

①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七三页。

② 《江督刘坤一奏密陈大计联俄拒日以维全局折》，《清季外交史料》第一一五卷，第二十一—二十一页。

士运河抢接，经最短路途将李鸿章送到彼得堡。自五月初开始，沙俄财政大臣维特与李鸿章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沙皇接见了李鸿章，沙俄政府许给他三百万卢布赔款，分三期交付，李鸿章竟于六月三日在沙俄一手炮制的《中俄密约》上画了押。《中俄密约》共六款，其主要内容为：（一）日本如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以及朝鲜领土，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二）缔约国一方未征得另一方的同意，不得与敌方签订和约。（三）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应对俄国军舰开放，中国地方官尽力协助。（四）中国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东省铁路）达海参崴，该路的建筑和经营，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五）俄国可以在该铁路运送军队、粮食及军需品。（六）本条约自铁路合同批准日起，有效期十五年。《中俄密约》名义上是两国对付日本的“军事同盟”，而实际上是沙俄在同日本争斗中，把中国拉到自己方面，充当它的附庸。同时在“共同防日”的幌子下，通过修筑中东铁路，将魔掌深深地伸入中国东北地区。李鸿章回国后，中俄于九月间订立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沙俄根据这个合同，并恣意歪曲条文原意，又攫取了中东铁路沿线地区的行政权、司法权、驻军权、采伐权以及减免税厘等等特权，这块地区实际上成为沙俄的殖民地。

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出卖了巨大的民族利益，却认为解决了一切问题，说什么中国可保“二十年无事”。事实完全相反，“密约”不仅加速了沙俄的侵略步伐，还助长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从此不是“无事”，而是更加“多事”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中，“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

的”。①《中俄密约》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划分势力范围的前奏。

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以新的方式加紧侵略中国，除了扩大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外，还竞相加强对中国的投资。资本输出成为对华侵略的重要手段。它们争先恐后地到中国开工厂、设银行、筑铁路、开矿产，以至强占海港，划分势力范围，妄图瓜分中国。中国民族危机急剧加深。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了偿付对日赔款，不得不大借外债，帝国主义列强就乘机输出过剩资本，向清政府发放巨额政治性贷款，并借此勒索种种侵略特权。从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八年三年内，清政府搞过三次大借款。英、俄、德、法等国纷纷争向清政府兜揽，把总理衙门闹得不可开交。一八九五年七月，清政府与俄、法两国签订《俄法洋款合同》，借款一亿两，年息四厘，折扣九四又八分之一，三十六年分期还清，以海关收入为担保。一八九六年三月，清政府与英、德两国订立《英德洋款合同》，借款一亿两，年息五厘，折扣九四，三十六年还清，以海关收入为担保。一八九八年三月，又与英、德签订《续借英德洋款合同》，借款额也是一亿两，年息四厘五，八三折扣，四十五年还清，以海关税收及苏州、松沪、九江、浙东等处货厘以及宜昌、湖北、安徽等处盐厘为担保。这三次大借款，不仅利率高，折扣大，而且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在一八九五年的借款合同中，曾规定清政府

①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四页。

向沙俄保证，如果允许其他国家享有监督或管理中国税收的权利时，沙俄政府亦得均沾利益。这项规定是针对英国控制中国海关而言，反映沙俄也想乘机插手中国海关行政。英国岂肯退让，就在一八九六年的借款合同中，强迫清政府承认三十六年内不得改变海关行政；后来在一八九八年的借款合同中，又强迫清政府同意四十五年内不得改变海关行政。英国通过上述两次借款合同，保证了长期控制中国海关的权利。通过这些借款，不仅中国海关收入全部落入帝国主义之手，而且厘金收入也开始受总税务司支配。

帝国主义通过广设银行，加紧对中国的资本输出。甲午战后的几年内，除了原有的外资银行扩大营业外，又相继在中国开设了华俄道胜银行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分行，英国的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合组的中英银公司等。这些银行，是帝国主义控制清政府的财政和借款，争夺对中国铁路和矿业的投资，发行纸币，操纵外汇的金融垄断机构，是侵华的一种重要工具。如华俄道胜银行就是沙俄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据点。沙俄外交大臣罗生曾直言不讳地供认：华俄道胜银行是“一个政治金融的混合机构，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略加伪装的俄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而已。”^①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政治贷款和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②

帝国主义还掠夺中国铁路的修筑权。一八九五年法国

① 罗生：《四十年外交》，纽约，一九二二年，第一卷第一九八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二页。

取得由越南边境筑铁路至中国境内的权利。第二年，沙俄通过《中俄密约》取得了横贯东北的中东铁路的直接修筑和经营管理权，并获得了运兵过境、开采矿产、架设电线以至控制沿线地方行政、司法及税务财政等特权，开了通过铁路攫取势力范围的恶例。一八九八年，沙俄又夺得了修筑中东支路的特权，从而把整个东北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接着，英、德、美各国竞相效尤，纷纷争夺铁路权，与俄、法相抗衡。

芦汉铁路（芦沟桥至汉口）和津镇铁路（天津至镇江，后改筑至浦口）是贯通南北的两大干线。为了掠夺这两条铁路的权利，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曾进行过剧烈的争夺。一八九六年，清政府准备借外债修筑芦汉铁路，美国抢先兜揽贷款，因条件太苛未成。接着，英、德两国也向清政府兜揽，清政府正在犹豫之中，俄、法两国指使比利时银行团向清政府贷款，在俄、法的欺骗和威胁下，清政府同比时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芦汉铁路的承造和经营权实际上落入了俄、法之手。

英国眼看俄、法两国势力将伸入长江流域，就迫不及待地向清政府提出所谓“长江流域铁路系统”的狂妄计划，要求承筑津镇、晋豫、广九、浦信、沪杭甬等铁路。其中津镇铁路要经过德国的势力范围山东，为德国所反对，英国便与德国妥协，擅自议定分割津镇路权益的协定，约定北段即天津至山东境内峄县的一段归德国承筑，南段峄县至镇江的一段归英国承筑。同时，两国还划分了铁路的投资范围。德国还取得了胶济铁路的修筑权。英国通过同德国的妥协，加强了它同俄、法的对抗均势。一八九七年，英国又夺得京奉路（北京到沈阳）的借款权及沿线开滦煤矿的开采权，想与沙俄争

夺东北。

美帝国主义在谋夺芦汉铁路失败后，转而逼迫清政府让给粤汉铁路的借款和修筑权。英国为了发展它在华中和华南的侵略势力，想方设法插手粤汉铁路，拉拢美国，于一八九八年冬订立同盟协定，英、美两国在粤汉铁路各参加一半资本。中国铁路主要干线主权丧失殆尽。

从甲午战后至一八九八年，据不完全统计，英、俄、德、法、美、比等国共掠夺了长达六千四百二十哩的铁路投资权利。其中英占二千八百哩，俄占一千五百三十哩，德占七百二十哩，比占六百五十哩，法占四百二十哩，美占三百哩。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这些铁路，不仅可以进一步推销它们的商品，掠取大量的廉价原料，沟通沿海与内地的侵略势力，而且获得沿线矿山的投资开采权，甚至可以控制铁路沿线地区的行政、司法和税收等特权。铁路所经过的广大地区，便成为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以德国强占胶州湾为开始。德国对胶州湾垂涎已久，在三国干涉还辽后不久，就向中国要求租借一个“屯泊兵船”之地，未能得逞。一八九七年初，驻华德国公使向清政府指明索取胶州湾，遭清政府拒绝。同一年，山东曹州鉅野发生群众逐杀逞凶杀害中国人民的德国传教士的事件，德国就以此为借口，于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派兵舰强行占领胶州湾。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清政府被迫与德国订立《胶澳租界条约》，德国取得了《租借》胶州湾九十九年，修建胶济铁路和由胶州湾到山东边境的另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后来未修筑），并获得了铁路沿线三十里以内地区的开矿权以及供应山东省各项工程所需的

人员、资本和器材的优先权等侵略权益。山东便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德国强占胶州湾是受到沙俄支持的。在胶州湾问题上，俄、德两国曾搞过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在德国军舰开进胶州湾的前三个月，德皇访问俄国，以德国支持俄国夺取旅、大为交换条件，取得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对德国侵占胶州湾的默契。沙俄外交大臣穆拉维也夫在一份备忘录中供认：“德国人占领胶州湾提供了我们一个有利的机会去占领中国的一个港口，特别是旅顺口或附近的大连湾。”^①沙俄在德国占领胶州湾后的第八天，就将军舰开进旅顺，实行对旅、大地区的侵占。同时，耍弄它惯用的两面手法：一方面欺骗清政府，无耻地声称它强占旅顺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摆脱德国人”，“保卫中国人不受德国人侵犯”^②；另一方面，向德国保证“以最友谊的方式”支持德国“在北京提出的永久租借胶州湾的要求”^③，说什么沙皇“深信俄国与德国应该而且也能够远东一道前进”。^④德国也以承认“中国北部各省，包括全部满洲、直隶及新疆在内”为沙俄的“独占行动范围”相报答。^⑤这是沙俄勾结德国宰割中国的最无耻的肮脏交易，俄国佬是当年瓜分中国的带头羊。沙俄在强占旅顺、大连后，随即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旅、大及修筑中东铁路支线到旅、大的无理要求，强迫清政府于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签订了

① 《维特回忆录》第二卷，第一三三页。

② 《维特回忆录》第二卷，第一三九页。

③ 《德国外交文件》三七四二号（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卷，第二〇九页。

④ 同上，三七三三号（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同上书第一九八页。

⑤ 同上，三七四三号（一九九八年一月二日），同上书第二一〇页。

《旅、大租地条约》，五月七日，签订《旅、大租地续约》，七月，又订立关于中东铁路延修到旅、大的合同。通过这一系列条约，沙俄政府“租借”了旅顺、大连（包括附近水域和周围小岛），租期二十五年，并规定：期满后可由两国相商展限；“租借地”内的行政权归俄国，中国军队撤出，让俄军入驻；沙俄获得了中东铁路支线（从哈尔滨到旅、大）的修筑权和沿线伐木、开矿的特权，中国不得将此路经过地区的铁路修筑权让与别国；“租地”以北划出一个“隙地”，中国军队非经俄国同意不得入内，“隙地”内的政治、军事、经济统归沙俄控制，这个所谓“隙地”实际上是整个辽东半岛的代名词。这样，当年从日本帝国主义嘴里挖出来的辽东半岛，就被沙俄鲸吞了。整个东北沦为沙俄独占的势力范围。

法国以俄占旅、大为借口，于一八九八年四月强占广州湾，取得了滇越铁路（云南到越南）的修筑权，并迫使清政府声明广东、广西及云南不割给别国。

一八九八年六、七月间，英国强租威海卫为军港，与沙俄所占旅、大相对抗；又强租九龙半岛、香港附近各岛屿、大鹏、深圳二湾，与法所占广州湾相对抗，并迫使清政府宣布长江沿岸各省以及广东、云南不割让给他国。

日本除侵占了我们神圣领土台湾省外，从一八九六到一八九八年，陆续在杭州、苏州、重庆、沙市、天津、上海、汉口等地设立租界，并迫使清政府声明不将福建省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迫使清政府宣布某些特定地区不割让给别国，以及列强相互间的协议，划定了长江以北包括东北、蒙古、新疆作为沙俄的势力范围，山东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长江流域各省作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广东、广西、云南作为英、法两国的势力范围，福建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瓜分大祸，迫在眉睫！

三、美帝国主义的“门户开放”政策

在帝国主义疯狂分割中国的过程中，美国也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但由于它当时正忙于和西班牙打一场争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无暇兼顾，对中国的侵略落后了一步，没有在中国取得势力范围。

一八九八年，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夺得关岛和菲律宾为殖民地，在西太平洋建立了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但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被其他帝国主义划定了势力范围，美国几乎没有伸手的地方了，于是它采用了新的侵略手法，抛出一个臭名昭著的“门户开放”政策。

一八九九年九月美国政府提出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其内容主要有三点：

（一）在华的每个国家不得干涉任何一个按条约开放的中国通商口岸，也不得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干涉别国的已得利益；

（二）不论哪国的货物，进入势力范围内的口岸时，一律按目前中国的协定关税率征税；

（三）各国对于进入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别国船只，不得征收比本国船只更高的港口税，对别国商品不征收比本国商品高的铁路运费。

一八九九年九月和十一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分别向英、德、俄、法、日、意等国政府提出同样内容的通牒，要求各国接受“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政策是以承认

各国在华已划定的势力范围为前提的，得利最多的英国首先表示赞同，德、日、法、意等国先后表示有保留的同意，沙俄经济落后，在关税、船只港口税和货物运输费同等条件下，是无力与英、美等国竞争的，所以它对“门户开放”态度含糊，但也未公开拒绝。

美国从这个“门户开放宣言”中，取得了极大的侵略利益。因为它得到了其他各国承认不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干涉美国的已得利益，又取得了在任何别国的势力范围内始终可享协定关税的权利和关于航运和铁路运输方面享受与该国同等利益的保证。美国不但避免了自己的在华势力被他国排除出去的危险，还可以使自己的势力伸入到他国的势力范围内去。这样，美国表面上不曾在中国抢到一块势力范围，实际上处处皆可作为它的势力范围。它可以凭藉自己的经济优势战胜其他国家。美国资产阶级报刊供称，这个“宣言”使美国“保护了现在的利益，保障了未来的利益，使美国立于一个牢不可破的地位”，还得意忘形地吹嘘“在外交史上从来没有比这次更光辉和重大的成就”。^①

其他国家之所以接受这个“宣言”，是因为它肯定了各国在中国已霸占的势力范围，同时也可使它们互相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享受一定特权。

各帝国主义在承认美国的“门户开放宣言”的基础上，实际上达成了共同宰割中国的协议。

所谓“门户开放”就是这么一个为美国的侵华利益服务的政策。在此后半个世纪中，美帝国主义每次对中国进行侵

^① 转引自傅汝祺，《美国侵华史》第二卷，第四六五页。

略，总是打出“门户开放”的招牌，厚颜无耻地把它吹得天花乱坠。直到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被中国人民赶出中国大陆以后，艾奇逊之流还恬不知耻地胡说什么“门户开放”政策是“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是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严正地指出：“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①

第二节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发展和维新运动的兴起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甲午战争后有了初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一八九五——一九〇〇年间，商办厂矿共六十八家，总资本约为一千七百万两，官商合办等厂矿则为十四家，总资本约近一千三百万元，总投资数三千万元。而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九四年间两类厂矿的投资总数为二千余万元。由此可见，一八九五年后的六年期间，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超过前二十三年期间的规模。再就商办企业在全国总的厂矿数及资本额中所占比例来看，在甲午战争前后也有很大变化。甲午战前的情况是，从厂矿数来说，商办与非商办的比率是七三：二七；从资本额来说，其比率是二二：七八。甲午战后不仅厂矿数扩大为八三：一七，资本额更提高到五七：四三。这表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国内封建势力的摧残，它的力量仍然是极其

^① 《“友谊”，还是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九四页。

微弱的。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开始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成长起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也随之扩展。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较有力量的是刚从官僚、地主、富商转化而来的那个部分，他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这部分人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较多的联系。资产阶级改良派主要代表这部分人的要求。

中日战争的惨痛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特别是战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所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大大地促进了人们的觉醒，救亡图存成了当时中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不断高涨，全国几乎没有一省不发生捣毁教堂，杀死教士等反帝斗争。群众性的抗租、抗捐、抢米风潮，先后席卷了十几个省分，不少地方还爆发了武装暴动。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酝酿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慑于革命风暴的威力，更加迫切地要求改革政治。

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到这时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带有鲜明的救亡图存色彩的系统的改良主义理论，并越出了少数改良主义先驱者的狭隘圈子，扩展到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下层士大夫中间，把政治改革的一般要求，提到了历史的行动日程上，使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从一种社会思潮发展为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公车上书”是这个政治运动的起点。主要代表人物除在前章已介绍的康有为外，还有严复、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

严复（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年），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几道，福建侯官（今闽侯）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

蒙思想家，也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少年时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一八七二年后在兵舰上实习和工作了五年。一八七七年被派往英国学海军，有机会直接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努力学习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民权论等学说。一八七九年回国，一八八〇年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后任总办（校长）直至一九〇〇年，这期间，他除继续钻研西学外，大力学习中国古代法家的学说，并把二者逐步地揉合起来。甲午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的刺激下，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译著和论文。一八九五年他用文言文译述了英国自然科学家赫胥黎所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主要内容，书名为《天演论》，在《国闻报》上陆续发表，一八九八年正式出版。自鸦片战争以来，直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著作的，这是第一本书。《天演论》前半部是唯物的（着重写自然现象），后半部是唯心的（着重写社会现象，即伦理过程）。严复在译述中，附加了他自己的许多见解。他认为书中宣传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进化论观点，对生物界和人类社会都是适用的。显然，这种庸俗进化论观点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称霸世界提供理论根据的，是反动的理论。但严复译述《天演论》的目的，却在于解决当时中国最急迫的民族危亡问题。他很赞许赫胥黎的“人治”“与天争胜”的学说，认为这与中国唐代法家刘禹锡、柳宗元人定胜天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说：“其（指赫胥黎）说与唐刘、柳诸家天论之言合。”^①基于这个观点，他认为《天演论》学说有利于“自强保种”，中国人如果发奋图强，变法维新，就不会被“优

^① 《天演论·群治》按语。

胜劣败”的规律所淘汰，不会被西方强国所吞灭，而能够强盛起来与之抗衡。这是书中反复宣传“天道变化，不主故常”，“不变一言，决非天运”以及“人定胜天”等观点的主要原因。这在实际上批判了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和“天命论”的反动观点，在当时中国面临瓜分危机的形势下，起了激发人们的民族意识，鼓动人们变革自强，救亡图存。《天演论》成为当时号召人们急起救亡的警钟，它对思想界的影响，超过同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其他著作。除《天演论》外，严复还翻译了亚丹斯密的《原富》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书。

在变法运动高潮时期，严复发表的重要论文，如《原强》、《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辟韩》等，其中尤其是《原强》篇，系统地阐述了救亡图存的观点和变法要求，充满着爱国主义激情，鲜明地揭示了他的尊法反儒的立场。

严复在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译述的《原富》中尖锐地指出中国当时的危险情景说：“德意志并力于山左，法兰西注意于南陲，而吴楚之间，则为英人禁商”，^①“长城以外，……则俄罗斯视为禁商”。^②在稍后几年所译《社会通论》按语中更进一步指出：“世之所谓虎狼国，行其先王之遗策，有长驾远馭，并吞六合之心者，非俄罗斯乎？”^③而“以远近形势言之，俄于支那其情亦与各国异也，故中国之大患终在俄。”^④今天苏修叛徒集团不正在“行其先王（老沙皇）之遗策”吗？它的侵略扩张野心比之老沙皇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① 《原富》按语，《严译名著丛刊》本第一一四页。

②④ 同上书，第五八页。

③ 《社会通论》按语，《严译名著丛刊》本第一四六页。

回味严复当年的警告是很有现实感的。严复大声疾呼地说：“今日之事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①如不奋起救亡，必将“作印度波兰之续”，前途只有亡国灭种！

怎样才能使“达尔文之理”不验于中国而达到自强保种的目的呢？严复认为办法是有的，他提出“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的口号，即上下一心，全民族一心，团结起来抵御外侮。从这点出发，他很强调“群治”，指出“能群”就能以“人治”“与天争胜”。这是他介绍斯宾塞尔“群学”的主要用意，他并以之与中国古代法家荀子的“人之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相比拟。在这里，严复不仅批判“任天为治”的唯心主义说教，也谴责孔孟之道是“涣群”的祸根，指出“周孔所教，礼义所治”，徒使人群涣散。严复很有信心地说：团结起来，“吾奋吾力”，就可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②努力做去，中华民族是会强盛起来的。

严复明确指出：“北并乎西伯利亚，南襟乎中国海，东距之太平洋，西苞乎崑崙虚，黄种之所居也。”这里所讲的黄种，是指满、蒙、汉及其他中国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都是我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只有外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才是异族，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严复的这一思想，是从维护满族贵族统治出发的，是同他的改良主义立场分不开的，但在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危机面前，强调各民族团结一致以反抗侵略的思想，却是可贵的。而对今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阴谋破坏中国各民族团结，把长城以北各少数民族胡说成不是

① 《论世变之亟》，以下此文与《原强》、《救亡决论》、《群群》等文的引文不再加注。

② 《天演论·进化》。

中国的民族的荒谬吃语，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严复所讲的“同力合志”的团结，是有原则的，不是团结在封建专制三纲五常之下，而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民主基础上的团结。要实现这种团结，必须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变法。他批判那些死守“祖宗成法”的顽固派说：社会在不断发展，形势在迅速变化，世界上没有“无弊之法”，“物穷则变”，变法是“取运会而转移之”，即适应客观形势发展规律的要求的行动。死守旧法不变，是倒行逆施，自取败亡。严复对于“盗西法之虚声，沿中土之实弊”的洋务派的所谓“变法”，也进行了斥责，指出洋务派只抄袭西方的科学技术，而在社会伦理和政治方面，仍然是“重三纲”、“亲亲”、“孝治”、“尊主”、“好古而忽今”等封建主义的一套，这样做法，必将沿着“天演”的路子滑下去，非至亡国灭种不止。

严复认为适合时宜的变法，其内容应该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就是他针对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提出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其精神必须是法家雷厉风行的革命精神。严复多次讲过要用法家的办法才能救中国，他在《天演论·善群》按语中说：赫胥黎所讲的“去其傅者”（意谓扫除陈腐恶习），非孔孟之亲亲、尊尊等那套纲常礼教所能办得到的，而“惟尚贤课名实者能之。尚贤则近墨，课名实则近于申、商。”他赞许秦始皇废封建，改郡县，焚烧那些复辟经的诗书，是为了“一统……之大局”；而对于那些疯狂进行诽谤和复辟活动的反动儒生，严复说：“秦皇坑之，未为过也。”严复的意思很明显，要革除积弊达到独立富强的境地，非采用法家的治术不可。他所提达到自强保种的

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条具体主张，是贯穿着法家思想的。

所谓鼓民力，实际上就是尚武精神。严复反对儒家的“王道”“文胜”的说教，指出孔孟礼教是“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的祸根，其后果“乃儿不能自存”。^①他认为一国的富强，常常是“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以“不忘武事”为根本。所以他主张禁绝腐蚀民力的鸦片和缠足的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崇尚实际的科学知识。严复反对“必求古训”也即求之于孔孟经书的恶习，反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认为这些都是“盍民智”的陋规，必须改革。他很赞同赫胥黎说的“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惟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名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的话，就是说书本知识是第二位的，社会和自然界的实际斗争知识，才是第一重要的知识。这就打破对孔老二“经书”的迷信。严复认为，要能做到鼓民力，开民智，关键在于新民德。所谓新民德，就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民主，设议员，定宪法。这就直接与封建的三纲五常对立起来，而君权成了严复攻击的首要目标，他指出封建帝王都是“大盗窃国者”，所以“君臣之伦，……不足以为道之原”，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才得称之为“道”，实行这个“道”，就能使“将涣之群”团结起来，就能使大家“各私中国”，同心协力地“赴公战”，“趋死以杀敌”。严复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而他所讲各民族大团结，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做到。但软弱的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实现的。严复的政治

^① 《原富》按语，《严译名著丛刊》本，第一二六页。

主张始终没有超越“君民共治”的君主立宪制，并且认为由于中国“民智未开”，政治改革“不可期之以骤”，甚至连设议院也只许慢慢来。严复在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方面，是有所贡献的，在思想界的影响也较大，但他在政治实践方面比当时的康、梁显得还软弱。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传统的封建儒学教育。一八九〇年起，他从学于康有为，并参加了康有为主持的变法理论的著述和编校工作，深受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影响。一八九五年的“公车上书”，他也是积极的参加者。在维新运动高涨时期，任上海《时务报》总编辑和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长于文字宣传，成为康有为的主要助手，人们合称为康、梁。他曾在《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文章，阐述变法维新的主张，论证变法的必然趋势。他说：“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黯；新则洁，旧则败”；“变者，天下之公理也”。^①驳斥了封建顽固派“墨守祖宗成法”的反动观点。他还提出了“伸民权”的政治主张，认为“民权”不伸是中国积弱不振的主要关键。他向清政府提出了“人人有自主之权”的要求，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的制度。这种“民权”思想在当时有一定进步意义，对思想界影响较大。但是，他认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民权”取决于民智的高下，他说：“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

^① 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八页。

十分之权。”^①在他眼里，资产阶级和地主绅士是“智”者，广大人民群众是“愚”者。这种反动的“英雄史观”无非是要证明：只有资产阶级和地主绅士才能参加政权，当统治者，而广大人民群众只能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梁启超又说：“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也，即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几也。故开官智又为万事的起点。”^②在他看来，要“兴绅权”，还得先“开官智”，可见资产阶级改良派不是要取代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而是紧紧依靠封建势力以求在政治上分得一席之地。说到底，“君主立宪”才是他们的政治理想。梁启超在宣传“民权”的同时，又把“民权”与“民主”的概念严格地区分开来。他认为中国当时只能学习英、日等有君主的资产阶级的“民权”国家，不能学习美、法等没有君主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因为“我国民智未开，明自由之真理者甚少，若倡革命，……其糜烂将有甚于法兰西”者，“故革命者最险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③可见他的“民权”学说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相妥协的产物，是用以抵制革命，反对革命的，明显地流露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本质。

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幼时深受封建教育，早年曾游历各省，对社会现状接触较广，在学术思想上受清初王夫之的影响较深。他对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政治学说

① 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四十一页。

② 同上书，第四十五页。

③ 梁启超：《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八十页。

颇怀兴趣，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极为向往。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给谭嗣同很大的刺激，他的思想从此发生剧烈的变化，发奋提倡新学。此时，康有为、梁启超已在北京组织学会，进行变法维新的宣传工作。谭嗣同对康、梁很佩服，自称为康有为的私淑弟子。一八九六到九七年间，他在南京任候补知府时，钻研中西学问，揉合儒家、墨子、老庄、佛学和西学，写成《仁学》一书。康、梁思想给予他不少影响，但他的思想观点仍具有自己的独特风貌。

《仁学》是谭嗣同思想的结晶，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哲学观点和社会政治思想。他用资产阶级观点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主张民治。他说：“君末也，民本也。”^①当然这里的“民”是指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又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②这种民治观点，不但有力地抨击了孔老二炮制的“君权神授”的反动学说，而且肯定了民有废立君主的权利。谭嗣同从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而批判维护封建制度的纲常名教，激烈地控诉三纲五常的惨祸烈毒。他大声疾呼要“冲决网罗”，就是说要同一切封建束缚决裂。出于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憎恶，他曾对农民革命表示过一定的同情。他对维新变法表示满腔热忱，甚至主张流血斗争。他说：“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③这些都说明谭嗣同是当时最

①② 《仁学》，《谭嗣同全集》第五十六页。

③ 《上欧阳瓣瓣师书》，《谭嗣同全集》第三〇三页。

激进的改良主义者。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不可能真正去冲击封建“网罗”。他虽然猛烈地抨击封建制度，但在政治实践上却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封建君主光绪帝的身上，甚至为“酬圣主”而被杀了头；他虽反对封建儒学的纲常名教，但却处处为封建名教的祖师爷——孔子辩护，反儒而又尊孔，堕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中；他虽然同情过革命，但对当时人民群众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现实斗争却十分害怕，甚至把革命群众称之为“亡国之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具有两重性，不可避免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陷于种种矛盾，在这点上，即使象谭嗣同那样的激进派，也不能例外。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后，继续致力于维新的政治活动，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他又写了一封长达一万三千余字的上皇帝书（第三书），内容与“公车上书”大致相同，只是删去了拒和、迁都的建议，把要求变法的内容加强了，从各方面说明了赶快变法的道理。光绪帝读此书后，觉察到所述变法要求，正是巩固清朝统治、提高自己权势的途径，对它马上重视起来。这是康有为以上书的形式和光绪帝第一次发生接触。康有为很兴奋，紧接着在六月间再次写了一封上皇帝书（第四书），从正面论证了设立议院的必要性，为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制造舆论。这次上书被阻搁了，但他并没有洩气，继续加紧工作。

康有为、严复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思想战线上的活动，扩大了改良主义的思想影响，为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勃起准备了条件。

康有为在第四次上皇帝书后不久，即与光绪帝的师傅，

当时担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的翁同龢搭上了关系，向他进言变法。翁同龢是光绪帝的宠臣，是帝党官僚中的重要人物，他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发生了兴趣，想借改良派的变法活动，帮助光绪帝实现向西太后夺回实权的愿望。

光绪帝由于自己没有实权，竭力想提高自己的权势，排除西太后的挟制，他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极为重视。帝党企图利用变法改制来加强皇帝权力，摒斥后党，扩大帝党势力。因此，主张引进维新派，利用他们作为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康有为等则由于上书屡鲜实效，总感到自己力量微弱，急于要寻找政治靠山。他们的理想是依靠皇帝，自上而下地按照他们的方案实行变法。帝党既然有意支持他们，这对改良派来说，确是求之不得的。于是改良派就和帝党结合起来，在朝廷内外形成了一股变法势力。然而，两者搞变法的目的是有分歧的。光绪帝和帝党讲变法，除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清朝封建统治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向西太后夺权，这与改良派的救亡和参政的意图是不相同的。光绪帝和翁同龢等对于康、梁的“民权”之说本来深表憎恶，只是为了对后党斗争的需要，才不得不暂时容忍。

维新运动的兴起，引起了帝国主义，特别是英、美、日帝国主义的极大注意。甲午战争以后的几年间，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大致分为俄、法和英、日两大势力。帝国主义之间的角逐，关键在于争夺对清政府的控制权。那时候，以西太后为首的后党守旧势力投靠沙俄，沙俄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大为增长。英、日两国则企图利用帝党和改良派作为政治工具与沙俄对抗。帝党出于同后党进行夺权斗争的需要，甘心投靠英、日，甚至出卖民族利益，也在所不顾。而康有为等改

良派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他们幻想帝国主义能够帮助中国的维新势力实现政治改革，因之乐于接受帝国主义分子的所谓“合作”，提出所谓“联英、日策”，与虎谋皮。康有为极为借重英国侵略分子李提摩太，与他交往甚密，梁启超还当了他的私人秘书。

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从维新运动一开始就表现出他们对封建势力的妥协和对帝国主义的依赖，而远远脱离人民群众，这就决定了维新运动的力量必然是极其微弱的。

二、改良主义的政治团体和报刊

在第三次上书皇帝被阻后，康有为为了进一步传播改良主义思想和组织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力量，同梁启超等人着手创办报刊和组织学会。康有为认为“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①，乃于一八九五年七月，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宣传变法主张。由梁启超等人撰写文章，也转载在华外国人报刊上的文章。每天印一、二千份，与《邸报》（清政府的官报，专载诏书奏章一类东西）一起分送给北京的官员，不收报费，一个月后印至三千份，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办的第一个报刊。最初，守旧官僚们不明《中外纪闻》的来历，等他们知道来自南海馆（康有为在北京的寓所）后，便大为惊讶。

同年八月，康有为在帝党官僚翁同龢、文廷式的支持下，邀同陈炽、杨锐等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康有为作《强学会序》，痛陈民族危机的严重，并号召发愤图强以挽救危亡。会员每隔数日集会一次，每次有人讲演。强学会是第一个改良主义政治团体，它的成立标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四），第一三二页。

志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进入到聚集力量的新阶段。当时一些洋务派官僚如张之洞、刘坤一之流，想投机维新，沽名钓誉，借以扩张自己的政治势力，捐款给强学会，表示赞助。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也钻进了强学会。连李鸿章也愿捐银二千两申请入会，因他卖国，名声太臭，被拒绝接纳。

强学会一出现，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就大肆活动，力图操纵这个团体以适应他们的政治需要。英、美驻华公使馆表示愿意捐助强学会图书仪器，英国公使还力劝翁同龢赶快着手“变法”。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削尖脑袋，钻进强学会。李提摩太向翁同龢提出什么《新政策》的长篇意见书，胡说：“中国旧学，阅数千年决不可废，……各国通行之新学，亦不可不知，增之则有大益，不增则有大损，譬单轮之车，未尝不可以远行，然改为双轮，牵以骏马，不尤稳而尤速乎？”他公然提出所谓“教民、养民、安民、新民”的新政纲领，还要清政府“延聘深可信任之二西人，合筹良法”，并建议设立“新政部”，作为推行“新政”的领导机关，“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其当用英、美二国者，因……”。^①李佳白也赶紧写了什么《新命论》的文章，要清政府聘用“西国大有声名、中外推服之人。”^②《新政策》、《新命论》都是涂上“变法”油彩的殖民主义黑货，如果按照这些方案去“变法”，那中国就变成不折不扣的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些侵略分子的阴谋虽然没有得逞，但助长了改良派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强学会成立后，变法维新的声势逐渐高涨，引起了顽固

① 李提摩太：《新政策》，《戊戌变法》资料丛刊（三），第二四〇页。

② 李佳白：《新命论》，《戊戌变法》资料丛刊（三），第二五七页。

守旧派的注意，他们准备上奏章要求严惩康有为。康有为为暂避风头，于十月间离开北京南下。他到南京与张之洞商谈在上海设立强学会，张表示愿捐资支持。十一月，上海强学会成立，不久发行《强学报》。那时东南一带的所谓名士如广东的黄遵宪、江苏的张謇等都入了会。改良主义运动在东南一带也发展起来。

强学会由北京发展到上海，要求变法的呼声高起来了。以后党为核心的顽固派感到这是对他们的严重威胁，他们公开叫嚷“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决心扑灭强学会。一八九六年一月，西太后勒令光绪帝封闭强学会，查封《中外纪闻》。张之洞得到消息后，便借口上海强学会擅用孔子降生纪年为理由，停止供给经费，并下令查禁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那些见风转舵的官僚们也就纷纷退出了强学会。

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虽被查封，但维新变法的风气已开，不是清政府的几道禁令所能遏制得了的。维新运动在上海、湖南、广东三个中心地区继续发展。

一八九六年八月，上海《时务报》开始发行，梁启超任总编辑，销数达万余份，在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是维新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报刊。湖南维新活动也很活跃。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倾向变法，有一些官员也赞同变法。一八九七年秋，谭嗣同、梁启超到湖南，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梁启超任总教习，谭嗣同等任分教习，宣传变法改良。一八九八年一月，谭嗣同等创立南学会，这是强学会的继续和发展。南学会会员千数百人，省城设总会，各府、厅、州、县设分会，每月四次讲论，听讲的人非常踊跃。三月，又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刊载了不少有关变法改良的论文，主张

“君民共主”的立宪政治。遭到王先谦等湖南顽固势力的反对，新旧斗争非常激烈。

这一时期，两广地区的维新运动也有进一步的开展。上海强学会被迫解散后，康有为回到广州，仍在万木草堂讲学，一度去香港、澳门活动，并在澳门创办了《知新报》。一八九七年春，他又到广西桂林讲学，在那里发起组织圣学会，并出版《广仁报》，把维新运动扩大到广西。国外华侨也组织了一些类似的机构。

这一年，严复在天津创办了日刊《国闻报》，后来又办了旬刊《国闻汇编》，从事维新的宣传。

根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记载的统计，自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七年间，国内外设立的学会、学堂和报馆共五十一所，其中学会二十四，学堂十九，报馆八。就分布的地区说：湖南十六，江苏十一，广东八，北京三，广西二，陕西、湖北、浙江、福建各一，其他还有澳门三，新加坡三，横滨一。以上数字是偏低的估计，实际上不止这个数目。这些学会、学堂和报刊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了组织力量和制造舆论的作用。然而，当时参加学会、学堂和阅读报刊的人，仅限于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他们只是全国人口中的极少数，同广大人民群众未曾发生什么联系。但改良派的这些活动，造成了一股浓烈的维新变法的气氛，推动了改良主义政治运动逐步高涨。

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高涨和封建顽固势力的反扑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中国已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时刻。维新变法运动随着民族危机的

巨剧而迅速进入高潮。十二月，康有为从广州赶到北京，又写了一封上皇帝书(第五书)，书中的措词比以往几次上书都激烈，他痛切陈词，指出当时的形势是：日本议院天天在开会，各国的报纸议论纷纷，都在谈论瓜分中国的事，“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①；在国内，“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②，到处都埋伏着“揭竿斩木”的危机。他提醒光绪帝和大臣们说：若再因循下去，“恐皇上和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③接着他提出了三项对策：皇帝以俄国大彼得、日本明治天皇为榜样亲定国是，宣布变法，这是上策。皇帝召集有才能的官员，谋划变法，这是中策。皇帝督促各省大臣各就本省实行新政，这是下策。

以上三策，他请皇帝选择一个加以实行，说是能行上策，就可以强国；能行中策，可保弱国地位；能行下策，仅免于亡国。

这封上书虽仍被顽固派大臣阻止，没有能递上去，但是许多官员转相传抄，天津、上海的报纸也把它刊载出来了，一时流传很广。当时都察院给事中(谏官)高燮曾上奏章要求皇帝召见康有为，翁同龢也乘势向光绪帝保荐康有为，光绪帝准备召见他，由于顽固守旧大臣从中阻拦，特别是恭亲王奕訢以康有为非四品以上官，按成例不能召见为词，加以阻止，光绪帝只好按照“成例”，改令大臣们传康有为“问话”。

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康有为被传到总理衙门，出席问话的大臣有李鸿章、翁同龢和荣禄等五人。这次“问话”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资料丛刊(二)，第一八九页。

② 同上书，第一九二页。

③ 同上书，第一九〇页。

是维新和顽固守旧两派之间一场小小的辩论会。康有为首先驳斥了荣禄的“祖宗之法”不能变的说法，又回击了李鸿章的历朝成规不应废的论调，然后发挥了一大套变法改良的理论和具体方案。

一月二十九日，康有为上了一个《应诏统筹全局摺》（第六书）。书中概述当时世界上如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由于守旧不变，沦于被分割和危亡的悲惨命运。因此他强调提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①中国之所以面临危亡，就是由于保守旧法不知变革。他请求光绪帝尽快做好三件事：一、召集群臣，宣誓变法，大臣们都要表决心，革除旧习，努力维新，否则自请免官；二、设上书所，让士民自由上书，官员上书建议都可以直接送到皇帝手中，无须代递，有合要求的，就要破格任用；三、设制度局，选拔通才数十人主持，皇帝每日到局议政，哪些应新增，哪些应修改，哪些要保留，哪些要废除，都要订立章程，颁布施行。在制度局之下，分设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十二个局。地方每道设一民政局，每县设民政分局。他还建议送人出国游学，大译外国书籍，改变科举，设立各种学堂，兴办银行，训练军队等。

这个“统筹全局”的奏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革新政治的全部要求，也是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

接着，康有为把《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等书送了上去。书的序文说：欧美大约经过三百年造成了

^① 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戊戌变法》资料丛刊（二），第一九七页。

它们的体制，日本学习欧美，花了三十年而模仿成功。如果以中国地广人多的基础，就近学习日本，三年可以初具规模，五年可以纳入轨道，八年可大见成效，十年就能成为称雄世界的强国。康有为的这个方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不能实现的。

过了几天，康有为又写了一封上皇帝书(第七书)。书中着重吹嘘俄国彼得大帝为了革新政治，不惜放下尊贵的皇帝身分，到外国去取经。他启发光绪帝要把彼得大帝作为榜样去向日本学习。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①，于是与旅京维新志士开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陕学会等。一八九八年四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组成保国会，议定章程三十条，以救亡图存相号召，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北京、上海设两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规定了会议权限、领导关系、入会手续和会员权利等。可见，保国会已初具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当时官僚、知识分子参加的很多，不少富商大贾也列名会籍。四月十二日，召开第一次大会，有两三百人到会。康有为在会上发表激烈演说，痛陈亡国灭种的惨祸，指出从德国强占胶州湾起，仅两个月中，丧权失地的事就发生了二十起，这样下去，还能保持多久？他大声疾呼，“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②接着开了第二次、第三次大会，士大夫集会的风气，一时大盛，影响很大。因此，不可避免地要遭到顽固派的仇视和破坏，有人写了《驳保国会》的文章，说康有为“目无君上”，想做“民主教皇”。荣禄公开对人说：“康有为立保国会，现放许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七十四页。

② 同上书，第七十九页。

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你们如有相识人入会者，令其小心首领可也。”^①御史文悌诋毁保国会是“保中国不保大清”^②，顽固派将这当作有力证据，准备查究。在顽固派的恫吓下，不少人怕事退会，个人还写信否认自己加入过保国会，甚至有人反而诬蔑保国会，以求免祸。保国会在顽固派的压力下屈服了，不敢继续活动。对抗维新运动的反动思潮也猖獗起来。那个伪装维新的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也按捺不住地跳出来，充当了这股逆流的急先锋，抛出大毒草《劝学篇》，向维新势力进行反扑。他装出一副关心时局、折衷新旧的姿态，说什么图谋挽救时局的人讲新学，担心丧失圣道的人守旧学，弄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他说的“通”，是指有关工商业和学校报馆等事，可以变通举办，不必一概排斥。他说的“本”，是指有关世道人心的封建伦理，即孔孟之道。它是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重弹。

张之洞从“本”出发，把“保国、保种、保教”解释为“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要以激发忠爱，尊重朝廷为根本大计。就是坚持封建道德不能变，封建制度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如果变动这些东西，那就是动了“本”，就要了他们的命，是绝对不容许的。张之洞特别起劲攻击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民权说”。说什么“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若人皆自主”，“不尽灭人类不止”。另一方面，他竭力宣扬清王朝的“深仁厚泽”和“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和宗法制度，借以维护清朝专制统治。《劝学篇》说出了顽固派们的心里

①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一），第三五〇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七十六页。

话，为守旧顽固思想提供了论据，成为他们破坏维新运动的精神武器之一，是一本绝妙的反面教材。

《劝学篇》送到北京，西太后大加夸奖，光绪帝也很为欣赏，当即命令军机处发给各省总督、巡抚和学政各一部，要他们广为流传。“十日之间，凡三易版本”。帝国主义分子也赶忙把它译作英文，改名《中国的唯一希望》在纽约出版，对维新变法运动起了极其恶劣的瓦解作用。

经过甲午战争，洋务运动彻底破产，洋务派便与顽固派合流了，他们一起阻挠和破坏变法运动，张之洞的表演是很典型的。

资产阶级改良派同封建顽固派的对立和论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是要不要变法，要不要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第二是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第三是要不要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要不要提倡新学。改良派说“要”，顽固派说“不要”。“要”与“不要”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对抗，某种程度上也是反儒与尊儒的斗争，它是近代中国新旧斗争的一个重要回合。

第三节 戊戌变法及其失败

一、百日维新

改良派和顽固派的论争，到一八九八年夏天更加激烈起来。顽固守旧大臣害怕变法将危及他们的统治地位和封建秩序，以西太后为靠山，拚命想把变法运动压下去。而光绪帝看到康有为的上书以后，逐渐增强了变法的决心，企图通过变法使自己成为掌握实权的皇帝。这时，康有为又写信给翁

同龢，催促赶紧着手变法，转请皇帝早日颁发变法上谕。六月十一日，光绪帝下了一道“明定国是”的诏书，表示决心变法。新政就从这一天开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政变为止，一共一百零三天，历史上称作“百日维新”。

六月十六日，打破了皇帝不能接见小臣的“祖宗家法”，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康有为，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康有为首先陈述中国在外国的逼迫和分割下，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非尽变法不能自强。光绪帝也表示非变法不可。接着，康有为说所谓变法，需要把制度、法律先行改订。否则只是变事，不是变法。他请求皇帝统筹全局，设立制度局，实行“全变”。他建议皇帝，不必尽撤旧衙门，只须增设新衙门，不必尽撤旧大臣的职，只要擢用有才干的官员，多多接见维新志士，赏以卿衔，准许专摺奏事（直接向皇帝上条陈，不需代递），将新政诸事交给他们办理。对旧大臣保持他们的高官厚禄，使他们既没有办事的辛劳，又没有失位的恐惧，他们便不会阻挠新政了。这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同顽固派妥协的本质，也表现了他们只依靠一个皇帝实行新政的幻想。

光绪帝接见康有为以后，准备重用他，因荣禄、刚毅等人的反对，又怕触怒西太后，结果只给了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办文稿）这个较低的位置，但准许专折奏事。康有为就利用这个特殊待遇，不断地上奏折，提建议，并先后送上他写的《突厥削弱记》、《波兰分割记》、《法国革命记》等书，各书都有序文和按语。

七月三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给他六品衔，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九月五日，光绪帝特别给谭嗣同、刘光第、

杨锐、林旭四人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批阅大小官员递上的奏折，为皇帝颁发诏书拟稿，这是机要工作，当时称他们为“军机四卿”。

在以西太后为头子的顽固守旧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清政府里，改良派只抓牢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而光绪帝也只抓到少数改良派。康有为等人唯一的办法是不断向皇帝递奏章、条陈，经过光绪帝，把奏章、条陈变为诏书、谕令，从紫禁城里发出来。在一百零三天中，新政诏书、谕令共一百一十多起，基本内容如下：

（一）经济方面：

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奖励新著作、新发明；改革财政，整顿税收、度支，编制预算、决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计。

（二）政治军事方面：

广开言路，不论官民一律得上书言事；改订规章条例，裁撤闲衙冗官；裁减绿营，采用西洋兵制，精练海陆军。

（三）文化教育方面：

设立学堂，提倡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派人出国游学、游历。

上面这些除旧布新的命令，都是在根本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作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枝节改革，这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妥协的产物。但就是这些枝枝节节的改革，除了京师大学堂得到成立外，其他都还是纸上的东西。康有为等人把皇帝的诏书看得极为重要，以为诏令一出，大小臣工就

会遵令照办，也就可以把纸上的东西变为现实的东西，结果证明，这只是一种幻想。

二、顽固派发动政变

当光绪帝下诏变法，新政的车轮开始转动时，改良派和顽固守旧派、帝党和后党之间的斗争也就白热化了。西太后早就想废掉光绪帝另立新君，现在皇帝竟然起用改良派闹新政，夺她的权，就决意实现她的宿愿，发动宫廷政变逼光绪帝下台，剪除改良派。就在光绪帝宣布变法的第四天，西太后威逼光绪帝连下了三道预示新政危机的命令：一是撤除翁同龢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的职务，逐回江苏原籍。这一措施显然是要切断改良派和光绪帝的联系，孤立光绪帝，削弱帝党。二是新授二品以上文武大臣要谒见西太后，向她“谢恩”。这是西太后企图进一步操纵黜陟大权，防止光绪帝任用改良派为高级官吏。三是调直隶总督王文韶回京供职，派大学士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因为荣禄是西太后的头号亲信，直隶总督能统帅北洋三军（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拥有重兵，可以控制北京的政局。这是西太后发动政变的部署。

当荣禄将出京就任新职时，西太后召见了她，商定在秋天要光绪帝陪同她去天津阅兵，到时便以兵力逼迫光绪帝退位，另立由她完全控制的新君。同时，西太后又进一步把京城和颐和园的警卫权也抓到自己的手里，完成了发动政变的部署。

那时候，西太后住在颐和园，光绪帝在紫禁城，光绪帝常要去颐和园向西太后请安，借以观察她的动静，在颁行新政的一百零三天中，就去请安十二次。西太后则在内廷布满

了她的亲信太监，监视光绪帝的行动。西太后掌握了紫禁城的一切动向。

在推行新政中，也触犯到一些人的利益，如废八股文、裁撤衙门以及旗人自谋生计等诏书发下后，牵及切身利益的顽固守旧势力一齐集结在西太后周围，都想反扑过来，扼杀新政。

九月初，帝党和后党的争夺已经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四日，光绪帝下令撤了顽固守旧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个大官的职。这是帝党对后党的最大一次回击。七日，又将阻挠新政的李鸿章、敬信从总理衙门撵走。顽固派愈加侧目而视，西太后和荣禄的密谋也更加紧了，京津道上，西太后的亲信来往不绝。荣禄还突然调武毅军移驻天津，调甘军移驻长辛店，发动政变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

光绪帝察觉到了这种严重形势，于九月十四日和十七日接连传出两道“密诏”给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先是要他们妥速密筹，设法营救他，后来则令康有为等赶快逃命。

康有为、谭嗣同等读了密诏，痛哭一场。他们“密筹”的结果，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东郊民巷的公使馆和拥有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身上。

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年）字慰亭，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县，是镇压捻军头子袁甲三的侄孙。屡试秀才不中，却于一八七九年在家乡创办“文社”，自为盟主，结纳朋党，后来的左右手徐世昌就是这时结识的。一八八〇年袁世凯投靠其养父袁保庆的至交吴长庆。吴系淮军将领，“剿捻起家”这时驻军山东登州。吴长庆要袁世凯跟他的幕僚张謇读书，袁不愿，于是委以营务处帮办。一八八二年袁世凯跟随吴长庆

赴朝鲜，从此袁世凯留朝十二年之久。一八八五年清政府驻朝商务委员陈林棠任满调回，李鸿章荐袁世凯继任。为了对袁“隆其位，俾稍有威风”，李鸿章奏请将商务委员改为“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一八九四年七月，袁世凯怕在中日战争中送命，溜回国内。回国后与西太后亲信直隶总督荣禄拉上关系。一八九五年清政府编练新式陆军，委派袁世凯以在小站练兵的重任。小站练兵是袁世凯发迹的关键，他在这里不仅掌握了用新技术装备的武装力量，而且培植了大批死党，号称“北洋三杰”的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就是这时笼络结纳的。民国以后大多数北洋军阀头目也是这时豢养的。一八九八年，袁世凯以曾参加过强学会，改良派对他有幻想，结果，袁世凯出卖了维新运动。

本来，康有为曾建议请李提摩太任新政的顾问大臣，还想请日本大政客前首相、发动侵华战争的大战犯伊藤博文做指导新政的“客卿”。伊藤博文借“游历”为名，于九月十四日来到北京，是别有用心。光绪帝在接见伊藤时，希望他无保留地将日本维新的“改革顺序方法”告诉中国，也想同日本拉上关系。九月十九日上午，康有为在整理行装准备逃命中，赶忙去找李提摩太求救，要去见英国公使，公使避暑去了，又去见伊藤，请他向西太后说几句话，以缓和对皇帝的压力。改良派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之甚，于此可见。对光绪帝和帝党官僚来说，他们投靠英、日的路线，与西太后和后党执行的投靠沙俄的路线，本质上同样是卖国主义的路线。而康有为等改良派对帝国主义一向存在幻想，此时他们一心想依靠某些帝国主义来帮助皇帝变法，在外交上所走的是一条与他们本来的“救亡”要求背道而驰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不

但不能挽救国家于危亡，相反，只能使中国愈益陷入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深渊。

改良派同时又去找袁世凯。康有为派他的亲信弟子徐仁禄到小站去探问袁世凯的口气，袁表示拥帝。康有为等信以为真，就写了一道密奏，向光绪帝推荐袁世凯。九月十六日，正是光绪帝发出求救“密诏”的紧张时刻，光绪帝接见了袁世凯，赏以侍郎衔，派他专办练兵的事。接见后，袁世凯一方面立即去拜会顽固的军机大臣刚毅等，以求得后党的谅解；另一方面，立刻具折感谢皇帝的重赏，表示将立图报答。因此，康有为等人得到“密诏”后，决定由谭嗣同去找袁世凯。他们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十八日夜，谭嗣同访袁世凯。谭问了几句试探的话后，便把来访的目的坦率地端了出来，要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以救“皇上”，可以立下很大的功勋，并以手抚摸自己的脖子说：如果你不欲救“皇上”，向西太后告密，杀了我的头，也可以得大官。狡猾的袁世凯竟激昂地说：你把我袁某看做什么人，皇上是我们共同的“圣主”，救护的责任是你的，也是我要担当的；还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①随后他又表示很慎重的样子说：事情这样紧迫，他得先回天津去，调换几个军官，贮备一些弹药。谭嗣同满以为策划成功，再向袁叮嘱一番后，便在深夜辞别了袁世凯。

二十日，光绪帝又一次召见了袁世凯。当天傍晚，袁世凯赶回天津，直投总督衙门，把谭嗣同的策划向荣禄告密。改良派被出卖了。

^① 梁启超：《谭嗣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一〇八页。

荣禄得到袁世凯的密报，大惊失色，立刻挂专车连夜开赴北京，飞奔颐和园，向西太后告发。于是，蓄谋已久的一场政变发生了。二十一日凌晨，西太后自颐和园急还紫禁城，直入光绪帝寝宫，拿走一切文件，把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接着就用皇帝的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诏书，西太后又一次“临朝听政”。袁世凯对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立了一大功。袁世凯出卖了改良派，换得顽固派对他的信任。从此，袁世凯变成政治舞台上极为重要的反动人物。

政变发生时，梁启超、谭嗣同等还聚集在李提摩太的住所，同他商讨挽救的办法。他们决定由李提摩太去见英国公使，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英国公使还未回来，没有联系上。梁启超虽然会见了日本公使，除了听到一些表示“同情”的外交词令外，一无所获。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只是观察事态的发展，以便左右逢源，从中操纵。

顽固派想利用政变把维新力量一网打尽。二十二日，荣禄派兵三千名，封锁北京各城门，断绝交通，搜捕改良派和帝党，许多人被捕下狱。这时，康有为已出北京，在英国人掩护下，逃往香港，后去日本；梁启超在日本人掩护下，化装逃出北京，直奔日本。谭嗣同在政变发生后还设法营救光绪帝。在他被捕前，有人劝他逃亡日本，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①表示愿为维新事业殉身的决心。九月二十八日，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同时被杀害，人们称之为“戊戌六君子”。其他大批参

^① 梁启超：《谭嗣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一〇九页。

预新政和倾向变法的官员，有的被革职，有的被放逐。顽固派发动的政变，结束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

政变后，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新政被废止。

三、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

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证明了他们企图通过点滴的改良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独立富强”，这只是梦想，是一条走不通的失败道路。

维新变法运动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君主立宪参预政权，以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帝国主义已经与清朝封建统治势力勾结起来建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条件下，这种改革要求妨碍中外反动派的利益，必然遭到它们拚命的反对和破坏。所以，维新变法运动只能是一种注定要破灭的幻想。

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是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他们的经济地位、政治要求和所受的教养，规定了他们存在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他们向封建主义妥协是不用说的了，就是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也表现了极度的软弱性。他们虽然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奔走呼号，但是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不仅根本没有勇气正面反对帝国主义，相反，还把变法改良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错误地把英、日等帝国主义看作可以帮助中国革新的“友邦”，企图依靠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来抵制另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

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①资产阶级改良派要依靠帝国主义决不可能挽救民族于危亡，只能是引狼入室，加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

在对待人民群众问题上，资产阶级改良派从唯心的英雄史观出发，非但不承认奴隶们创造历史的真理，相反，他们害怕人民革命运动，更甚于害怕反动势力。康、梁等人在开展变法活动中，就一再以“金田之役”、“法国革命”等作为教训，以“民变”纷起当作警钟，诬蔑革命群众是“乱匪”、“盗贼”等，改良派企图用维新变法当作防止革命、抵制革命的一种手段。这就使他们必然站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于是只能依靠皇帝以及象他们这样的一些“智者”。当他们遭到反动势力的反扑时，就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不得不陷于失败。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政治上的软弱和在思想上的缺乏战斗力是互为表里的。他们虽对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的儒学有过一些批判，但仅仅涉及一点皮毛而已，斗争很不得力。不但如此，康有为还为孔丘披上一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时髦服装，尊之为“托古改制”的“万世教主”，任其散布毒菌和臭气。这种借助于复古倒退祖师爷孔老二的亡灵来搞改革，也注定它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

改良主义运动，总是对抗革命，企图缓和阶级矛盾，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旧制度，使它得免于死亡，所以，本质上是反动的。但是，在十九世纪末年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才开始，人民群众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一页。

的斗争仍然处于感性的自发状态，一场新的农民革命运动的风暴正在酝酿，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而中国那时面临的现实，是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又是那样顽固、腐朽、黑暗，资产阶级改良派想改变这种状况，要求发奋变法，救亡图存，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过此以后，如果再谈改良主义，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了。可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却在维新变法运动宣告破产的半个世纪以后，在中国人民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新中国已经成立后，通过无耻地吹捧那部卖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竭力美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它歌功颂德，他们的罪恶目的，显然是要借此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

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也随即分化。一部分人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仍然死抱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不放，逆历史潮流而动，在政治上堕落为保皇派，辛亥革命以后，康有为、梁启超都公开地站到反革命营垒里去了，成为完全的反革命派，严复也堕落成为一个顽固的封建复辟分子。随着他们政治上的堕落，思想上也完全倒退成为狂热地鼓吹“孔教”的“孔家店”卫道士。

维新变法运动失败的历史告诉人们，要想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就必须拿起武器，起来造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第九章

义和团运动

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一、人民群众反侵略、反洋教斗争的高涨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以改良主义办法摆脱民族危机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便落到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肩上。一九〇〇年爆发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就是这场伟大斗争的产物。它是甲午战后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发展的高潮，也是长期以来遍及全国的反帝、反洋教斗争的总汇。

太平天国革命以后，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有了新的发展。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反洋教斗争，曾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现在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推动下，这个斗争又如火如荼地高涨起来。

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四川成都即发现反帝揭帖，传言外国人将攻占四川，愤怒的群众奋起焚毁帝国主义传教士的教堂、医院住宅，掀起了反帝反洋教风暴，嘉定、叙州、新津等州县人民立即响应，争打教堂，总计四川全省焚毁教堂七十余处。

同年八月，福建古田的秘密结社——斋教，在首领刘祥兴领导下，发动反洋教起义，攻打英国传教士聚居区和教会休养院，火烧教堂和洋人住宅，击毙击伤为非作歹的英国传教士十余人，给侵略者以应有的惩罚。

成都、古田的斗争，遥相呼应。帝国主义者大为震惊，气势汹汹地出动兵舰进行恫吓，胁迫清政府进行镇压。虽然这两处斗争被残酷地镇压了，但是群众的反抗怒火却愈益炽烈。

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间，湖南、湖北、四川、江西、江苏、贵州、山东等省数十州县，群众性的反教会斗争此伏彼起。一八九七年山东爆发了“巨野教案”（又称曹州教案）。

山东巨野县和其他地方一样，外国传教士和教民到处鱼肉乡民，蛮横异常。某村妇女在推磨时，打着驴子说：“你再叫，你再叫”，因“再叫”和“在教”的声音相同，就被教徒诬赖为骂他们是“驴”，遭到无理揪打，还强令赔礼道歉。传教士更是飞扬跋扈，公开叫嚷“天主教高出一切”，“神父见官高三级”。有的竟然向商人征税，有的甚至用钢刀威胁县官，成为地方上的太上皇。巨野人民忍无可忍，群起反抗。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巨野群众在大刀会领导下夜袭张家庄天主堂，杀死两名作恶多端的德国传教士。随后济宁、寿张、菏泽、成武等州县，相继爆发了烧毁教堂、教士住宅和痛打教士的斗争，反洋教斗争的风暴席卷了鲁南广大地区。

巨野教案发生后，久怀独占山东野心的德国侵略者认为时机已到，一面向清政府提出六项无理要求，强迫清政府对巨野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一面派兵舰闯入胶州湾，强占胶澳。清政府被迫答应赔偿修建教堂、传教士住房费二万四千两，

并下令地方官保护传教士安全，同时杀害了爱国群众多人。巨野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又被中外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了。一八九八年四川大足人民掀起大规模的反帝武装起义，发布檄文，声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提出“诛洋人”，“誓雪国耻”的战斗口号，号召人民“修我戈矛，各怀同泽之忠”，“逐异域之犬羊”。^①起义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势力遍及四川三十多个州县。

随着民族危机的发展，群众性的反瓜分、反教会斗争，如燎原之火，迅速燃遍全国，声势也越来越大。成为伟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导。

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义和团首先在山东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山东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很深的省区之一，全省教堂就有一千多所，传教士、教徒有八万之多。教堂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据点和罪恶渊藪。传教士既是间谍，又是横行不法的恶霸。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盗窃各种情报资料，霸占田产，逞凶杀人，包揽词讼，恣意勒索，收买流氓歹徒入教，制造种种事故，欺压中国人民。清政府的大小官员，慑于帝国主义的淫威，对传教士的种种无理要求，无不听命照办，对于所谓“民教纠纷”，总是“护教抑民”，以致“民冤不伸”，山东人民深受其害。甲午战争期间，山东人民备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战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山东又首当其冲。一八九七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就把山东变为它的势力范围，修筑胶济铁路，山东人民饱受

^① 徐庆堃辑：《余栋臣与四川农民反帝运动》，《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四期，第二十九—三十页。

侵略者的欺压。例如胶济铁路局员随意打路桩强占农民土地，遭到高密县农民的抵制，德军竟借口保路，残酷屠杀农民二十余人，还要挟清政府赔偿桩价、兵费三千四百余两；又如路局在高密县境内地势低洼的地方修造路基，阻塞田间水道，不肯造桥放水，引起农民反抗。巡抚袁世凯明知德国人恃强逞凶，但仍派兵替德国人镇压，这就更助长了侵略者的凶焰；铁路筑成后又夺走沿线依靠旧交通运输业谋生的大量工人的生计。一八九八年，英国强租威海卫，圈占文登、荣城两县地方，强迫界内农民纳税，推行残暴的殖民统治。

面对帝国主义的横暴侵略，山东人民拿起武器，奋起斗争，散布在民间的秘密结社义和拳、梅花拳、大刀会等，在反洋教斗争中壮大起来，逐渐融汇成统一的名称——义和拳。

义和团的前身叫义和拳，是许多反清的民间秘密结社的一种，属于白莲教中八卦教的一个支派。它的成员以练习拳棒著称，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在山东、河南、直隶一带从事反清秘密活动。一八〇八年清朝嘉庆帝的上谕中，首次提到义和拳这个组织的名字。义和拳一直以“反清复明”作为自己的宗旨，所以，长期以来，它被清政府看成是一种“邪教”，严禁传习，违者按“叛逆”治罪。但它仍在民间秘密发展。

义和拳的成员主要是贫苦农民、城市手工业者以及旧式水陆交通运输工人等劳苦群众，以农民为主体。正如一首歌谣说的那样：“义和团是穷人团，穷人个个不简单，穷人打仗为穷人，穷人才能保江山”。他们绝大多数是青少年，其中不少是劳动妇女，青年妇女参加“红灯照”，中年妇女参加“蓝灯照”。红灯照以手提红灯作标志，是妇女中的尖兵，参加战斗很勇敢。义和拳没有统一的组织，最基层的组织叫“坛”

(或叫“厂”)。一般一个村的义和拳组成一个坛。每坛有多少人,说法不一,有的说每坛二十五人,也有的说一百零八人。每坛有拳术教师,称“大师兄”。男团员称“大众”,彼此互称“师兄”,女团员称“二众”,彼此互称“姊妹”,在团内地位一律平等。合计若干最基层的“坛”称“团”,人数多者万余人。“团”再上面的组织,也是义和团中最高的组织仍旧称“团”,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的名称作为这些最高组织的名称,其中以“乾字团”和“坎字团”两个大团人数最多。各个大团的成员有不同的装束,例如“乾字团”打黄旗,团众身上缠黄带,头上裹黄巾,“坎字团”则用红旗、红带、红巾。各坛自成一个独立单位,互相之间没有固定的组织联系。但在需要联合行动时,可以散发帖子互相邀请。一般都由有威望的大坛出面召集,自发地集合起来,共同进行战斗。由于义和拳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它的成员有共同的战斗目标,所以能够做到“传单一出,千人立聚”,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使反动势力闻风丧胆。

义和拳有严格的纪律。参加者要向坛宣誓:遵守坛规,“灭洋人,杀赃官”。加入后一般自备口粮,“每日三餐,老米咸菜饭”^①;行军不擅入民房,“夜间席地而卧”^②;“途中相遇,秋毫无犯”^③。连清政府也不得不承认义和拳“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至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亦愈聚愈多”^④。充分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固有的高尚品质和农民战争的优良传统。

① 恒谦:《恒谦手札残稿》,《义和团》资料丛刊(四),第四二六页。

②③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义和团》资料丛刊(一),第三四六、二五〇页。

④ 《拳事杂记》,《义和团》资料丛刊(四),第八十八页。

义和拳首先打击那些罪大恶极的外国传教士和教民。从一八九八年起，山东的义和拳就在各地开展烧教堂，赶逐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山东地方官吏在处理所谓“民教案件”时，总是“袒教抑民”，不论是非曲直，教民必胜，平民必败。义和拳适应人民的要求，不但保护自己的会众，而且对未入会的群众也一律保护，“路遇不平，不惜躯命代为伸理”^①。因此，人民争先加入义和拳，以反抗教会的欺压，公称义和拳为“义民会”。

义和拳广泛散布揭帖、传单，大造革命舆论。他们提出：“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的口号，号召人们起来造反：“男的拿起刀，女的拿起枪，为的咱们国，为的咱们活”，“大师兄，砍洋头；二师姐，杀兽官；打倒洋和官，百姓有盼头”。还宣布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龙指的是光绪帝，二虎是指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一说荣禄）和老卖国贼李鸿章，三百羊是泛指其他仰仗洋势的贪官污吏。这得到广大劳苦群众的热烈响应。

义和拳在山东兴起后，清政府惊恐万分，连忙下令镇压，妄图扑灭刚刚燃起的革命火焰。一八九八年底，山东冠县人民起来烧教堂，德国帝国主义借口清政府无力镇压，出兵侵占日照、即墨、高密等地，胁迫清政府将山东巡抚张汝梅撤职。一八九九年三月清政府改派著名屠夫毓贤为山东巡抚。毓贤到任后，出告示禁止民间设厂习拳，派兵“剿办”义和拳，屠杀了大批拳民，但义和拳运动已成燎原之势，不可阻遏。戊戌政变后，西太后为了便于控制人民，下令全国各地

^① 劳乃宜：《拳案杂存》，《义和团》资料丛刊（四），第四五三页。

办保甲团练，毓贤就利用这个机会，出告示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表示承认它为民间团练，妄图用这样的办法来控制义和拳。义和拳依靠自己的斗争，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就以义和团名义在各县遍设拳坛，开展活动。义和团的斗争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

义和团中的一部分人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把口号由“反清复明”改变为“扶清灭洋”，这既反映了当时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暂时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也反映了阶级斗争的错综复杂，当时，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对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本质还认识不清。义和团虽在斗争实践中，在打击帝国主义的同时，也不断向它的走狗清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扶清”口号，却起了麻痹群众对清朝统治者的警惕的消极作用。

自一八九九年春天开始，义和团的造反大旗就插遍了山东大地，仅在平县八百六十余村庄，习拳地点就有八百余处。高唐、平原等地，也设立了许多拳厂。随着义和团组织的迅速扩大，反侵略斗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他们先后焚毁了在平县梁庄、八里庄、姚家庄等处的教堂，打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这年秋天的平原大捷，就是义和团同中外反动势力作殊死斗争中的第一次重大战役。

平原县处在山东省运河和黄河交叉的三角地带，这一带教会势力十分猖獗，加以自然灾害非常严重，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平原、高唐地区的义和团是山东义和团中最早起义的队伍之一，也是规模最大的组织之一。一八九九年九月，平原岗子李庄教徒、地主李金榜仗势欺压贫民，

并妄图阻止当地义和团练拳比武，义和团就同他作斗争。李金榜勾结知县蒋楷大肆搜捕义和团，团民六人被捕入狱。当地义和团为了营救蒙难战友，到在平请朱红灯前来援助。

朱红灯，山东泗水人，以行医为业，在长清县参加了义和团。由于他对帝国主义分子和贪官污吏斗争勇敢坚决，得到群众的拥护，成为当地义和团重要领导人之一。后来，他率领队伍向在平发展，与当地义和团首领本明和尚联合，势力迅速扩大。朱红灯得到求援消息，亲自率领附近几县的义和团前往平原参加战斗。

十月，蒋楷率军前来捕拿朱红灯，义和团奋起抵抗，把清军打得七零八落，狼狈逃窜。接着，毓贤又派兵到平原县镇压。朱红灯选定村庄东头的一所庙宇森罗殿为会战地点。因为这一带林深树密，居高临下，地势非常有利，所以把大队人马部署在这里。清军一到，立刻遭到义和团的迎头痛击，义和团战士猛打猛冲，大刀长矛并举，土枪土炮齐发，杀得清军丢盔弃甲。平原大捷对各地义和团和广大群众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持。此后朱红灯率领义和团继续转战在平、高唐等县。但由于对清政府缺乏应有的警惕，朱红灯和本明和尚不幸于十一月下旬被毓贤逮捕，惨遭杀害。广大义和团群众并没有因此气馁，他们在另一个首领王立言率领下坚持斗争，并开始建立马队，英勇转战于在平、恩县、平原一带。

从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〇年间，山东境内，除朱红灯率领的这支规模较大的义和团队伍外，其他许多州县的人民，也都在义和团的旗帜下开展了斗争，汇成了波澜壮阔的反帝怒涛，给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有力的打击。

帝国主义对义和团的迅速发展异常害怕。各国驻北京公

使不断催促清政府采取措施，镇压义和团。一八九九年十二月，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照会清政府，要求撤换毓贤，并指名调袁世凯去镇压义和团。清政府立即照办，改派袁世凯为山东巡抚。

袁世凯是个一贯媚外的帝国主义的忠实奴才。他带着“新建陆军”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到山东，随即大耍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一面四处张贴布告，要加入义和团的人“深自觉悟”，未入者“深自警惕”，并让地主恶霸在集市上讲解布告内容，以便“妇孺知之”，其恶毒用心，在于瓦解义和团。另一面则用“兵力剿办”。他发布《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八条，命令全省官员一齐动手，严厉镇压义和团，对凡是练拳或赞助拳坛者一律“杀无赦”；而且与部下约定：见义和团就杀，否则“将领以下概正法”^①。他还勾结德国在胶州湾的侵略军和各地教会武装镇压义和团。义和团首领王立言、王玉振等陆续被捕遇害。义和团群众遭杀害的不计其数。仅以东光县为例：方圆十里内，没有一棵树上不挂人头，没有一个人头不包红布。山东人民对袁世凯恨之入骨，“皆有欲杀之势”。当时民间流传一首歌谣：“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还有人在巡抚衙门的照墙上画了一幅漫画：一只头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伏在洋人屁股后面。^②这充分表明人民群众对袁世凯的切齿痛恨。袁世凯看到人民群众的这种愤怒情绪，十分惶恐，特地在卧室周围装上层层铁丝网。这也说明一切反动派表面上张牙舞爪，貌似强大，其实都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①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义和团》资料丛刊（一），第二五四页。

②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义和团》资料丛刊（一），第二五四页。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①袁世凯的屠杀政策并没有吓倒和征服山东人民。一九〇〇年春，山东义和团除留一部分继续战斗外，主力开始向直隶进军，与直隶的义和团会合，把反帝运动推向高潮。

三、义和团在斗争中发展壮大

在义和团主力从山东进入直隶之前，直隶南部以大名府为中心，已有义和团的活动。他们练习拳棒，开展反洋教斗争，并且对前来镇压的清军进行武装反抗。山东义和团主力进入直隶南部后，与当地义和团合成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他们到处遍贴揭帖，宣传义和团的宗旨，提出了“保护中原，驱逐洋寇”^②的口号，号召“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烧了毛子楼，灭了耶稣教”。得到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持，许多群众踊跃加入义和团，或在物质上给以支援。因此，他们的力量迅速壮大。

山东义和团又继续向直隶中部发展。一路沿着运河北上，直奔天津；另一路则指向芦汉铁路，进军北京。

义和团在直隶的迅速扩展，使得清朝统治阶级异常惊恐。一九〇〇年三月，直隶总督裕禄慌忙贴出告示，宣布对义和团“从严惩办，决不稍从宽贷”，进行残酷镇压。义和团一面反抗裕禄的军事镇压，同时，加紧号召广大群众参加战

① 《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六页。

② 包士杰：《拳日杂录》，《义和团》资料丛刊（四），第一四九页。

斗队伍，壮大声势。五月，涑水县的义和团联合定兴、涿州、易县等处义和团，攻打教堂，惩办了二十多名罪大恶极的传教士和教徒。裕禄急忙派副将杨福同带领军队前往涑水镇压。义和团立即将清军团团围住，战士们手执大刀长矛，冲入敌阵，痛歼敌人七十余名，杨福同也被砍死在马下。接着，义和团乘胜攻克北京南面的战略要地涿州。这时活动于涿州一带的义和团已达数万人。涿州城头，义旗飘扬，城厢内外，刀矛林立。革命力量在直隶境内进一步壮大起来了。

裕禄又急调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前往镇压。同时，他又从天津调兵直扑涑水。义和团为了截断清政府的运兵道路，粉碎反革命围攻，破坏了芦保线涿州以南到高碑店、以北到琉璃河的铁路；焚毁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芦沟桥和京城近郊的丰台等车站、连同西太后、光绪帝专用的“龙车”也被烧毁。芦保线电报不通，火车出轨。裕禄已无力控制直隶省，各地洋人纷纷向天津逃命，他的军队也只能“沿途护送”，不敢出发攻打义和团。义和团又分头发动进攻，把聂士成的军队压回天津。义和团打破裕禄的围攻计划后，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京、津地区进军。

从四月下旬起到六月初，京郊各县义和团三、五十人一队，不分昼夜，涌进北京一天多达几十起。成群结队的义和团战士，头裹红布，腰扎红带，穿着镶有红边的鞋袜，手持长矛，腰佩大刀，步伍堂堂，威风凛凛，高呼“杀洋鬼子”的口号，在北京大街上示威游行。他们还到处张贴“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等具有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内容的揭帖。在革命形势的鼓舞下，北京居民也纷纷参加义和团，几天之

内即达十余万人，城内设“坛”达八百多所，练习拳术，景山后面的宫墙下，每天都有大批青少年操练。前门外打磨厂等处的铁铺里，日夜炉火熊熊，为义和团赶制刀矛。连宫内太监、王公贵族也有不少混进义和团，乞求得到保护。这时，整个北京城已处在义和团的控制之下。义和团派人监视清政府的大小衙门和王公贵族的住宅，甚至冲进皇宫要搜查二毛子，吓得光绪帝浑身战慄，不敢露面。“杀洋鬼子！”的战斗呼声，更是响彻云霄，震撼全城。帝国主义分子闻声丧胆，为了逃避中国人民的惩罚，有的躲在棺材里装死，雇人吹打着，企图逃出城外，被义和团查获。曾经横行一时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人民革命的风暴面前，活现出一副纸老虎的原形。

义和团还将外国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改为“切洋街”，将御河桥改为“断洋桥”。这一切都表现了义和团对外国侵略者的切齿痛恨和极大蔑视。义和团的革命行动，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志。

与此同时，天津的义和团也展开了热火朝天的斗争。

天津是帝国主义在我国北方的重要侵略基地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侵略军就是从这里侵入北京的，当地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都记忆犹新，所以当义和团在山东兴起时，天津人民也开始组织义和团。一九〇〇年四、五月间，义和团在天津各处遍贴匿名揭帖，号召群众“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使得“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斯势萧然”。^①这种振奋人心的战斗口号，使义和团在

^①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义和团》资料丛刊（一），第一一二页。

天津地区的政治影响日益增长，为大队义和团进入天津准备了条件。

六月，大队义和团浩浩荡荡开进天津，同原在天津活动的义和团会合，声势更为壮大。他们“开狱放囚”，冲入海关道署的军械库，取出枪枝弹药武装自己。在城内大小铁铺制造武器，一时天津城内外“业冶铁者，家家铸刀，丁丁之声，日夜相续。”^①天津地方官曾出示禁止，也无人理睬。义和团还在府县大堂设立拳台，派团众看守城门、官署。天津同北京一样成了义和团的世界。团众在街上看到清政府官员坐轿或骑马，就喝令下来，脱帽傍立，连聂士成也被义和团追逐得抱头鼠窜。清政府官员一听到义和团就心惊肉跳，面色如土，昔日那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气焰，被扫得精光。义和团的行动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的志气。

义和团革命运动的狂飙，席卷整个京、津地区。封建统治者惊呼，“纪律法度，荡然无存”。帝国主义分子哀叹，“推动这个政府的一架槓杆（指总理衙门），现在已被压得粉碎。”^②充分显示了千百万投入革命斗争的人民群众的无穷威力。

四、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

义和团运动在北方的大爆发，特别是进入北京、天津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东北，一九〇〇年二、三月间，营口、锦州一带开始有义和团公开练拳舞刀，不久很多地方出现了“拳坛”。到

^① 罗惇颐：《拳变余闻》，见《庚子事变记》，神州国光社版第二十六页。

^② 《莫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二期，第十九页。

七月底，整个东北到处燃起了义和团的革命火炬，他们把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沙俄侵略者。烧掉了沙俄在辽阳茨儿山的煤矿和大沙岭的教堂；拆毁了北起开原、南到海城（仅鞍山站除外）的铁路、桥梁和车站；长春义和团焚毁了城内天主教堂、城外耶稣教堂和二道沟沙俄火车站。在瑗珲、呼兰等地，沙俄雇佣的华工烧毁了俄国修筑的桥梁、铁路和房屋。在几个月里，义和团几乎将帝国主义在东北修建起来的教堂、铁路、桥梁和车站全部烧掉，给帝国主义、特别是俄国侵略者以强有力的打击。

在山西，一九〇〇年五、六月义和团开始公开活动，到七月间即遍及全省。各地的教堂被捣毁达九十余处。太原义和团的声势很大，大街小巷都是“拳坛”。七月八日，太原周围的义和团汇合一起，开进县城。县官何宗逊假惺惺地率领地主绅士、吏役出城迎接义和团进县署，义和团首领高坐大堂上，喝令官绅参拜，并指着何宗逊鼻子大骂，“你是民贼！”吓得何宗逊全身打战，连话都说不出来。

内蒙古地区的反帝斗争烈火，也燃遍了千里草原。广大蒙、汉、回族人民奋勇参加反帝斗争，拿起武器攻打深沟高垒、拥有精锐武器的教堂，其中围攻萨拉齐二十四顷地天主教总堂的战斗最为激烈。英勇的义和团战士奋不顾身，争打头阵，攻破了敌人的防线，捉住了西南蒙古教区主教、罪大恶极的帝国主义分子韩默理，革命群众把他押到托克托进行公审，背上插小旗，上写“老洋魔”三个大字，拉着游街，围观群众人山人海，无不拍手称快。

河南的义和团与当地大刀会、江湖会等群众组织会合，在南阳和确山等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帝斗争。仅一九〇〇年

一年之内，河南全境教堂被毁四分之三，给帝国主义侵略者以严厉的惩罚。

一九〇〇年下半年，从长江下游到边远的西南、西北地区，都相继爆发了群众反帝斗争。七、八月间，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福建、广西、陕西、甘肃等省不少地方，出现了义和团的反帝揭帖。据记载，曾有义和团群众数人，深入到甘肃的凉州地方，遍贴揭帖。上海人民曾将义和团在北方斗争的胜利形势，绘制成地图，大量印刷，广为宣传，受雇于外国人处的中国佣工，也积极谋划杀死骑在他们头上的“洋人”，吓得帝国主义分子提心吊胆，赶忙调侵略军入城，保护他们的狗命和教堂；南方的厦门也出现了揭帖，宣传义和团由北到南，所向无敌的大好形势。八月间，浙江的白旗党、斋教起义，攻破江山、常山、开化县城；瞿州、台州、绍兴的教堂相继被毁。陕西渭南的哥老会、四川新繁的红教也相继发动起义，与义和团的斗争相呼应。云南箇旧的矿工，更聚众至数万人，快枪数千杆，准备驱逐法国侵略势力。秦皇岛的工人愤怒地燃毁了帝国主义分子在北戴河修起的安乐窝——大小洋房，直接地配合了义和团的斗争。

总之，在短短几个月内，北起黑龙江，南至广东，东自江浙，西到陕西、甘肃、云南，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帝怒潮。这些斗争有的由义和团进行，有的则由其他民间秘密结社发动，汇合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继太平天国革命之后的第二次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

第二节 八国联军的武装进攻和 义和团的英勇反抗

一、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惧和极端仇视。它们害怕在中国的侵略利益被革命洪流淹没净尽，担心义和团反帝斗争的胜利会在亚洲地区发生反响，引起殖民地统治的动摇。因此，帝国主义一再催逼清政府实行严厉镇压。清政府秉承主子的旨意，多次调兵遣将血腥屠杀义和团，但是英勇的义和团并没有被吓倒，他们踏着战友们的血迹昂首前进，迅速地控制了清政府统治的心脏——京、津地区，帝国主义眼看清政府这条走狗将要丧失它的作用，于是决定直接出兵镇压，并梦想趁机一举瓜分中国。

在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中，沙俄充当了急先锋的可耻角色。列宁曾经指出：“**现在沙皇不仅是欧洲的宪兵，而且是亚洲的宪兵，他力图用阴谋、金钱和最野蛮的暴力，把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一切争取自由的运动镇压下去。**”^①一九〇〇年四月，沙俄已把它的军舰开到大沽口，会同英、美、法三国军舰一齐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一再叫嚣清政府在两个月内不把义和团镇压下去，它们就要联合“以兵力伐之”。清政府对主子的斥责，诚惶诚恐，更加紧屠杀义和团。但帝国主义并不满足，俄国公使格尔思带头向总理衙门吵闹，要调兵入京“自卫”，各国使馆纷纷提出同样要求。它们按预定计划，悍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四七八页。

然派兵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一九〇〇年五月三十一日，英、法、美、意、日、俄以“保护”使馆、教堂为名，派兵三百多名由天津侵入北京。六月三日，德、奥兵七十五人陆续到达。七国军舰十六艘泊大沽口外示威。叫嚷，“只有列强有力坚决的合作才能制止运动”。六月十日，英、俄、美、日、德、意、法、奥八国侵略联军共二千一百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从天津出发，进犯北京。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正式爆发。

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沿京津铁路向北京进犯，由于路轨不断被义和团拆毁，特别是沿途受到义和团的英勇抵抗，侵略军伤亡很大，进展很慢。六月十一日，侵略军前锋到达落垡附近，当晚遭到义和团猛烈攻击，迫使敌军后退。十四日，侵略军进犯廊坊，被义和团包围起来，经过激烈战斗，侵略军被打得失魂落魄，向天津败逃，沿途又遭到义和团痛击。侵略军白天不敢走路，只好在夜间偷偷逃命，经过三天，才挣扎到天津郊区的西沽，在那里又受到义和团围攻，直到六月二十六日，西摩尔才带了残兵败将滚回天津租界。侵略军在这次进犯中死伤了近四百人，西摩尔后来心有余悸地说：“义和团所用西式大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义和团廊坊大捷，大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信心，对京、津保卫战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六月十六日，麇集于大沽口外的八国联军，在三十二艘军舰的支援下大举进犯大沽炮台，中国守军被迫抵抗，激战到十七日，击沉、击伤敌舰六艘，毙敌二百多名，由于寡不敌众，大沽失陷。帝国主义侵略联军从大沽登陆，向京、津地区猖狂进犯，义和团展开了保卫京、津的英勇战斗。

二、清政府的宣战骗局

清朝统治者从来就是仇视人民的，一心想用血腥的屠杀手段镇压义和团。但是，义和团的反抗怒火越烧越旺。这时清政府感到如果采取向帝国主义公开投降和继续镇压义和团的政策，自己的统治就有被愤怒的人民推翻的危险。于是就耍弄狡猾的反革命两面手法，表面上允许义和团合法存在，借以躲过人民革命斗争的锋芒，暗中却随时准备向帝国主义投降，共同绞杀义和团。

六月十七日，帝国主义侵略联军攻陷大沽口，局势发生急剧变化。这时又传来一件伪造的外交照会，其中一条是外国人要“太后归政皇帝”。“归政”就意味着帝国主义扶植光绪帝掌权，把西太后赶下台，这是她“万不能允之事”。西太后听到这个消息，极为恼火地说：“彼族焉敢干预予之权，是可忍，孰不可忍也！”^①她马上召集御前会议，要王公大臣议论“开战问题”，争吵一番，没有结果，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在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勉强向各国公使下“宣战书”，正式向各国侵略军“宣战”。在“宣战”上谕中说：“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②装出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但八天之后，它在拍给出使各国大臣的电报里，却赶忙命令他们向各国政府解释，说什么“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③西太

① 《景善日记》，《义和团》资料丛刊（一），第六十六页。

② 包士杰，《拳时杂录》，《义和团》资料丛刊（四），第一二五——二六页。

③ 《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六年六月癸酉（初三）谕。

后在事后追述当时情形也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即准备投降）。”^①清政府的所谓“宣战”，原来就是这样一场骗局。

“宣战”之后，清政府进一步对义和团进行欺骗和控制。它发给义和团米粮和银子，还假惺惺地称义和团为“义民”，并派刚毅等大官僚统率义和团。刚毅等人制订的“团规”中，规定各处义和团要服从由他们操纵的总团指挥，俘获的敌人和武器要交给清政府，团民不得反抗清军等，违背这些“团规”的就扣上“假团”的帽子，要照“匪徒”办理，格杀勿论。这些“团规”清楚地暴露了清政府控制和最后消灭义和团的险恶用心，许多义和团群众就是被指为“假团”惨遭杀害了。

与此同时，清政府暗中积极进行与帝国主义谋求妥协的活动。七月三日，清政府正式请求俄、英、日“念昔日交谊”，帮清政府向各国求和。接着，又下令将到期的外债照旧解还，调查被杀外国人及其“损失”的财产，准备加以“抚恤”和赔偿，并派人到被围困的驻华各使馆去送蔬菜、米面、西瓜、药品，进行“慰问”。清政府的这些丑恶表演，充分反映了半殖民地国家反动政府的奴性，说明了它向帝国主义“宣战”完全是演的假戏，勾结帝国主义消灭义和团，才是它的真正目的。

三、帝国主义策划下的“东南互保”

清政府摆出一副要同帝国主义开仗的架势，可是两广总

^① 吴永，《西狩丛谈》，《义和团》资料丛刊（三），第四三八页。

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却扬言“宣战”上谕是假的，拒不奉行，加紧和英帝国主义勾结，搞了一出所谓“东南互保”的丑剧。

长江流域是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它非常害怕义和团运动向南发展，使它在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遭到打击，而且还担心其他帝国主义势力乘机打入长江流域。它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就与东南各省的地方督抚勾结起来，进行分裂中国的罪恶活动。

东南沿海几省的督抚，大都是帝国主义长期培植的洋务派，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奴才。他们拥有新式军队和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对义和团运动极端仇恨，也急切希望和帝国主义合谋镇压义和团，以维护其地方统治势力，并企图趁清朝中央统治力量削弱的时机，依靠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势。所谓“东南互保”的丑剧，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场的。

一九〇〇年六月中旬，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华仑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通知刘坤一、张之洞，如果他们决心“维持秩序”，保护英人利益，将得到英国海军的支持。刘、张立即表示“极愿与英联络”，赶忙贴出“飭州县禁谣拿‘匪’，敢有生事，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力任保护”^①的告示，英国政府也马上命令它在上海的海军将领，将兵舰开到南京和汉口，以此表示对刘、张的“有力帮助”。

英国的这一行动，引起了其他帝国主义的妒忌，美、俄、德、法等国，纷纷提出异议，英国的独脚戏唱不下去了，

^① 《张之洞致江宁刘制电台》，《义和团》资料丛刊(三)，第三二七页。

只好改由各国共同策动东南军阀、买办“保护”长江流域的“秩序”。

六月二十六日，以上海道余联沅为代表，大买办盛宣怀为帮办，代表刘坤一、张之洞与上海各国领事在会审公廨开会，商定《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这里所谓的“保护”，就是镇压义和团，保护帝国主义侵略利益。“东南互保”的范围最初限于江西、江苏、安徽、湖北、湖南五省，后来扩大到广东、山东、浙江、福建等省，几乎占了半个中国。《东南互保章程》虽然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勾心斗角，加上当时形势的急剧变化，最后没有正式签字，但是这丝毫没有减少它所起的反动作用。这个《章程》不仅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了义和团运动的扩大和发展，而且使帝国主义得以集中兵力镇压北方的义和团。它是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外反动派互相勾结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另一种形式。从表面上看，它与清政府的“宣战”似乎有所抵触，但实质上两者并无二致，都是在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动路线指导下的产物。因之清政府在接到刘坤一等人的“东南互保”的报告时，认为他们的意见与清政府“正复相同”，同意他们的做法。西太后一伙供认说：曾谕令“各疆臣固守封圻，不令同时开衅，东南之所以明订约章，极力保护者，悉由遵奉谕旨不欲失和之意”。^①这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动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

^① 《有关义和团上谕》，《义和团》资料丛刊（四），第八十九页。

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①

四、义和团英勇抗击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后，立即沿铁路和海河，向天津进犯。就在这时，活动在直隶境内的义和团主要首领张德成、曹福田也分别率领其所辖的义和团迅速向天津集结，誓死保卫天津。

张德成，直隶静海人，出身船夫，自称所辖义和团为“天下第一团”。曹福田，也是静海人，出身行伍，一九〇〇年春活动于静海、盐山、庆云一带，后设坛于天津城内，是天津地区义和团的主要首领之一。

六月十七日，四百多侵略军从塘沽乘火车窜到陈家沟，被义和团及守护铁路的清军击退。第二天，沙俄侵略军两千人进犯天津通往北京的必经之地老龙头火车站，曹福田带领战士奋起反击，使侵略军的洋炮在近战中失去了效用。义和团的勇敢精神压倒了敌人，杀得他们狼狈逃窜。这一仗，打死打伤五百多名沙俄侵略军。与此同时，义和团向天津租界所在地紫竹林发动猛攻，部分清军也参加了战斗。被围在租界内的外国侵略军曾派人打白旗“求和”，妄图拖延时间，等待援军，伺机反扑，被义和团识破，予以拒绝，侵略军只好龟缩在租界里死守待援。

六月二十七日，曹福田向侵略军下了一道战书，豪迈地指出：“神兵到一处，一概不留。尔等六国数十载之雄风，一时丧尽。”^②并要侵略者滚出来，到旷野地方进行决战，显示

① 《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一八页。

②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义和团》资料丛刊（二），第二十五页。

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的浩然壮气。就在这一天，张德成率领团众五千人，分乘七十二只大船，从独流镇浩浩荡荡开进天津，投入攻打紫竹林租界的战斗。七月一日，张德成亲自指挥大军，向敌人发动强大攻势。义和团英雄们个个奋勇当先。女青少年组成的“红灯照”，冲杀在枪林弹雨之中，无所畏惧地攻打敌人。义和团迅速地占领了浮桥，直攻打到英、法租界交界处，烧毁了帝国主义的许多洋房，取得了辉煌战果。连日本的报纸也不得不报导说：“华人此次甚勇敢，为从来所未见，向尚不信其有此耐战之心，目下观之，彼等之勇敢及耐心之处，较被围西人之心更胜矣。”^①

义和团作战时，既勇敢又有智谋。帝国主义侵略军妄想阻止义和团前进，在紫竹林一带巷口，埋下许多地雷。张德成派人赶几十头牛，先冲进去，破坏了地雷阵，大队义和团随即冲杀上前，直攻到海关大道，把帝国主义的三井洋行和萨宝宝洋行全部焚毁。

义和团抗击外国侵略者取得的巨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天津人民，他们主动地送得胜饼、绿豆汤和其他物资给义和团和参与反侵略战争的士兵，积极支援前线。各家店铺、住户门上还用大红纸书写“义和神团，大得全胜”八个字，以示对义和团英雄们的热烈祝贺。

清政府想用武力消灭义和团的阴谋，随着形势的发展日益暴露。正当义和团同侵略军浴血奋战的时候，清政府却密令聂士成等人乘机屠杀义和团。这些反动家伙忠实执行清政府的投降路线，丧心病狂地把义和团放在最前线，充当清军

^① 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义和团》资料丛刊（三），第一九一页。

的“前驱”，并命令部下从背后向正在冲锋陷阵的义和团打黑炮，甚至明目张胆地指挥清军不打侵略者，专杀义和团，致使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惨死在清军大屠杀的血泊里。七月九日，聂士成在作战中败死，“帮办北洋军务”宋庆到天津主持战事，继续屠杀义和团。这就大大削弱了义和团的战斗力量，使侵略军得到喘息机会，进行反扑。七月十四日，天津失陷。义和团被迫转到城郊，继续同敌人进行艰苦的战斗。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沙俄自行宣布，俄军占领区为俄国财产，并强行成立俄租界，还伙同日、英等国侵略军组成“都统衙门”的殖民机构，对天津实行直接的军事统治。

义和团为保卫天津，同八国联军激战了一个多月，先后击毙美军上校团长、日军大队长、大队副各一名，及侵略军一千多名，英国领事也负了重伤，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支援了北京义和团的斗争。

在天津义和团与八国联军鏖战的同时，北京义和团也发动了对帝国主义强盗的进攻。战斗进行得最为激烈的是攻打公使馆和西什库教堂。

义和团进入北京后，帝国主义强盗不断进行武装挑衅，无故枪杀义和团群众，德国公使克林德带水兵一排，公然开枪打死在沙地上练拳的拳民二十多人。法、意、英等国的使馆卫队、随员也四出寻衅，枪杀了几十名义和团群众^①。美国公使就供认，到六月十五日的几天之内，“使馆卫兵杀戮拳众近百人之多。”帝国主义强盗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义和团和广大

^①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义和团》资料丛刊（二），第二二五—二二六页。

群众的无比愤恨。大沽炮台被侵占的消息传到北京，愤怒的群众更是怒不可遏，决心给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六月二十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向中国人民横蛮挑衅，当场被爱国士兵恩海打死。在这以前还处死了企图出城刺探情报的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侵略者竟以此为借口，出动武装进行疯狂反扑，义和团被迫对东交民巷使馆区发动猛烈的进攻。

北京方面义和团的主要首领是李来中。他率领义和团围攻使馆，用火攻战术，抛掷火炬和火药包等，不到三天就焚毁了比、奥、荷、意四国的使馆，侵略军的防线也一再被义和团攻破。七月十三日，义和团在法国使馆埋置地雷，炸毁使馆内洋楼一座；大队义和团一度突入法国使馆大厅，烧掉了这座侵略据点。一些清军士兵受到义和团的影响，在进攻使馆的战斗中，也积极配合作战。

在义和团的长期围困下，盘踞在使馆的侵略军失魂落魄，阵地越缩越小，尸体越堆越高，据他们自己供认，到七月二十日止，六十名日军中死伤四十五人，五十六名法军中死伤四十二人，五十四名德军中死伤三十人。^①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军也是伤亡累累。这伙强盗在义和团的有力打击下，有的绝望自杀，有的因极度恐惧而发疯。他们一听到义和团进攻的号声就惶恐万状，惊呼“听此声，可以使人之血凝而不流”。^②

义和团在攻打使馆的同时，还向法帝国主义的西什库教

①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义和团》资料丛刊（二），第三〇一页。

② 同上书，第二一六页。

堂发动进攻。义和团用土炮轰掉了钟楼楼顶，打落了正堂顶上的十字架，土火箭也发挥了威力，把教堂打成一片火海。义和团围攻这个侵略据点六十三天，歼灭了大量侵略军和反动教徒，城内人民积极支援义和团，断绝了教堂内粮食、蔬菜的供应，使侵略者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只是由于西太后、荣禄等卖国贼的破坏，才没有攻下来。

在义和团和外国侵略者浴血战斗的时候，清政府加紧进行投降求和活动，西太后在颁发“宣战”上谕几天后，就下令停止进攻使馆，并命荣禄往各使馆商议“和局”，甚至公然派清军在御河桥头竖起“钦奉懿旨，力护使馆”的木牌^①，表示竭力保护侵略者。七月六日，清政府又乞求俄、英、日三国政府向各国疏通，结束战事。八月七日，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哀求联军停战。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并不因清政府的迫切求和而有所收敛，它们准备攻下北京，以便恣意勒索。八月二日，八国联军约四万人从天津出发向北京进犯。沿途遭到义和团的英勇狙击。北仓一战，歼敌一千多名，杨村一战，又歼灭三百多人。但清军却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敌人于八月十三日占领通州。当日晚间，沙俄侵略军抢先对北京城发动进攻。十四日，北京失陷。这时西太后、光绪帝和一部分王公贵族狼狈万状，仓惶出逃，奔向太原，再逃往西安。九月，清统治者在流亡途中发布命令，公开出卖义和团，诬蔑义和团为“匪”，通令“官兵合力剿办”，要做到“斩尽杀绝”，还恬不知耻地向八国联军请求“助剿”，想用成千上万中国人民的头颅作为向帝国主义乞降的见面礼，真

^① 《景善日记》，《义和团》资料丛刊（一），第七十四页。

是无耻到了极点！

北京失陷后，帝国主义强盗把北京分成七个区，由各国侵略者分别管辖。

五、八国联军在京、津地区的野蛮暴行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陆续增兵到十万人左右，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当了联军的统帅，在他的指挥下，联军继续分兵四出攻掠，向东侵占了北京至山海关沿铁路线地区；向西侵入井陘、娘子关；向西北侵占张家口等地；向西南窜犯到保定一带。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抢劫，无恶不作。瓦德西曾下令“每逢我军（即八国联军）所到之处，均应尽力搜捕拳民，捕到之后，立即枪毙。”^①实际上侵略军不仅见到义和团民，而且见到普通老百姓，往往借故加以杀害。从大沽到天津、北京，侵略军经过的村庄“皆成颓垣废址”^②，至少有三十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原有五万居民的塘沽，在沙俄侵略军的烧杀下，“已无华人足迹”。^③侵略者攻陷天津后，每天都抢劫杀人，凡义和团众的住处，“无不枪炮齐施，痛加杀戮”，造成“积尸数里，高数尺”^④的惨状。联军侵占北京后，下令全军大杀、大抢、大烧三天，实际上烧杀抢劫从未间断。全城出现一片“枪炮轰击声，妇稚呼救声，街上尸骸枕藉”^⑤的屠杀情景，令人发指！与此同时进行的，是日以继夜的奸淫、抢劫，上自清朝皇宫，下至居民都遭洗劫，在抢劫财物时，沙俄侵略军把颐和园中收藏的历代文物大批盗走，对用不上搬不动的东西，就统统打得粉碎。他们的一个

①②③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资料丛刊（三），第二十八、十八页。

④ 佚名，《天津一日记》，《义和团》资料丛刊（二），第一五七页。

⑤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义和团》资料丛刊（二），第四七〇页。

头目林尼维奇在回国时，除行李外，还由北京带归十个大箱子，里面装满各种贵重物品。德国侵略军十分凶横野蛮，每到天黑就四出抢劫，还声称这是服从他们皇帝的命令。英军把抢到的东西集中到使馆拍卖，按官阶高低分赃。日军仅从户部就抢去三百万两库存银子，然后把衙署烧掉，妄想毁灭罪证。美军仅从天津盐道衙门抢走的银子，堆起来就是一座“三十英尺高，三十英尺宽”的“银山”。传教士、反动教徒也参加抢掠，如法国主教樊国樑一次就抢走了价值一百万两银子的财物，他还经法国大使“允准”，指挥教徒四处抢劫从中分肥。这样，皇宫、颐和园所有大量珍贵的历代文物，无论典章文物，还是国宝奇珍，都被帝国主义强盗洗劫一空，其中包括《永乐大典》大部分被劫去。据统计，这次被劫去珍本书籍共四万六千余册。中国人民在这次大浩劫中，所受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是极其惨重的。瓦德西对此供认不讳，他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①这就是帝国主义强盗在东方表演的“文明”。中国人民永远牢记这一血海深仇！

但是，长期以来，帝国主义为了混淆视听，掩饰它们的罪行，制造种种谎言，恶毒诽谤义和团是“杀人放火”、“残忍已极”的“匪徒”，诬蔑义和团运动是“残暴的仇外暴动”。

伟大领袖毛主席尖锐地指出：“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

^①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资料丛刊（三），第三十四页。

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① 严峻的历史事实证明：真正杀人放火的匪徒不是别人，正是这些披着人皮的帝国主义野兽，它们闯进中国的大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惨绝人寰的滔天罪行，而它们却想用贼喊捉贼的伎俩，掩盖罪行，这只能是欲盖弥彰，更加暴露它们的豺狼原形。

六、沙俄强占我国东北和它在东北的骇人暴行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曾愤怒地指出：沙俄“动员了好些军区，耗费了数亿卢布，派遣了几万名士兵到中国去，打了许多次仗，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的确，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淹死和屠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② 沙俄除了派遣大量军队参加八国联军，血腥镇压义和团外，还出动大批军队，对我国东北实行赤裸裸的军事占领。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叫嚷：“必须利用这个机会（指义和团运动），夺取整个满洲”。

一九〇〇年七月，沙俄政府调集军队十七万七千多人，分成六路侵入东北。侵略军先后占领了哈尔滨、瑷珲、营口、齐齐哈尔、盛京（今沈阳）等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数月之内，东北三省全被沙俄占领。

沙俄政府及其御用报纸，为此而得意忘形地“欢呼”俄罗

^① 引自《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

^②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三页。

斯“文明使命”在远东的新成功，叫嚣什么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等等，拼命煽动民族沙文主义的狂热。

究竟什么是“文明使命”？他们要“开导”些什么？墨写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沙俄在一九〇〇年一手制造的“海兰泡惨案”和血洗江东六十四屯事件，这是老沙皇欠下中国人民的一大笔血债，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

海兰泡原名孟家屯，位于瑗瑄(今爱辉)县对岸，沙俄侵占后改名布拉戈维申斯克。七月十六日，沙俄军警纷纷出动，把居住在城内及其近郊的中国居民几千人，赶到警察局去，声称要将中国居民遣送回国。从十七日到二十一日，他们把中国居民分批押往海兰泡北约十公里的黑龙江畔。当中国居民到达江边时，沙俄警官竟下令用鞭抽、刀刺、斧劈、枪击，将中国居民赶进江里，造成“骸骨漂溢，蔽满江津”^①的大惨案。至于财产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沙俄侵略者在制造海兰泡惨案的同时，又演出了血洗江东六十四屯的惨剧。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东岸，精奇里江(即结雅河)以南，面积达六千六百余方里，南北长一百四十里，东西宽五十至七十里。这里一向是中国的地方，聚居着中国汉、满、达斡尔等族人民两千多户、一万多人。历史上曾有过六十四个中国居民村屯，因此人们习惯地称这块地方为江东六十四屯。这片由中国人民长期辛勤开垦的肥沃土地，久已成为沙俄侵略者觊觎的对象，曾经多次企图加以侵占。七月十七日后，

① 《瑗瑄县志》。

沙俄骑兵几次冲进六十四屯进行血腥屠杀。他们挥着马刀，见人就砍，“驱各屯居民聚于一大屋中，焚毙无算。”^①也有不少人被驱入黑龙江中淹死。俄国侵略军将六十四屯财物抢劫一空后，放火烧掉全部村舍，强行占领了这一片中国领土。在这场大洗劫中，成千上万的中国居民死于非命，丧失财产三百余万元。

沙俄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干尽坏事。瑷珲城失陷后，被烧成灰烬，一千五百人被杀死；侵略军侵入牛庄时，屠杀了留在城中的老弱妇孺，又派骑兵赶到野外，围住逃难在那里的几千名中国居民，往来砍杀了好几个钟头，使这里留下一片血泊和几千具尸体。其他如哈尔滨、珲春、海城、盖平、铁岭等地居民被杀死的，数以千计。

俄国侵略军还将各地所藏库银、军械、火药、书籍、档案、地图搜罗一空，对居民商铺大肆洗劫。

所有这一切，就是沙俄侵略者带给中国人民的“文明使命”！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以极大的愤慨对沙俄的侵略暴行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它们就象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②但是今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者却竭力替老沙皇的侵略罪行辩解，胡说沙俄政府“给这个地区的部落和民族的历史命运带来根本的变化”，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以及当地居民的利益的”。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是老沙皇的继承人，是无产阶级的叛徒。

^① 《瑷珲县志》。

^②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五页。

沙俄侵略军的血腥暴行，更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极大愤慨，他们怀着对沙俄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猎户刘永和的领导下，一支声势浩大的“忠义军”高举“灭洋”的大旗，提出了“御俄寇，复国土”的战斗口号，转战于白山黑水间，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连克怀仁、宽甸、凤城和安东各城镇。另一股抗俄武装是我国鄂伦春族组织起来的，这支队伍有五百人，身强马壮，善于骑射，到处痛歼敌人。一部分清军士兵也配合作战。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给予沙俄侵略军严重的打击。连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在东北“常有武装完备之骑兵数百成群，袭击俄军，使其坐卧不宁”。^①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俄斗争，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沙俄以武力强占我国东北后，狂妄地提出要我国东北变为“黄俄罗斯”，妄图永远霸占。为此，俄军司令胁迫清政府盛京将军增祺，于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八日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其中规定：中国解散当地驻军，交出军火，拆毁炮台及火药局；中国供给俄军住房和粮食；中国政府在东北设行政机构及委派主要官员，要经俄国政府认可，俄国政府可派员驻盛京，预闻要公。这个“章程”如推广于东北全境，这一大片神圣领土就名存实亡了。

沙俄为了实现独立东北的野心，进一步逼迫清政府签订一项正式出卖东北的条约。一九〇一年一月初，清政府派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沙俄谈判。沙俄提出约稿一纸，其主要内容是：俄国继续留下一支军队驻扎在中国东北；中国

^①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资料丛刊（三），第一四〇页。

不得在东北设置军队，只准设巡捕，禁止将军火输入该地区；清政府任命东三省将军，须先与俄国商榷，每个将军处，俄国得派文、武官员各一名进行监督，东三省、蒙古和中国北部其他各省，未经俄国许可，无论何种权利，都不得让给别国；东三省与蒙古等处，中国不得建筑铁路；东三省关税归俄国人管理；中国付出赔款等等。^①沙俄政府提出的这些苛刻条款，比之《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更加狠毒。它不仅要把整个东北一口吞下，而且要将蒙古和新疆也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经过多次谈判，沙俄于三月十二日向杨儒蛮横地提出最后约稿十一款，限于两周内画押，不准更改一字。

沙俄妄图侵占东北的阴谋，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强烈反对。除东北各族人民纷纷拿起武器，与沙俄侵略军作殊死战斗外，全国各阶层人民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抗议沙俄的侵略罪行。沙俄在中国人民的反抗怒潮下，惊慌失措，加紧逼迫杨儒尽快签字，以使其在东北的侵略权利“合法化”。杨儒尚能维护主权，拒绝签字，沙俄的阴谋未能得逞。

第三节 义和团运动期间资产阶级各派系的活动

一、改良派对义和团的攻击和自立军起事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一个短时间里改变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关系。资产阶级的

^① 参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版第四册，第四六〇〇、四六二六——四六二七页。

各个政治派别——保皇会、自立会、兴中会都积极活动起来，企图乘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头目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但并没有从失败中醒悟过来，依然死抱住光绪皇帝，沿着改良主义的死胡同走下去。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了保皇会，号召拥护光绪帝，反对革命。梁启超在日本办了《清议报》，继续鼓吹改良主义。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改良派本能地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康、梁把义和团看作是洪水猛兽，比之为“蛇”、“豕”，咒骂义和团是“拳贼”、“乱匪”，是“反动力”的极端，主张依靠帝国主义剿灭义和团，改良派幻想借此来实现他们的维新美梦。康有为发动保皇会四出筹款，准备组织“勤王义军”，“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①，要帝国主义帮助光绪帝复辟，“务使帝党复用，新政再行”^②他还积极拥护、赞扬封建大官僚、买办、帝国主义策划的分裂中国的“东南互保”。康有为的弟子汪康年在其所办的《中外日报》上，更是连篇累牍地咒骂义和团，声嘶力竭地叫嚷：“乱民必宜剿，必不宜抚，宜急剿，必不宜缓”。^③改良派已完全堕落为仇视人民革命、逆历史潮流而行的反动政治势力。

与此同时，在康有为的策动下，坚持改良主义立场的唐才常，在长江中下游发动了自立军勤王起事。

唐才常，湖南改良派的一个重要首领，谭嗣同的好友，谭在北京任军机章京时，邀唐才常去北京参加新政机要，唐到达汉口时得到了政变的消息，立即逃亡日本，在日本与康、

①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册，第七十一页。

② 《论西人筹华以来变法得人第一》，《义和团》丛刊（四），第一八六页。

③ 《开厥渠魁说》，《义和团》丛刊（四）第一八三页。

梁会商，决定利用长江两岸的会党起兵“勤王”。一八九九年，唐才常回到上海，创立正气会（后改称自立会），作为策划起事的机关，并联络两湖、江西、安徽的哥老会和部分清军，组织自立军。一九〇〇年七月义和团运动在北方高涨，唐才常利用形势，在上海召集改良派人士开会，称“中国国会”，推容闳、严复任正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统筹全局。会议宣布三点宗旨：（一）保全中国自立主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不承认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帝复辟。这些主张是自相矛盾的。当时出席会议的章太炎就尖锐地指出：“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戴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①他劝唐才常不要被保皇党利用，唐不听，章太炎当场剪去发辫，表示与保皇派决裂。会后，自立军设总机关于武汉，决定在两湖、皖、赣等地起兵。唐才常又串通日本人劝大官僚张之洞接受自立军的拥护，宣布两湖独立。张之洞佯许不加干涉，但在起义前联络汉口英国领事，调兵包围了设在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逮捕了唐才常等三十多人，次日，又将唐等二十多名重要成员处死。

改良派仇视义和团，幻想依靠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地方实力派达到他们“勤王”的梦想，结果又碰得头破血流，这是改良派在走投无路中的最后一试。

二、兴中会的惠州起义

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兴中会，对义和团运动也采取了错误的立场，认为义和团是“乱民”，“妖言惑众，煽乱危邦，酿祸奸民。”主张镇压义和团，“平匪全交，乃为至理”^②。但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七十七页。

^② 同上书，第四集第九十三——九十四页。

是，兴中会与保皇党、自立会不同，它主张武力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国家。孙中山也看到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对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也决定利用时机再次发动武装起义。

孙中山派遣兴中会会员：郑士良到惠州发动起义，史坚如到广州联络会党响应，杨衢云、陈少白在香港筹备接济。孙中山自己也准备回国领导起义。当时，日本阴谋霸占福建，假意答应向兴中会供应军火。一九〇〇年十月，郑士良率领三合会众在惠州三洲田山寨起义，占领了新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地区，队伍发展到二万人，声势很大，但是由于军火接济不上，日本政府又禁止对革命党人提供武器，破坏了兴中会接济武器的计划，起义失败了。史坚如在广州策划响应也没有成功。

资产阶级革命派选择一条用武装斗争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道路是可贵的，但他们在一八九五年广州的武装斗争一开头就脱离和不发动群众，这次惠州起义不与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结合起来，拒民主革命主力军农民于千里之外，甚至还幻想帝国主义的援助，它的失败是必然的。中国资产阶级这种不发动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弱点，一直贯穿在以后的历次起义中，这是它的软弱本性所决定的。

第四节 《辛丑条约》的签订。义和团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

一、《辛丑条约》的签订

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帝国主义各怀鬼胎，都妄想乘机瓜分中国，展开了狗咬狗的斗争。“英国极不愿意法国进据

云南，日本占领福建。日本方面对于德国之据有山东，则认为危险万分。各国方面对于英人之垄断长江，认为势难坐视。”^①其中尤以英、俄两国的竞争最为激烈。沙俄武装侵占东北全境，并夺取英国投资兴筑的山海关至天津的铁路，积极收买芦汉铁路股票，准备把侵略势力扩张到长江流域，引起了英国的强烈不满。英、俄两国之间“业已趋到彼此相见以兵之可能”。日本对东北早有侵略野心，也激烈反对沙俄侵占东北。在各帝国主义激烈争夺、大有火并的情况下，美国在一九〇〇年七月间再次提出“门户开放”通牒，虚伪地主张“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其目的是要防止别国占领更多地盘，使美国“吃亏”，并借以笼络清朝统治者和欺骗中国人民，以便日后独吞中国。

但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是决不可能得逞的。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是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决定力量。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也使它们的阴谋难以实现。帝国主义既然不可能瓜分中国，就决定继续维持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统治，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实质上对中国实行共管。于是，由美、俄、日、英、德、法、意、奥、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十一国公使所组成的公使团，开始同由奕劻、李鸿章为首的清政府投降代表进行谈判。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一国公使团抛出了所谓《议和大纲》十二款，强迫清政府全盘接受，不许作丝毫更改。

西太后和光绪帝一行，在逃往西安的路上尽情享乐，沿途地方官为了供奉、投效这批落魄出逃的皇族官僚群，乘机

^①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资料丛刊（三），第八十五页。

向老百姓搜刮、勒索，随行的贵族、太监、官吏、军队沿途也疯狂抢劫、奸淫，闹得人民逃避，商店停市。到西安后，西太后仍然骄奢淫逸、歌舞昇平，令各省进贡名贵食物，她一个人每天开支膳费即达二百两白银，还硬说是“可谓省用”！在这批飞来蝗虫的啃噬下，陕西“人相食”，甘肃回民起义“逐满”，西太后一伙感到不安，急不可待地镇压人民起义，于是一再催促李鸿章等“务须仰体上意，早安大局”，向帝国主义投降。李鸿章把帝国主义开的《议和大纲》十二款寄到西安，西太后看到“十二款”中并没有要她下台的内容，也没有点名杀她的头，无异获得了赦免书，大喜过望，立即命令奕劻、李鸿章完全接受，并于一九〇一年二月发了一道卖国的“上谕”，向帝国主义表示从今以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①同时把帝国主义和清朝反动统治带给人民的灾祸，全部推到义和团身上，对义和团进行恶毒的污蔑和攻击。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奕劻、李鸿章与十一国的全权大臣签订了卖国条约，因这年是中国旧历辛丑年，所以把这个条约称为《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共十二条，除正约外，还有十九个附件。条约中除规定“惩凶”、“道歉”之外，有下列几项重要内容：

（一）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达九亿八千多万两（各地总督、巡抚与外国教会议订的地方性赔款共约二千万两还不在此内）。这是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一笔极其骇人听闻的勒索，历史上叫做“庚子赔款”（“庚子”是一九〇〇年的旧历年）。帝国主义强盗之中沙俄得款最多，连同利息共得二亿八千四百多万两，占赔款总额

^① 《有关义和团上谕》，《义和团》资料丛刊（四），第八十八页。

的百分之二十九，比英、日、美三国所得赔款的总和还要多。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得意忘形地叫嚷：“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①这笔赔款，清政府以海关关税和盐税偿付以前所借外债的剩余部分及常关税作担保；通商各口五十里内的常关税归总税务司管辖。这样，清政府除田赋外的所有重要税收，统归帝国主义管理。

（二）在北京划定外国“使馆区”，由外国驻兵“保护”，并规定在区内不准中国人居住。

（三）将大沽炮台及自北京到海口的所有炮台“一律削平”；允许外国军队在由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沿线十二处驻扎。

（四）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组织，“违者皆斩”；地方官对自己管辖的地区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这个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人民身上又强加上了一条新的异常沉重的锁链。首先，惊人的巨额赔款，更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贫困和社会经济的衰敝。当时清政府岁入不过八千万两，先前已借的外债已高达四亿两，再加这笔巨大赔款，清政府的财政彻底崩溃，叠床架屋的税捐一批又一批压到全国人民头上，广大人民的生计，几乎陷于绝境。其次，“使馆区”的设立，炮台的平毁以及北京至山海关一带驻扎外国军队，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国防安全。而且还规定中国人民永远不得反抗侵略者，清政府有义务替侵略者镇压中国人民的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

反抗。这表明清政府已完全成了帝国主义豢养的一条看门狗。《辛丑条约》的订立，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丑条约》订立后，西太后、光绪帝一伙在十月六日带行李车三千辆，满载搜刮的民脂民膏，从西安出发经河南、直隶等地，于一九〇二年一月三日回到北京，继续其万恶的腐朽统治。

二、义和团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在面临亡国大祸的严重关头，自发地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其斗争锋芒首先对准帝国主义强盗，从反侵略、反洋教，转到武装抗击八国联军。义和团的英雄们发扬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优良传统，用简陋的武器，抵御了武装到牙齿的外国侵略者。

在义和团运动以前，帝国主义者曾经狂妄地叫嚣，只需一万名现代化装备的侵略军，就能够横行全中国，并且一再发出瓜分中国的叫喊。义和团的英勇斗争狠狠地教训了这些狂妄的侵略者，粉碎了他们的迷梦。瓦德西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① 英国外交副大臣勃罗迭立克在议会演讲中也无可奈何地承认：“中国此后，仍须以华人治华地。……‘团匪’之事即可取以为鉴。”^② 法国一个议员在议会中谈到此事时，也哀叹“瓜分之说，不啻梦呓。”^③ 日本报纸也说：“即使欧洲列国分割支那，割据

①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资料丛刊（三），第二四四页。

② 王其鏊辑，《有关义和团舆论》，《义和团》资料丛刊（四），第二四九页。

③ 王其鏊辑，《有关义和团舆论》，《义和团》资料丛刊（四），第二四六页。

争雄，或为殖民，或为属土，然不能羁勒华人，必为华人所抗。”^①帝国主义列强尽管千方百计妄想瓜分中国，但经过义和团的打击，终于无法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阴谋，这是义和团运动最大的历史功绩。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②

义和团也狠狠地打击了国内封建势力，多次把前来镇压的清军打得大败，还一度控制了清朝统治的心脏地区北京和天津，严重地动摇了整个清朝的反动统治。《辛丑条约》签订后，义和团英雄们举起“扫清灭洋”大旗，继续坚持斗争。这一切都狠狠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同时进一步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本质，唤起了千百万人民起来推翻这个反动政府，从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继太平天国之后，农民阶级又一次独自发动了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把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史册上，谱写了又一曲壮丽的史诗。它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对于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国内外反动派历来都极端仇视，用各种恶毒的语言咒骂义和团。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者咬牙切齿地攻击说：“义和团运动是自发而组织很差的运动，起义者的思想浸透着神秘主义及迷

① 王其鏊辑：《有关义和团舆论》，《义和团》资料丛刊（四），第二五八页。

②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二八——一二九页。

信色彩，主要指望念咒和符咒。”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也恶毒咒骂义和团“杀人放火”，是“野蛮的”、“落后的”、“反动的”等等，这说明他们是一丘之貉，都是中国人民的死对头。

与此相反，无产阶级历来都热情讴歌义和团运动，痛斥那些形形色色的反动派所散播的无耻谰言。当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一方面派兵在中国土地上血腥镇压义和团，一方面又狂吠“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与文明”，为它们的侵略辩解时，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在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发表了《中国的战争》一文，满腔义愤地痛斥了俄国政府和其他帝国主义政府的滔天罪行。列宁说：“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再高度评价和赞扬义和团的英勇斗争业绩，把它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时期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指出义和团运动和百年来中国人民历次革命战争“都是义战”^②，“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③“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

①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四页。

②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四七页。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五页。

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① 这些科学论断，有力地批判了中外反动派的恶毒诽谤，肯定、歌颂了义和团的伟大革命精神，这种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革命精神，是中国人民战胜国内外反动派的传家宝。

义和团运动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疯狂镇压下失败了，它的失败再一次证明了农民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获得彻底解放，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五页。

第十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 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 的进一步加深

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全面深入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各国更加疯狂地追逐投资场所、原料供应和商品销售市场，对中国更加紧了掠夺。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三年，英、美、日、德、俄等国，利用《辛丑条约》的规定，强迫清政府改订了税则。英、美、日三国，又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了通商行船条约。这些条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扩大投资，从事掠夺性贸易，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外国商品和资本象潮水一样更加猛烈地涌进中国。

一八九五年，进口洋货的总值为一亿七千一百多万两，一九〇五年跃至四亿四千七百万两，十年间增长了二亿七千多万两，即增长了一倍半以上。国货的出口值，一八九五年是一亿四千三百多万两，一九一一年跃至三亿七千七百万两，十六年间增长了二亿三千四百多万两，超过了一倍半。同时，贸易入超也逐年增加，一九〇一年贸易入超值是九千八百多万两，至一九〇五年达到二亿一千九百万两，五年

间增加了一倍多。^①当时，国货的出口，绝大部分是农畜副产品，机制品数量极少，而进口货物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机制消费品，生产资料的进口比重不大，其中机器和大工具的进口则更少。

这种猛烈增长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一方面，它摧残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夺去了广大手工业者的饭碗，使他们濒于破产；另一方面，它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迫使农民抛弃了一些传统的重要家庭手工业，并使大宗农产品商品化，卷入世界市场。中国的农业成了帝国主义获取廉价原料和农副产品的基地，深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泥沼。

同时，帝国主义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

政治性贷款，是这个时期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一个主要项目。据统计，从一八九五年起至一九一二年止，清朝中央政府和一些省的地方政府，先后以支付赔款，兴办铁路、厂矿、邮政，支付军饷，弥补财政亏空，订购海军舰船等名目，向帝国主义列强借款一百一十二起，单本金就达库平银十二亿三百八十万两，其中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二年的借款是九十三起，本金为库平银七亿七千五百余万两。^②这些借款都附有苛刻的政治条款，要以关税、盐课、厘金乃至电报收入为担保，有些借款还要以某省的岁入税收，地方的烟酒税、出产税、茶厘、落地税、销场税等为担保，有的借款甚至还要以路权、矿权、工厂的资产和产品为抵押，以致借出款额最多的国家长期霸占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监督中国的财政。

^① 资料来源，陈重民编，《今世中国贸易通志》第一编，第四——五页。

^②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二十八——五十三页。

这些借款利息很重，一般是年利率百分之四——六，有的高达百分之十，有些借款还有苛刻的折扣。帝国主义通过这些借款，攫取了骇人听闻的暴利。例如，支付甲午战费和赔款的七次借款，从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一年的十七年间，即支付利息二亿四千二百余万两。“庚子赔款”，一九〇二至一九一一年的十年间，即支付了利息一亿八千七百多万两。^①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通过这些贷款，牢牢地控制了清政府的财政，把清政府变成了它们的税收工具，并以此操纵中国的政局。

铁路投资也是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一个重要项目。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九年，粤汉、沪宁、京绥、陇海、津浦、沪杭甬等十四条重要铁路干线陆续开筑，帝国主义用贷款的办法，夺取了这些铁路的修筑、用人、管理和监督财务的权力，控制了这些铁路。辛亥革命前，帝国主义贷给清政府的铁路借款达库平银三亿三千余万两，占清政府外债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七强。^②一九一一年，全国已成铁路九千六百十八公里，其中帝国主义直接经营和控制经营的占全国铁路的百分之九十三·一。^③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陆上的重要交通命脉，大大地便利了它们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和从事其他侵略活动。

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开办工厂的速度大大地加快了。见下表：

①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二四五页。

② 同上书，第二十六页。

③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一九〇页。

一八四〇——一八九四年外资在华主要
工厂资本与一八九五——一九一一年
设立的主要外厂资本比较^①

时 期	设 厂 家 数	设厂时资本额(千元)
1848—1894	23	7,631
1895—1900	29	24,264
1901—1911	91	73,969

从表上可以看出，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外资新设主要工厂的总数较甲午战前的五十年，多了近三倍，资本总额多了八倍半。与甲午战后的五年相比，厂矿数和资本额都增加二倍。随着这种投资的迅猛增长，外国资本象水银泻地一样，渗入了中国工业的各个部门，从重工业的机器制造、造船、矿冶到轻工业的纺织、火柴、烟草、肥皂等工业，几乎无孔不入，并形成了一批大的垄断性企业，如英商的怡和洋行、一九〇二年成立的英美烟草公司、一九〇六年日本组成的南满铁道（即长春至旅顺、大连的铁路）株式会社等。以“满铁”为例，日本以日俄战争中夺得的南满铁路、抚顺煤矿为基础，集资建立了这个庞大的垄断企业，成立时总资本即达二亿元。它的经营范围包括铁路、煤矿、铁路沿线城市的电灯、自来水、煤气等公用事业以及缫丝、染织、酿造、榨油、印刷、耐火砖、陶磁等工业，几乎垄断了南满的工业。一九

^① 资料来源，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第一——二页。一八四〇——一八九四年外资在华的“主要工厂资本”，是指开办时投资在一万元以上者。

○七年至一九一三年，“满铁”榨取了二千九百多万元暴利。^①

“满铁”还从事搜集侵华情报，策划侵略我国东北的罪恶活动，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大本营。辛亥革命前后，外国资本在中国工业中已形成了庞大的垄断势力，它们控制了机器产煤量的百分之九一·九，生铁生产的百分之百，铁路的百分之九三·一，^②其他如航运、棉纱、棉布市场帝国主义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垄断了中国工业经济的命脉，严重地打击、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随着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增长，银行逐渐形成为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重心和投资总枢纽。据统计，到一九一三年为止，外国在中国开设的银行，已达二十一家，一百零一个分支机构。这些银行利用贷款、投资等手段，控制了中国的工矿、交通运输事业，垄断了中国的金融财政，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庞大金融势力。

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不仅从中国掠取了几十亿元的暴利，而且通过这种掠夺活动，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二、列强在中国的角逐和日俄战争

列宁指出：“在金融资本时代，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独立国的斗争一定会特别尖锐起来。”^③《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列强之间争夺、分割在华势力范围的斗争也日趋激烈。

① 关于“满铁”的情况，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第三四〇—三五四页。

②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一二四、一二七、一九〇页。

③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八〇二页。

德国、日本与英国争夺长江流域的斗争，沙俄与英国争夺西藏的斗争，日本、美国与沙俄争夺东北的斗争，都大为加剧了。

东北是当时帝国主义侵华争夺的焦点，而日、俄之间的矛盾尤为尖锐。义和团运动期间，沙俄出兵侵入中国东北，并企图进行独占。这是同也想吞并整个东北的日本不相容的。美国和英国从它们的侵略利益出发，也反对沙俄侵占东北。美国企图利用日本与沙俄的冲突，从中渔利，进而攫取东北的利益。因此，它积极支持日本与沙俄对抗。英国为了长期霸占中国长江流域和侵略中国边疆地区，竭力防范俄国势力的南下。由于欧洲局势的紧张，英国希望找到一种恰当的力量，以抵制沙俄在远东的势力，野心勃勃的日本就成了它的理想工具。日本鉴于自身力量的不足，当然切望英国的支持。一九〇二年一月，英、日签订了反对沙俄的军事同盟条约。列宁指出：“1902年，英国同日本结成联盟，准备了日本对俄国的战争。”^①

日、英、美三国结成了反对沙俄的阵线，三国政府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清政府要求俄军撤出东三省。沙俄见形势不妙，于一九〇二年四月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中除了重申沙俄在东北的特权外，规定沙俄在十八个月内分三期撤出在东北的军队。但是，俄国根本无意撤军，第一期撤军时，只是把驻奉天、牛庄、辽阳等城市的一部分俄军，撤到铁路两旁，转换了一下阵地。一九〇二年十月，沙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满洲必须归并给俄国，至少要成为完全依附于俄国的属国”，赤裸裸地要吞并中国

^① 《论单独讲和》，《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二六页。

东北。一九〇三年四月，第二期撤兵时，沙俄拒不实行，并蛮横地向清政府提出七项要求：“一、中国不得将东三省之地让与他国或租赁与他国。二、自营口至北京电线，中国宜许俄国别架一线。三、无论欲办何事，不得聘用他国人。四、营口海关税，宜归华俄道胜银行收储，税务司必用俄人，并以税关管理检疫事务。五、除营口以外，不得开为通商口岸。六、蒙古行政悉当仍旧。七、北京事变以前，俄国所得利益，不得令有变更。”^①声称必须承认其要求才能撤兵。接着，一九〇三年五月沙皇又召开御前会议，决定：（一）废除交还满洲条约；（二）从欧俄方面调兵东下，增加在满洲的兵力；（三）在满洲设置处于俄国保护下的特别区域。八月，俄国在远东设立特别总督。沙皇任命关东军总司令阿莱克塞也夫为远东大总督，授予“所辖境内之最高行政权”，“维持当地秩序及保护中东铁路利益之最高权。在大总督邻接领土内俄国人民之利益与欲望之注意及保护，亦均付托之。”^②并统领俄国太平洋舰队和远东的陆军。老沙皇凶相毕露，公然把中国东北当作它的殖民地，妄图永久占领。日本依仗英、美的支持，早就决心对俄一战。一九〇四年二月八日，日本联合舰队袭击俄国舰队于旅顺，十日，日、俄双方正式宣战。

日、俄两个强盗在中国领土上厮杀起来，日本想在对俄作战中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压迫清政府站在日本一边。沙俄也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希望清政府和它站在一起。美国为了保障自己的侵华利益，表示要使战争局部化。腐朽透顶的清政府，不但无力防止战争在中国领土上发生，战争爆发后

^① 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第一八六——一八七页。

^② 同上书，第一八九页。

连抗议也不敢提一个，反而卑躬屈膝地声明“日俄两国均系友邦”，宣布在战争中“严守中立”，并把辽河以东地区划为战场，严令各地官吏加强对人民的镇压。这件事再次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日、俄两国军队在中国东北和海上进行了几场激战，俄国海军遭到了惨败，陆军也告败北。一九〇五年九月，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双方在美国的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主要内容有：沙俄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割让库页岛南部与日本；沙俄从中国夺取的旅顺、大连及其附属权益，无偿让给日本；沙俄霸占的中国南满铁路及其附属权益，也无偿地让给日本。这是日、俄瓜分中国东北的一个帝国主义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日本又强迫清政府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清政府承认了日本在南满的特权，并允许日本在沈阳、营口、安东划定租界，允许日本在鸭绿江右岸地方设置木植公司，采伐木材。从此日本控制了中国东北南部，沙俄控制了东北北部，疯狂地加紧对东北的掠夺，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日俄战争是一场列强争夺中国东北的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为期一年半的战争期间，日、俄双方都强征中国的人力物力，洗劫了许多地区，战争的炮火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无辜死亡、残废，无数的家室被毁，禾苗被糟蹋，单辽宁海城、盖县两地，受害的村庄就有三百多个，八千多户，五万多人。从旅顺到开原，纵横千里，几同赤地。这场战争，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东北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破坏铁路，割断电线，烧毁敌人的仓库，袭击俄国侵略军，夺取他们的辎重马

匹，打得他们惊恐不宁，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保卫祖国领土的坚强决心。这场战争，也教育了当时的许多爱国人民，加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三、英国对西藏的侵略

英国对中国西藏，一直抱有很大的野心。沙俄对西藏的觊觎也由来已久。一八九五年达赖十三世亲政，沙皇积极拉拢达赖，阴谋分裂、吞并西藏。俄国势力的深入西藏，使得英、俄矛盾尖锐起来。一九〇三年十二月，英国利用沙俄侵略中国东北和日、俄矛盾激化的时机，悍然派兵入侵西藏，对中国发动了新的侵略战争。

英国侵略军入侵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立即发布动员令，调动西藏地方部队抗击。一九〇四年英军侵犯江孜，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我国西藏人民，威武不屈，为保卫江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用土枪、大刀与敌人英勇搏斗，不断袭击英军营地，夺回了宗政府。后来，侵略者增派援兵，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西藏地方部队退守山上阵地，用火药枪和石块抗击英军，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最后，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江孜陷落，但是藏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统一的光辉业绩，是永远值得歌颂的。

英国侵略西藏，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许多报纸积极声援当地军民的抗英斗争，表现了我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决心。

一九〇四年八月，英军攻下拉萨，烧杀抢劫，破坏寺庙，劫掠我国的珍贵文物，据一个帝国主义分子供认，他们在西藏劫掠的文物，“件数的多，须有四百多骡子才能驮运。里边包含有许多珍贵而稀罕的喇嘛书籍，神像、宗教作品、盔甲、

武器、图画、瓷皿等物。”^①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英军侵占拉萨时，达赖十三世事前离开拉萨经青海北上。一九〇四年九月，英国强迫噶布伦等三大寺负责人签订所谓《拉萨条约》，又胁迫噶尔丹寺长在约文上加盖达赖十三世留下的印件。“条约”规定给予英国极为广泛的政治、经济特权，包括开放江孜、噶大克等地为商埠，对英赔款，拆毁边界至拉萨的防御工事等等，实际上就是把西藏变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严重地损害了我国的主权，遭到了全国人民特别是藏族人民的坚决反对，清政府也不予承认。后来，在英国的压力下，清政府派代表与英国重新交涉，于一九〇六年四月，双方重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六款，英国取得了原来《拉萨条约》中的许多侵略权益，但条约规定英国“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使它企图分割中国领土西藏的阴谋没有得逞。

四、适应帝国主义需要的“维新新政”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采取了维持清朝反动统治，把它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工具的反动政策。但是，中国人民从义和团英雄们留下的血的教训中，逐步看清楚了清政府的反动本质，决心推翻这个卖国政府。清朝统治集团面对着全国人民的反抗怒涛，惊恐不安，感到照老样子统治下去是不行了，需要改变它的反革命策略，一方面以小恩小惠的改良来笼络资产阶级，缓和人民的不满；另一方面调整、加强它的反革命统治机器，满足帝国主义的要求，伺机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拣起了三年前还被他们宣布为“叛逆”的“变法”旗号，推

^① 麦克唐纳：《旅藏二十年》，孙梅生、黄次书中译本，第二十六页。

行起他们的“新政”来。

一九〇一年，西太后逃到西安，惊魂未定，立即发布“变法”上谕，表示要改革“治法”，谋求“富强”。同年三月设立了“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办“新政”的机关。从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五年，清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变法命令、章程，实施了一些“新政”。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军事方面：设立练兵处，编练新军，淘汰绿营、防勇，在各省设立武备学堂。这是“新政”的一项主要内容。清朝统治集团感到，他们的军队绿营、防勇已腐败不堪，而甲午战后主要是袁世凯在小站开始编练的新军，又为数太少，难于担当镇压国内革命的任务。因此急于依靠帝国主义编练出一支新的反革命军队，以巩固它的反动统治。新军的编练完全依照帝国主义国家的做法，称常备军，计划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以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镇（相当于师），每镇辖步队二协（旅），马队一标（团），炮队一标，工程队一营，辎重一营。聘帝国主义分子为“顾问”、“教习”，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掌握了编练新军的实权。至一九〇五年，他基本上已完成了北洋六镇新军的编练。这支反革命军队，成了他日后进行反革命窃国活动的资本。

政治制度方面：西太后在一九〇一年上谕中已明白表示：“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①“新政”丝毫没有触动清朝的政治制度，只是形式上裁撤了一些旧衙门和胥吏差役，增设了一些新衙门。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清政府把总理各国事

^①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版第四册，第四六〇一页。

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列为六部之首。并在中央和地方的一些统治机构里，聘用了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当顾问，如美国前菲律宾经济专员精奇，成了清朝中央的财政顾问，日本的坂西少佐成了直隶督练公所的军事顾问，这就清楚地看出所谓“新政”的半殖民地性质。

经济方面：清政府于一九〇三年设立了商部，制定、颁布了一些章程，如《商标注册暂拟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重订矿务暂行章程》、《公司奖励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公司律》等，这些章程对帝国主义利益倍加照顾，宣布保护外国商标和外国人在铁路、厂矿方面的一切投资，并规定外国人可以集资开矿，以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同时，在这些章程里，清政府还宣布可以自由发展实业，奖励、保护资本家兴办企业，允许资产阶级组织商会，并可以向商部提供意见和建议。清政府的目的是要分化、笼络资产阶级，缓和人民的不满，并从资产阶级身上开辟财源，解决它濒于崩溃的财政困难。

清政府的这些“经济改革”，是在保护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前提下进行的。

文化教育方面：自一九〇一年以后，清政府公布了一系列《学堂章程》，把各省的书院，在省城的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的改设中学堂，各县的改设小学堂，增设西学科目，但规定不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都要实行“忠君”、“尊孔”、“读经”。清政府还命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并制定了学堂选举鼓励章程，凡由学堂毕业考取合格的，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名称。一九〇一年下令乡会试改试策论，废除八股。一九〇五年又废除科举制度。显然这些都是一种

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教育改革。清政府又颁布了《约束游学章程》和《学堂管理通例》，力图把留学生和国内学生控制在封建统治的范围内，但这些反动措施无法阻挡爱国青年追求救国真理，走向革命的历史潮流。

清政府这些“新政”的基本内容，是从康、梁的戊戌新政中搬来的。如果说，康、梁当年精心设计的这些改良主义的办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多少有一点进步意义的话，那么，现在西太后以她当年所深恶痛绝的东西，去讨好帝国主义，拉拢一部份资产阶级，欺骗广大人民，阻挡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就完全是反动的了。从根本上说，这个“新政”是半殖民地中国大地主阶级对付人民革命的自固运动，它适应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需要，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它大大地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第二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

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的疯狂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国内铁路、轮船、电报等新式交通、通讯工具的发展，加速了鸦片战争以来日益破坏的自然经济的解体，扩大了商品销售市场和劳动力供应市场，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继续造成了一些客观条件。列宁指出：“**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①同时，帝国主义侵略的全面深入，深重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七八五页。

的民族危机，迫使中国人民奋起救亡图存，要求“设厂自救”，收回被清政府出卖的路权、矿权，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一九〇五年前后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直接推动了当时民族工业的发展。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获得了初步的发展。据统计，从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一年间，新设厂矿四百九十家，资本共一亿一千一百多万元。^①较前二十余年厂矿数增加了近五倍，资本额增加了四倍多。特别是棉纱、缫丝、面粉等轻工业，发展更为明显。

棉纱业共设厂十九家，每厂平均资本额五十五万元，达到了一定的建厂水平。全国纱锭总数一八九四年是十二万九千枚，至一九一一年增至四十九万七千多枚，增长了三倍多。^②面粉厂共设三十九家，厂址遍及上海、无锡、南通、沙市、哈尔滨、宁古塔等地。

采矿业也有了发展，如煤矿工业，一八九五至一九〇〇年共开设矿场和煤矿公司十二个，资本额共四百余万元；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一年共开办三十个，资本额共一千余万元。^③后十年与前五年比较，不论矿数或资本额，都有了较大的增长。一些规模较大的煤矿，如山东的中兴煤矿、山西平定的保晋公司，都是在这个时期创办的。

其他如火柴、皂烛、卷烟、制茶、制糖、榨油等手工工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有些手工作坊和工场逐步向机器生产过渡。如山东烟台的缫丝业，天津的肥皂工场，都逐步采用

① 据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第六五七页计算。

②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一〇七、一〇八页。

③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第八七〇——八七二页。

了机器。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还是微弱的，显露出了很大的弱点。首先，民族工业力量孱弱，它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的比重十分微小，与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相比，又处于明显的劣势。民族工业在生产规模、资本、技术等方面，都远不如外资工矿。以资本力量比较，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一年，中国自设厂矿四百九十家，资本总额一亿一千一百三十多万元，平均每个厂矿资本二十二万余元；外资厂矿共一百二十家，资本总额九千八百二十三万余元，平均每家八十一万余元，等于中国厂矿的三倍半多。^①以动力、技术水平比较，民族工业也远远不如外资厂矿。不少民族资本厂矿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有的实际上还只是手工工场。同时，民族工业的投资始终集中于缫丝、棉纱、面粉等轻工业部门，重工业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民族工业的这种脆弱情况，使它很难与外资竞争，始终处于受外资摧残的地位。

民族工业的孱弱，还表现在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关系中。由于民族工业的机器、技术都仰赖于帝国主义，加上资金困难，缺乏经营经验，又受到封建制度的束缚，一些民族资本家就想依赖外国资本的荫庇，求得生存和发展。这就使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发生了不解之缘。同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这时期由工场主、商人转化来开办的比重有所增加，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要社会阶级基础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力量壮大了，但官僚、地主转化的资

^①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第三九九页。

本家仍占着重要地位。有的资本家是“亦官亦商”，有的资本家拥有大量的封建田产，进行地租剥削。例如江苏的张謇，是清朝的状元，一八九五年他在大官僚的支持下开办通州大生纱厂，以后凭借封建势力的支持，开办了十八个企业，参加九个企业的投资，又当上清朝中央农工商部的头等顾问官。他还拥有三千二百多亩土地，从事封建剥削，实际上是个身兼高级官绅的大资本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这种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妥协性。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这种孱弱状况，是由帝国主义的压迫、封建主义的束缚所造成的。即使在民族工业发展较快的时期，一些工厂在外资的打击下，也纷纷破产，或濒于绝境。例如沿海各埠的大火柴厂，包括上海的荣昌、燧昌等厂，由于日本火柴的倾销而先后倒闭。外国资本还利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困难，通过贷款兼并民族工业，如中国商办纱厂，一九一三年前共十八家，被外资兼并的就有裕晋、兴泰、大纯、九成等四家。因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特别是中小企业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日益尖锐。

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扩大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力量，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尖锐矛盾，推动着中国资产阶级走上民主革命的历史舞台。

二、资产阶级爱国民主运动的勃兴和革命团体的相继建立

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推动着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运动向前发展。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兴起，革命团体象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建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

这股历史潮流，首先在爱国的留学生中激荡起来。甲午战争，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后，许多爱国知识分子悲愤欲绝，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纷纷出国留学。“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①于是一大批知识分子涌向日本，一九〇六年留日学生达到了八千多人。许多留学生身处异国，忧心于祖国的危亡，积极开展救国革命活动，组织爱国团体，出版报纸刊物，揭露清朝的反动统治，宣传革命思想。一九〇一年，参加自立军起事的知识分子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创办《国民报》，组织了国民会，吸取改良主义运动失败的教训，主张革命救亡图存。一九〇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这是明朝最末一个皇帝自杀的一天），章太炎在日本发起举行“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用纪念明朝的灭亡来激发革命热情，宣传“革命排满”主张。接着留学生中又组织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爱国留学生还出版了《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四川》等刊物，宣传爱国革命思想，并把自己的活动与国内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

一九〇二年，蔡元培与从日本回国的章太炎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国教育会，由蔡元培任会长，以教育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教育会又创办了爱国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〇七页。

学社，由蔡元培、章太炎等任教员，“校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出版物有《学生世界》，持论尤为激烈”。^①中国教育会还与上海的《苏报》建立了联系，积极进行革命宣传。促使不少爱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的道路，推动着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一九〇三年发生了拒法、拒俄运动。三月，清朝广西巡抚王之春，准备出卖滇桂矿权，以向法国借兵借款，镇压广西的农民起义。这个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对。广西旅居上海的爱国绅商和其他爱国人士，在张园召开拒法大会，会上提出了驱逐王之春出广西的口号。接着于四月间，又掀起了规模巨大的拒俄运动。沙俄妄图永久霸占中国东北，拒绝撤出侵略军，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全国许多地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东北人民奋起武装抵抗，到处袭击俄国侵略军，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举行集会，上书请愿，要求清政府出兵抗敌；上海爱国学社召开拒俄集会，声讨沙俄的侵略罪行，并通电全国，呼吁各界奋起拒俄；武汉等地的学生也纷纷起来抗议；东京留日学生召开了拒俄大会，群情激愤，同声斥责沙俄的侵略，要求清政府进行抵抗，并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名军国民教育会）。到会的五百人中，当场就有二百人报名参加，并有十几名女留学生报名随军担任看护工作，准备去东三省打击俄国侵略者，表现了可贵的反帝爱国热情。他们派代表回国，要求效命疆场，但遭到了清政府的镇压。拒俄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保卫祖国领土，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崇高革命精神，激励着中国人民前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一一八页。

仆后继地进行反侵略斗争。

一九〇五年全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美爱国运动。美国资本家为了攫取暴利，曾用招募、拐骗、绑架等卑鄙手段，胁迫大批华工赴美国西部筑路开矿，修建城市。但当西部开发后，美国资本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转移国内工人的斗争目标，就不断地鼓吹种族主义，煽动排华运动，任意解雇、迫害、虐杀华工。一八八四年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排斥华工的《中美会订条约》，于一九〇四年期满，美国妄图胁迫清政府重订更苛刻的新约。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废约改订，制止美帝国主义的排华暴行，并立即掀起了群众性的反美爱国运动。

一九〇五年五月上海工商界召开商务总会，提出五项抵制美货办法：不购用美国货；不用美船运货；不应聘美国行商；劝令美国人雇佣的仆役停工；中国人子弟不入美国学校读书。并通电汉口等二十一处商会，呼吁抵制美货。全国大小城镇纷纷响应，许多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积极投入斗争，宣布不用美货，要求废除华工条约。南洋、日本、美洲、欧洲等地的爱国华侨也纷起响应。

美帝国主义十分仇视中国人民的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强迫清政府下令禁止抵制美货，并千方百计进行破坏。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压力下，中途退出了运动，致使运动半途而废。但由于广大群众的坚决斗争，迫使清政府不敢公然再与美国签订华工新约。同时，这个时期美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数量显著减少，给美帝国主义相当沉重的打击。

在反美爱国运动的激荡下，各地收回铁路和矿权的斗争，

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九〇四年四川人民奋起反对清政府出卖川汉路权，要求自行筹建；湖南、湖北、广东人民要求废除与美国公司签订的出卖粤汉路的合同，争回自行筹款修建；一九〇五年浙江爆发了收回沪杭甬铁路的斗争；一九〇六年广东发生了收回广九铁路的斗争；一九〇七年山西人民经过长期斗争，收回了被英商福公司霸占的孟县、平安、潞安、泽州和平阳五处矿产，设立了保晋矿务公司，自行开采。收回路矿利权运动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爱国民主运动高涨的过程中，相继建立了几个较大的革命团体。

一九〇四年初，原军国民教育会浙江籍留学生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合作，在上海成立光复会，推蔡元培为会长，联络浙江一带会党，进行革命活动。同年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为了更好地联络会党，成立了龙华会。《龙华会章程》中明确提出，要用革命的办法赶走满族贵族，推翻清朝统治，“并且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豪富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呢。”^①龙华会的革命宗旨，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愿望，得到了江苏、浙江和安徽一带会党群众的欢迎，形成了长江下游的一个较大的革命团体。

一九〇四年二月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人在湖南长沙成立了华兴会，提出“驱逐鞑虏，复兴中华”的口号；并另设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机关。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和会众近十万人相继参加了同仇会。黄兴等计划于阴历十月初十、西

^① 《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一），第五〇四页。

太后七十岁生日那天，借助会党力量在长沙发动起义，并在常德、衡州、岳州、宝庆等处策动响应。但在起义前十天，因奸细告密事机洩露，遭到清政府残酷镇压，黄兴、宋教仁等逃往上海，后去日本。

当华兴会在湖南开展活动时，湖北爱国青年以科学补习所名义秘密进行革命活动，遭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破坏。一九〇五年原科学补习所人员刘静庵，把武昌高家巷圣公会的日知会阅报室改造成革命机关，称日知会，每逢星期日“公开演讲，阐述世界大势，本国危机，及现今救亡之道”^①，武汉新军和学生界中不少人陆续参加了日知会。日知会成为武汉地区有力量的革命团体。

光复会、华兴会、日知会等革命团体的出现，在组织上为中国同盟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反孔宣传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②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领导、组织爱国民主运动，筹建革命团体的同时，大造革命舆论，开展宣传活动。当时，这些宣传活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重印揭露清初统治者罪行的著作，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用以激发反清革命思想。（二）编译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有关著作，介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如留日学生刊行的《译书汇编》译载了卢骚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等著作。

① 张难先，《日知会始末》，《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一），第五五六页。

② 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红旗》一九六七年第九期社论：《伟大的真理，锐利的武器》。

(三)办报纸,出刊物,大量刊行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所写的著作,如章太炎的《噓书》、《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以及陈去病的《陆沉丛书》等,揭露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卖国罪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与维护这个制度的精神支柱孔孟儒家思想。他们从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需要出发,首先揭发了清政府“尊孔子为上祀”的目的,是“冀以君臣之义钳制之”^①,使人民不起来造它的反。他们还进一步对清政府赖以维持统治的“忠”和“礼”的孔孟之道着重加以剖析,指出“忠”是孔孟儒家造出来奴役人民的,“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这些话都是有益于君的”,所以专制君主尊孔丘为“至圣”,并且号召人民要做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革命的‘圣贤’,不要做那忠君法古的‘圣贤’”。^②孙中山驳斥康有为等保皇党人所宣扬的“忠”的实质指出,他们所说的“忠”,是忠于清朝皇帝,这不是“忠”,恰恰是奸,反清和拥清,是“忠奸之判”^③。革命派又指出,“礼”是“大奸巨恶欲夺天下之公权而私为已有,而又恐人之不我从”,于是借“礼”“妄立种种网罗,以范天下之人”。^④所以“礼”比猛兽更为凶恶。革命派批判“忠”和“礼”,就是对君权的批判,这也就很自然的涉及到对“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所谓“昆弟朋友之道”的批判。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批孔是很不彻底的,他们没有从孔老二的思想体系进行批判,例

① 无俾,《孔子非满洲之护符》,《民报》第十一号。

② 君衍,《法古》,《童子世界》第三十一期,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五三二页。

③ 孙中山,《敬告同乡书》。

④ 《权利篇》,《直说》第二期,引自上册第一卷上册,第四七九页。

如对孔丘思想核心的“仁”就没有触及到。这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必然表现。

当时思想战线上急流汹涌，革命报刊如《中国日报》（香港）、《广东日报》（香港）、《檀山新报》（檀香山）、《图南日报》（新加坡）、《苏报》、《国民报》、《浙江潮》、《湖北学生界》（后改名《汉声》）、《新湖南》、《江苏》、《童子世界》、《女子世界》、《大陆》等纷纷出现。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宣传家如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的著作曾风行一时，有力地冲击着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牢笼。

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年），名炳麟又名绛，字枚叔，太炎是他的号，浙江余杭人。他在青少年时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反动卖国，乃立下拯救祖国于危亡的志向。由于他对中国的旧学有很深的造诣，所以很自然地到中国古籍中寻找救国的思想武器。他遍寻经史诸子百家，认为法家思想可以作为救国的思想武器。他说：“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①他从甲午战争后，治学即以“孙（荀）卿为宗”，而持论的“归宿则在孙卿、韩非。”^②要求前进和变革，用法家理论来“御外侮”、“伸民权”以挽救民族危亡，成了章太炎的中心思想。章太炎在那时虽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但由于法家思想逐渐在头脑里起着重要作用，远比康、梁激进。他反对康有为借助于孔老二的亡灵搞托古改制。他说：“变法维新为当世之急务”，可以与康、梁合作，“惟

① 《药汉微言》。

②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尊孔设教，……不能轻于附和。”^①有着反对孔孟儒家的倾向。所以当他看到张之洞贩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谬论，要人们对清王朝“激发忠爱”的大毒草《劝学篇》时，气愤地说：清政府对外一贯屈辱投降，目前又是“青岛、旅顺既割，天下土崩，……民志益涣”，在这种情况下，“乃欲责其忠爱！忠爱则易耳，其俟诸革命以后”。^②可见章太炎在戊戌变法时，已有革命的思想因素了。

戊戌变法失败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八国联军的侵略和清王朝的彻底卖国，义和团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这一些推动章太炎从一个改良主义者转变为民主革命派。一九〇〇年他有明显的革命转变，这主要表现在反对保皇党指使唐才常所发动的自立军勤王起事上。章太炎为表示坚决反对自立军扶光绪帝复位，把自己的发辫剪掉。第二年著《正仇满论》，文中虽有“排满复汉”的“大汉族主义”等错误观点，但其内核却是反对清政府卖国投降的爱国思想。一九〇二年二月，章太炎为避清政府追捕，东渡日本。他在日本三个月中，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广泛接触，并进行革命活动，更明确了民主革命的方向。五月间回国，在家乡修改于一八九九年著成的《榷书》，增加了尊法反孔和民主主义的内容，删去了改良主义色彩的篇章。表明他的革命思想大有发展。是年，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爱国学社，借以鼓吹革命，章太炎应邀去任教员，在教学中积极进行革命宣传。一九〇三年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为邹容《革命军》作的序言，揭露清政府的专制暴戾，批判保皇派头

① 冯自由，《章炳麟之略历》，见《中华民国革命建国史》第八十五页。

② 《艾如张董逃歌序》，《太炎文录初编》卷二，第一〇二页。

子康有为，倡言革命。中外反动派为此制造了震动中外的“苏报案”，章太炎被判徒刑三年。

当时，康有为发表了《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竭力为清朝的专制统治辩护，吹捧光绪帝的“圣明”，宣扬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革命。章太炎列举大量事实，驳斥了康有为之流为清朝反动统治辩护的种种谬说。

《恤书》、《正仇满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著作，构成了章太炎民主主义革命和尊法反孔的思想体系。他指出，清政府的所作所为，“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光绪帝是什么货色呢？他之所以接受变法，只是为了夺西太后手里的权力而已，其实同西太后一样是个卖国主义者，他“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①，光绪帝是对外投降卖国以换取帝国主义支持达到夺权目的的小丑，他绝不可能“定国是、厚民生、修内政、御外侮”的。章太炎直斥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在当时骂皇帝为五谷不分的小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章太炎并大声疾呼革命的万能和权威，说：“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补泻兼备之良药”。并指出，“在今之兴，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合众共和”是时势之必然。可见章太炎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已较明确了。

同时，章太炎对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孔教进行了尖锐的

^① 见《正仇满论》，又见《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下该二文的引文不再加注。

抨击。指出：清政府“尊事孔子，奉行儒术”，是为了“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把孔老二捧得高不可攀，神化为“至圣”，其实孔老二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以富贵利禄为心”到处奔跑一心想做官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官迷，他窃取老子“征藏”，垄断资料，买空卖空。被儒家奉为经典之一的《春秋》，只不过是“事君尽谄之义”^①的东西。孔老二是“闻望之过情”、“虚誉夺实”^②的大草包。章太炎还指出，孔丘是个“巧伪人”，他是个“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③的两面派、伪君子，是个“时伸时絀”以利己为标准而“趋时”的无耻之徒。孔丘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本”。孔教“就象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是断不可用的”。^④

章太炎在对孔孟儒家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同时，对历史上的法家进行了热情的赞扬。他称许王充的“有所发擿，不避孔氏”的反潮流精神，说汉得王充其人，“足以振耻”。^⑤章太炎谴责儒家侮蔑法家即酷吏的谬论指出，“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法家是“以刑维其法，而非以刑为法之本”。这实际上也是给了林彪咒骂法家即“罚家”借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一记响亮的耳光。章太炎并为“中于谗诽也二千年”的商鞅翻了案。他对张之洞之流攻击商鞅“惨刻暴横”的谬论进行了斥责，指出，世徒指责商鞅“刑七百人以赤渭水”为酷烈，其实那些被杀的人，大多是坚持旧制度反对革新变

① 《檀书·学塾》。

② 《檀书·订孔》。

③ 《诸子学略说》。

④ 《演说录》，《民报》第六号。

⑤ 《檀书·学塾》。

法的反动派，“刑七百人，盖所以止刑也”。^①章太炎还特别称赞秦始皇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法治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一九〇一年所写《秦献记》和较后几年所著《秦政记》中。章太炎指出，秦代法制本于商鞅，秦皇“世爱其术”，做到“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腑”，赏罚颇为分明。秦始皇“虽独制，必以持法为齐”，不但“刑罚依科”，用人也必依法，帝族无功，是不给予官职的，而所任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章太炎还充分肯定秦始皇焚书坑儒，指出，秦始皇之所以焚书，是由于反动儒士淳于越之流“相与牴牾”，即攻击新的专政的法治，妄图复辟奴隶主反动统治的“礼治”所造成的。这些反动派借古讽今，以古非今，妄图复辟，“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焚书之后，那些反动儒士们不甘心于失败，复进行诽谤捣乱，这就逼出了咸阳之坑，“非其法令必以文学为戮”。关于秦亡的原因，章太炎十分肯定地说：“非法之罪也”。他认为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一个是对复辟势力打击不够有力，另一个原因是赵高篡权后，秦以不能自守其宪度，使二世得恣己意以族大臣”，^②这里的被篡权后“族大臣”，是指李斯那样的法家人物遭到残酷镇压，赵高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在秦复辟了。这种论断是有见地的。

章太炎的反儒尊法，是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在革命中起了解放思想鼓舞斗志的作用，但反孔的程度也只能是以民主革命所许可的范畴为限，同他们的政治革命一样，是远不彻底的。而对待历史上的法家，没有也不可能从阶级和

^① 上几段引文见《燹书·商鞅》。

^② 《燹书·刑官》。其他引文均见《秦献记》、《秦政记》。

社会发展规律进行分析，因而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

一九〇六年章太炎出狱到日本，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总编辑，成为与改良派大论战的一员主将。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个有影响的人物，鲁迅先生曾称赞他当时与保皇派斗争的文章“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说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但是，在由旧民主主义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章太炎在政治上逐渐倒退，“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者宗”。^①竟然也主张尊孔读经了。

邹容（一八八五——一九〇五年）字蔚丹，四川巴县人。自幼虽读经史，但他鄙视“学而优则仕”，而立志救国。在重庆经学院读书时，即“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礼，无所避。”^②一九〇二年邹容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到日本留学。一九〇三年四月回国到上海，寓居爱国学社，与章太炎一见如故。

这时邹容写成了《革命军》一书，章太炎为之作序，称它是“雷霆之声”，“义师先声”。《革命军》于五月间印行。邹容在书中以炽烈的革命热情歌颂了革命的正义性，以锋利的文章揭露、鞭笞了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残暴，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同时提出了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反对外来干涉，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他热情洋溢地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③他针对孔老二的中庸之道，指出，“天下事不兴

①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② 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君蔚表》。

③ 《革命军》，《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一），第三三三页。以下《革命军》引文不再加注。

则亡，不进则退，不自立则自杀，徘徊中立，万无能存于世界之理。”邹容看到了同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斗争绝不能调和，不是革命推翻清政府，就是清政府绞杀革命，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就打击了改良主义者。

为了实行暴力革命，邹容还特别批判了孔老二的“仁政”说。当时清政府及其帮凶保皇派，为了维护清反动统治反对革命，胡说清王朝的统治是什么“古今至仁之政”。邹容针锋相对地说，广大劳动人民，特别就农民，“终日劳劳而无时或息”，他们既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又要遭到清政府极为严重的压榨，敲诈的名目繁多，往往“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之鬻妻典子而后已”。然而，清政府还“美其名曰薄赋，曰轻税，曰皇仁，吾不解薄赋之谓何？”什么“仁政”！不过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而已。

这就无情地撕下了“仁政”的面纱，露出了清政府残害人民的反动嘴脸。邹容指出，革命就要“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复我“天赋人权”，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独立的“中华共和国”。^①号召革命者与“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推翻清政府，扫荡那干涉中国主权的“外来恶魔”。邹容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里，找来了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作为民主革命的武器，反对清朝的专制统治，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所追求的“共和国”理想，只是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所向往的“强国”，也只是资产阶级的“富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是永远行不通的。

《革命军》的出版曾轰动一时，受到了当时爱国人民的欢迎，许多革命团体纷纷秘密翻印，“风行海内外”。它促进了

不少爱国者摆脱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壮大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声势，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向前发展。邹容在“苏报案”中，被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迫害入狱，一九〇五年被折磨死于上海帝国主义的监牢里，死时才二十岁。

陈天华（一八七五——一九〇五年），字星台，湖南新化人。一九〇三年到日本留学。一九〇四年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这一年他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用浅显通俗的文字，热情地歌颂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黑暗和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书中洋溢着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主张杀退一切外国侵略者，“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陈天华尖锐地指出，清政府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是洋人的“守土官长”、“洋人的朝廷”。“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①有力地批判了保皇派的谬论。

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象强劲的矢石，射中了清朝反动政府的要害，清政府把它看作洪水猛兽，严令查禁。但是，革命的思想是永远禁封不住的。陈天华的著作在革命人民中获得了广泛的流传，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阵地。一九〇五年十二月，陈天华欲以一死“觉吾同胞”，在日本投海而死。

以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人，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旗帜下，大力宣传了造反有理，对清政府反动统治及其精神支柱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冲击。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他们的著作和宣传中，

^① 《警世钟》，《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二），第一二五页。

还存在着不少错误、缺点和狭隘的偏见。他们所宣传的基本上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本性还认识不清，没有看到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他们害怕帝国主义，错误地提出“文明革命”、“文明排外”的口号，没有把斗争的主要锋芒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同时，他们也没有认识到广大群众巨大力量，错误地认为义和团是“野蛮革命”，“招致”了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害怕群众，不敢提出依靠农民进行民主革命的主张。他们的宣传主要停留在城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间，这是个致命的弱点。在反封建问题上，革命派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对专制制度的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维护这个专制制度的以孔老二为代表的儒家反动思想体系，是批判得很不充分、很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他们对“忠”和“礼”的批判是比较普遍的，也比较深刻。但是他们大多反儒不反孔，直接抨击孔老二的只有章太炎等几个人罢了。即使是批孔最激烈的章太炎，对孔丘也是常常批其一面，扬其另一面。而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里还夹着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以致在宣传中常常以“反满”掩盖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这些严重的错误和缺陷，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对革命派在思想战线上的进攻，清政府采取了高压政策。一九〇三年，上海发生了“震动中外”的“苏报案”。《苏报》原是一个落职县官陈范所办，设在租界里，起初宣传改良主义，后来倾向革命。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就利用《苏报》进行革命宣传。《革命军》一书在上海出版后，《苏报》刊

登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和其他几篇介绍、赞扬《革命军》的文章，同时又发表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惧。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查封《苏报》，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并判处徒刑。清政府还下令严禁革命书刊，残杀阅读革命书刊的群众。但是，清政府这种绞杀革命言论和屠杀群众的卑劣手段是徒劳的。辛亥革命前，革命书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这时，孙中山在海外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进行革命宣传。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逃亡日本。一八九九年康有为赴美进行欺骗宣传，梁启超留在日本办《清议报》，攻击西太后，鼓吹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孙中山为他所迷惑，竟想与保皇党合作组成一个政党。康、梁企图利用兴中会扩大他们的地盘，孙中山不加警惕，一方面将长江流域的会党介绍给唐才常，另一方面又把美洲的兴中会会员介绍给康、梁。康、梁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相欺骗，兴中会的革命宗旨有被完全篡改的危险。这些表明孙中山在思想上还未与改良派完全划清界线。随着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孙中山对保皇党的阴谋认识清楚了，他于一九〇四年发表了《驳保皇报》、《敬告同乡书》两篇文章，无情地揭露、批判了康、梁之流一心维护清朝专制统治的丑恶嘴脸，指出保皇党所高唱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是虚伪的骗人的口号。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①孙中山的宣传，使广大爱国华侨逐渐摆脱保皇党的影响，在政治上划清了革命派和保皇党的界线。同年，孙中山在美国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五十二——五十三页。

华侨洪门致公堂新章条款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比较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当时，孙中山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①清政府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②预见了革命高潮的即将到来。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有力地打击清朝的专制统治，冲击专制主义思想的牢笼，回击保皇党叫嚷的中国只能改良不能革命的谬论，促进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为中国同盟会的建立准备了思想条件。

第三节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领导下的政治思想斗争和武装起义

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

广大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爱国民主运动的勃兴，继兴中会后光复会、华兴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建立以及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一九〇五年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建立这样的革命政党，以领导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一九〇五年七月，孙中山由欧洲到日本。他在全中国革命形势的鼓舞下，与在日本的华兴会代表黄兴等商议革命组织

^{①②}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选集》上卷，第六十三、六十一页。

的联合问题。孙中山向大家讲了形势，指出：中国现在不必怕被各国瓜分，只怕自己内部不统一，各革命团体之间“以互相联络为要”。^①他的主张得到了黄兴等人的赞同，于是商定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等团体，成立统一的革命组织。七月三十日，革命党人在东京召开第一次联合大会，出席的有各革命团体的代表七十余人。会上决定建立中国革命同盟会，为避免“革命”二字引人注目，称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八月二十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几百人，国内绝大多数省区都有代表参加。会上通过了同盟会《总章》和《军政府宣言》（即同盟会《宣言》），推孙中山为总理，设同盟会总部于东京。十一月又以《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为基础，创办了《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宣传革命思想。接着，同盟会在国内大部分省区和海外留学生、华侨中间，陆续建立了革命组织。

同盟会的会员成分相当广泛，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里的反满派以及少数工农分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居于领导地位。由于社会成分比较复杂，各派力量都有自己的政见，同盟会在思想上、组织上比较松散，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散联盟。

同盟会的成立，使全国革命力量有了一个中心。它把分散的地方性组织，联合成统一的全国性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又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这是一个跃进，标志着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高潮。

^① 《宋教父日记》，《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二），第二一〇页。

同盟会在《总章》和《军政府宣言》里，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总的政治纲领，并对此作了解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驱除残杀和奴役汉人的满族贵族统治者，即推翻清政府，不是驱逐满族人民；“建立民国”就是以国民革命建立民国政府，国民一律平等，都有参政权，总统由国民公选，议会由民选议员组成，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平均地权”就是核定全国地价，现有的地价归原主所有，革命后因社会进步所增加的地价，归国家所有，由国民共享。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里，又把这个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旧三民主义。所谓“民族主义”，中心内容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所谓“民权主义”，中心内容就是“建立民国”；所谓“民生主义”，中心内容就是“平均地权”。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同盟会政治纲领的目标是要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纲领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潮流，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意义，是个革命的、进步的纲领，对于迫切要求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有较大的鼓舞作用的。

但是，同盟会的纲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第一，这个纲领没有提出反帝斗争的口号。同盟会的民族主义，主要目标是反对满族贵族的专制统治，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问题。虽然资产阶级的个别先进人物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但在实际纲领中，这种思想也没有得到反映。而在同盟会的《对外宣言》里却写着：“（一）所有中国

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二）偿还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①很明显，资产阶级幻想以此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中立或支持。他们不敢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这是同盟会纲领中的一个最根本的弱点。

第二，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封建土地制度的纲领。同盟会纲领中提出的“平均地权”，是个改良主义性质的土地纲领。资产阶级革命派只主张通过核定地价和向地主收买土地以及所谓“增价归国”来解决土地问题；而“土地国有”实际是资产阶级所有，为资本主义创造迅速发展的条件。他们不赞成“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害怕农民用暴力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这当然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资产阶级幻想以“平均地权”来预防中国将来发生社会革命，这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是主观主义的空想。它说明了在民主革命的另一个基本任务——反封建任务面前，资产阶级也是软弱无力的，提不出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纲领，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进行彻底的反封建斗争。这是同盟会纲领中的另一个致命弱点。

第三，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把“民族主义”纲领解释为向清朝贵族夺取政权，但是他们没有把清朝贵族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来反对，在实际斗争中又常常强调反满，掩盖了民主主义的革命内容。这种倾向，又大大地削弱了同盟会纲领的反封建意义。同盟会在《招降满洲将士布告》中，公然称汉族官僚地主、封建军阀为“兄弟”，希望他们起来共同

^① 《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二），第三十三页。

反对满族贵族的统治。甚至在《略地规则》中，还规定起义后的地方秩序，应由当地的地主绅士来维持。革命派不敢触动地方封建政权，这又充分表明了资产阶级在反封建问题上的妥协性。

同盟会的纲领不是一个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它的严重缺陷，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①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②

戊戌变法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逆历史潮流而行，继续鼓吹改良主义，堕落成为可耻的“保皇派”。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利用他在戊戌时代的影响，发表了大量歌颂君主立宪、诋毁革命的文章。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已经注意到了改良派的反动活动，亲自写文章进行批驳，并指示兴中会改组和创办有关报刊，批判改良派。此后，广州、上海、天津、香港和国外的檀香山、旧金山、新加坡、暹罗、日本等地，陆续有批判改良派的革命报刊发行。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要将民族、民权、民生问题的主张，“输灌于人”，化为常识。于是，《民报》大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〇三页。

② 《纪念孙中山先生》。

量刊登宣传三民主义和解释同盟会纲领的文章，展开对改良派的批判，受到了革命人民的热烈欢迎。

当时革命派和改良派所属的许多报刊都投入了论战，而《民报》和《新民丛报》是双方论战的主要堡垒。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是论战的中心问题。

第一，关于要不要革命的问题。

改良派制造种种理由反对革命派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而为清政府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百般辩解，还诡称自己向来主张政治革命，说什么政治革命的“正当”方针应该是“劝告”政府改良政治，“要求”政府实行立宪，决不是举行暴动。他们认为革命派所进行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势必引起“下等社会”的武装暴动，破坏社会秩序，而且可能引起列强的干涉，招致瓜分。他们胡说“爱国”绝不应当革命。改良派的诡辩彻底暴露了他们仇视人民、仇视革命的反动嘴脸。

革命派列举了大量事实，驳斥了改良派的种种胡说，指出：改良派的所谓“爱国”就是爱清政府，根本不是真正爱中国；清政府是个专制暴虐、腐朽透顶的卖国政府，不把它推翻，中国将被它完全断送，因此，要爱国就应当革命。他们强调，只有用武力推翻清政府，才能摆脱民族压迫和专制压迫，才能拯救国家的危亡；而改良派的所谓“正当”政治革命，就是站在维护清政府的立场上反对革命。

第二，关于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

改良派为了替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作辩护，胡说由于有不好的人民才“造出”不好的政府，叫嚷民主立宪在中国决不可

行，因为人民没有作共和国民的资格，也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如果一定要去做，必然使政府不成其为政府，国家不成其为国家，结果非“亡国”不可。他们甚至认为中国在目前连实施君主立宪的资格都不够，勉强实行起来也会“弊胜于利”，而主张先行十年开明专制作为进入君主立宪的过渡。改良派站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一边，对人民进行了极其恶毒的污蔑。

革命派在民主政治问题上与改良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他们明确指出，人民应享有直接的民权，君主专制政体固然要反对，君主立宪同样也要反对，比较全面地驳斥了改良派反对民主政治的谬论。他们根据事实对清政府的所谓预备立宪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这不过是“牢笼”人民和抵制革命的一种手段，改良派拥护立宪和要求开明专制，完全是帮助清政府愚弄人民，巩固其“野蛮专制政体”。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学说作理论根据，驳斥了改良派的所谓人民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和不具备共和国民资格等无耻澜言，指出革命能使人民解脱专制压迫的痛苦，在共和政府下，人民会逐渐养成能完全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使中国臻于独立富强；相反，不推翻君主专制政体，不实行民主政治，其结果必然象清政府那样腐败无能，把中国弄得国弱民贫，受人欺凌，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他们的结论是：只有“兴民权，改民主”，中国才有出路；而改良派反对共和，实为“中国之罪人！”

第三，关于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

改良派大肆攻击革命派的“土地国有”，主张竭力为封建土地所有制辩护，胡说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基本上良好的，有一些缺点也只需稍加“补苴”就够了，地主占有土地，有

利于社会“勤勉殖富”，应当得到保护和发展。他们攻击革命派的“土地国有”政策是危害“国本”，是煽动“下等社会”革命。他们甚至表示对土地问题，宁死也不能“寸毫”相让，充分暴露了改良派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

革命派痛斥改良派对“土地国有”的种种污蔑，指出少数地主垄断土地有种种弊害。如地主占有土地，徒手坐食，不给社会生利反而分利，对社会生产是不利的；地主垄断土地，迫使农民充当佃户，进行剥削压迫，在社会上造成地主有权和农民无权的不平等现象。他们强调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决不是象改良派所说的，只要稍加补苴就能解决问题，而是必须对土地制度作根本改革。实行“土地国有”政策，人民才能脱离地主强权的压迫，社会生产事业才能迅速发展。

经过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大论战，特别是人民群众斗争的日益高涨，推动许多知识分子从改良主义思想下解放出来，认识到救亡图存非革命不可，而站到革命的旗帜下来。民主革命思想日渐深入人心，改良派象落水狗一样败下阵来。《新民丛报》也不得不哀叹：“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①

革命派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击败改良派，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是很不彻底的。在对待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上，革命派没有正面回答改良派的挑战，只是天真地说，中国革命是反对封建专制，申张民权，完全合乎世界各国潮流，革命后独立自主，列强不会再来侵略中国。他们还幼稚地认为，只要把群众的“自然暴动”，引导到“有秩序的革

^① 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第六〇七页。

命”，去掉“排外”性，就不会造成“内乱”，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他们始终不敢提出反帝口号，更不敢明确表示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在对待土地制度问题上，革命派虽然也批驳改良派对“土地国有”问题的攻击，但也不敢跨前一步，依靠农民去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只是停留在对“平均地权”的乌托邦式的解释上，当然不可能彻底战胜改良派。在回答改良派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攻击时，革命派也躲躲闪闪，认为革命只要用单纯的军事暴动，在短时期内就可以推翻清政府；只要注意内部的调和，就不会造成“内乱”。他们几乎与改良派一样害怕群众，不敢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致命弱点，就决定了他们不能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走向胜利。毛主席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①

三、同盟会领导和影响下的各地武装起义

同盟会成立后，在全国革命形势的鼓舞下，积极筹划和领导反清武装斗争。从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〇年，它先后在长江中、下游和南方几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

一九〇六年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蔡绍南到湖南，重振会党，发动武装起义。蔡绍南到江西萍乡后，积极宣传同盟会的纲领，把当地两支较大的会党，合并为洪江会，于十二月三日发动了萍、浏、醴大起义。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三四页。

军南军革命先锋队”，推龚春台为都督，发布檄文，提出要“驱逐鞑虏，收回主权”，“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国”，并声明要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①洪江会起义后，浏阳东部与北部的洪福会，在姜守旦率领下起义，称“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醴陵的群众也在李香阁领导下宣布起义。萍、浏、醴起义爆发后，几天内即遍及附近几县。萍乡安源煤矿的矿工，尽管被清军严密封锁，许多人还是通过斗争加入了起义军。这些地方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纷纷参加起义。队伍迅速发展至三万多人，几次打败清军，震动了长江中、下游。清政府急调军队五万余人进行镇压。起义军由于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前后方各行其是，各支起义军旗号不一，互不统属，力量分散，终于为清军各个击破。

孙中山在得悉起义消息后，即派宁调元等赴湘、鄂、苏、皖各省联络会党与军队，策应起义。但这些人回国后，萍、浏、醴起义已经失败，他们也遭到了清政府的残酷镇压。

萍、浏、醴起义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牺牲了许多革命党人和上万名革命群众，但它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同盟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一九〇七年五月，同盟会会员许雪秋联络潮州三合会会众一千多人，发动潮州黄冈起义，传布檄文，宣布同盟会革命宗旨，附近官吏闻风潜逃。后因孤立无援，起义军被迫宣布解散。

黄冈起义后十天，孙中山派邓子瑜会同会党起义于惠州

^① 《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二），第四七七页。

七女湖，因清政府截断起义军的军火接济，并派大批援军到惠州，起义军见形势不利被迫解散。

同年七月，同盟会又发动了广东钦、廉、防城起义。钦州、廉州地方盛产蔗糖，清政府增设糖捐，苛敛勒索，激起人民反抗。孙中山派人与抗捐群众联系，并发动会党在防城一带起义，一度攻占防城，因事前答应率兵反正的清军郭人漳突然变卦增兵袭击起义军，而起义军的军火又接济不上，被迫退入粤、桂两省交界的十万大山中。

钦、廉、防城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黄兴计划占领广西，派人至镇南关（今友谊关）附近联络同志，集百余人于这一年十二月发动起义，占领镇南关，缴获了许多大炮。孙中山亲至镇南关督战，与清军激战七昼夜，最后被迫退入越南境内。

一九〇八年同盟会又发动了钦州、廉州、上思和云南河口起义。

当同盟会在南方几省发动武装起义时，光复会的一部分成员在长江下游一带，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光复会首领徐锡麟在安庆以办理巡警学堂为掩护，积聚革命力量，筹划武装起义。一九〇七年七月，徐锡麟乘安徽巡抚恩铭到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刺杀了恩铭，率数十人起义，因力量单薄被镇压。女革命党人秋瑾，一九〇四年到日本留学，一九〇五年先后参加光复会、同盟会，并被推为同盟会浙江地方的负责人。他在绍兴以办大通学堂为掩护，联络会党，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相约起义。后因徐提前起义，计划暴露，秋瑾不幸被清政府逮捕，壮烈牺牲于绍兴轩亭口。

几次起义失败后，同盟会领导人感到会党力量散漫，缺乏战斗力，同时起义地点太偏远，运送枪械不便，因设同盟

会南方支部于香港，着重在广州新军中进行策动工作，于一九一〇年发动了广州新军起义，结果还是失败了。

从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〇年，同盟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有力地冲击了清政府的统治，可是这些起义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没有广泛地发动和依靠群众。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只是依靠从国外运进军火，联络和发动一些会党、新军，搞单纯的武装暴动，幻想占领个别城市，在短时间内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脱离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成了军事投机性质的起义。他们虽然联络了会党，但是很少对会党进行教育和改造，也没有通过会党去联系广大群众，只是把会党当做军事冒险的工具。由于这种致命的弱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势力始终比较孤单。因此，尽管上述起义取得了一些暂时的胜利，但在帝国主义的破坏和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进攻下，都失败了，瓦解了。

同盟会的一些领导人，并没有从多次失败中吸取教训，到群众中去做艰苦的革命工作。有些人反而认为会党和自发的群众起义队伍不中用，太无战斗力，主张只搞新军的武装起义，完全漠视群众的力量。有些人热衷于刺杀统治阶级中的个别重要人物，幻想以此克服革命的阻力。结果，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同盟会的领导却离群众越来越远，显得更加软弱。

第四节 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 斗争的蓬勃发展

一、帝国主义和清政府对人民加紧压榨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和清政府加强对广大人民

的掠夺和榨取。帝国主义大规模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严重地摧残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破坏了中国的手工业和农业，使广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纷纷破产，陷入了生计无着的贫困深渊。同时，一笔笔巨额的外债，落在城乡劳动人民的身上，几乎榨尽了脂膏。以一九〇二年为例，这年分摊到各省的总额达四千七百多万两，江苏一省即分摊了八百九十多万两^①。清政府为了偿付外债，千方百计地增捐加税，除原有的地丁、漕银、盐课、茶税、厘金等赋税加重征收外，又增加了名目众多的新项目，如印花税、烟税、肉税、煤税、亩捐、地捐、房捐、骡马捐、赔款捐、赌博捐等，地方官吏还挖空心思，巧立名目，鱼肉百姓。实际上，各种杂税“省省不同，府府不同，县县不同，名目不下百数十”^②种，有些地方连和尚、道士、尼姑也列为纳税对象。“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民入城挑粪也要抽粪税，一个厕所每月也要缴税数百文。^③这种无边无际的“税灾”，逼得劳动人民家破人亡，无法生活下去。加之一九〇一年开始的假新政，又在不堪负担的捐税上，增加新的杂税和勒索，什么编练新军军费、办巡警费、办学堂费、派留学生费、筹备地方自治费等等，搞得鸡飞狗跳，民怨沸腾。

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这种难以想象的无穷榨取，使早已残破的中国社会经济迅速走向崩溃，民生无着，举国愤愤。因此，广大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地继续向前发展。

①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表九，第八十八——八十九页。

② 梁启超，《中国国权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五，第三十页。

③ 相如，《四川革命书》，《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二），第三一一页。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

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一八九五年以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增加，中国工人数量有了显著的增加。据估计，一九一二年全国工人人数已达一百万，其中产业工人约五十至六十万。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壮大中。

二十世纪初，中国工人阶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涨起来，工人罢工的次数有了明显的增长，斗争规模也扩大了。据几个报纸的报导材料统计，一八七〇至一九〇〇年工人罢工次数共为三十起，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一年共为七十五起。^①后十年的工人斗争大大发展了。一九〇四年成都兵工厂六百名工人，抗议工头克扣工资举行罢工，围坐总督衙门请愿，罢工坚持了半个月以上；一九〇五年上海杨树浦集成纱厂四千六百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惩办欺压他们的工头，砸毁了窗户和机器，并用石块掷击来厂镇压的印度巡捕；一九〇六年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工人、北西藏路煤气公司技工和自来水公司小工，要求增加工资相继罢工；同年，山东矿务公司坊子矿坑大爆炸，中国工人一百二十人死亡，工人们满腔悲愤，罢工抗议，斗争持续了几个星期；一九〇九年汉口外国资本家经营的茶砖厂，八、九千工人同盟罢工，反对工头盘剥，要求增加工资，资方无理拒绝，工人各执利器，痛殴工头，几乎形成暴动。这些罢工斗争的具体目标，虽然还局限于争取改善工人的经济状况和劳动条件，但是它的斗争锋芒是直指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

^①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运史料》一九五八年(1)，第一一三——一四页。

建的顽强革命精神。

在这个时期的工人斗争，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发展。工人群众以战斗的姿态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有的拿起武器，举行暴动，并积极参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一八九八年沙俄强筑东清铁路，黑龙江附近几千金矿工人，以武力抗拒筑路；一九〇三年云南人民反对清政府出卖滇桂矿权，组织保滇会，号召起义，一万多名铜矿工人决然参加斗争，成为这场斗争的主要力量；一九〇四年广东人民反对清政府借款筑路，在修筑广州、三水间铁路时，筑路工人奋起袭击监督筑路的帝国主义工程师，清政府的铁路护军望风“弃械而逃”；一九〇五年反美爱国运动中，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工人积极参加斗争，并提出“永远不用美货”的口号，在斗争中表现得最坚决、最勇敢；一九〇六年萍、浏、醴大起义，安源煤矿的许多矿工参加了起义，与清军浴血战斗，成为这次大起义的中坚力量；一九一一年汉口英租界巡捕房侦探无理踢死中国人力车工人，激起公愤，一千多人力车工人聚集在巡捕房前，要求惩办凶手，英国领事竟然下令开枪，打死中国工人十多人，清朝反动政府还派兵保护外国主子的安全，愤怒的群众忍无可忍，打伤了带队的清军头目，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的大风潮，武汉各界几万人举行集会，抗议英国侵略者的野蛮暴行，声讨清政府的卖国行径。这场斗争激发了武汉人民的革命义愤，推动武汉三镇的革命形势的发展。

当然，辛亥革命前，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觉醒的独立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工人群众的斗争，还是自发的、分散的，他们参加民主革命运动还是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

阶级的追随者出现的。但是，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已预示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辉前程。

三、义和团余众举起“扫清灭洋”旗帜继续斗争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大规模的农民反帝武装斗争暂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人民群众痛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革命情绪却继续高涨，他们接受了义和团运动的血的教训，自发地把反帝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提出了“扫清灭洋”的口号，继续战斗。一九〇一年夏，直隶雄县义和团首领祁子刚，举起“扫清灭洋”的旗帜，聚集团民三千余人，武装反抗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屠杀政策，转战于雄县、新城一带，屡次打败了清朝反动军队。同年，直隶广宗群众在景廷宾领导下，抗议官绅和教士勒逼“地方赔款”，清政府公然派兵镇压。景廷宾联合钜鹿、南宫、威县等县农民，举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掀起了冀、鲁、豫平原二十四州县的农民大起义，参加的农民达二十多万。他们打清军，攻教堂，杀豪吏，袭破威县、广宗，围攻冀州、南宫、枣强、赵州、隆平、宁晋、柏乡等县城，杀得反动派闻风丧胆，震动了北京城。清政府几次调集大军进行镇压，德、法、日三国侵略军六千人也赶往“助剿”，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景廷宾起义失败了。这次起义狠狠地打击了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凶焰，扩大了农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政治影响。

除直隶以外，其他一些省分义和团余众的斗争，也十分活跃。一九〇一年四川巴县义和团发出揭帖，提出“灭清剿洋兴汉”口号，号召武装起义。一九〇二年义和团势力在资阳、安岳、资中、仁寿、金堂、荣县、简阳、成都、眉山、彭山、中江、三台、德阳、新都、灌县、温江、遂宁一带发

展起来，几乎遍及四川各地，群众到处设棚练拳，捣教堂，杀教士，攻州城，搞得统治阶级惶惶不可终日。

与义和团余众的斗争相激荡，各地人民自发的反洋教斗争也此伏彼起，绵延不绝。一九〇二年热河朝阳邓莱峰领导群众反抗当地教堂的恶势力，声势很大，几营反动军队也对付不了。同年，河南汝阳群众与大刀会联合，反抗摊派教堂赔款，焚毁了汝阳、桐柏等地的教堂。一九〇三年浙江宁海人民奋起焚毁了当地的教堂，聚众几千与清军作战。一九〇六年福建漳浦群众，反抗法国天主教堂的恶势力，联络会党，抗击官府，烧掉了法国天主教堂，并涌入县城，砸毁了城里的监狱和耶稣教堂。江西、广东、湖北、四川、吉林等省，都爆发了反教会斗争。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八年间，仅《东方杂志》就报导了类似事件三十五起。

四、南方诸省的会党起义和大江南北的抗捐抗税斗争

太平天国运动后，会党力量依然潜流于南方各省。二十世纪初，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下，会党斗争又活跃起来。江西、安徽、浙江、湖南、四川、贵州、广东等地区，会党群众不断举行武装暴动，反对清朝的黑暗统治。广西是会党势力比较强的一个省分，一九〇三年，一部分兵变的清军与会党结合起来，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苗、瑶、壮等少数民族人民也积极参加。一九〇四年起义势力控制了庆远、南宁、梧州、思恩、柳州、浔洲等广大地区，各地人民纷纷响应，使清朝统治者陷入了“防剿俱穷”的困境。同年七月，起义军占领了柳州，并分兵三路出击，把斗争扩大到广东、湖南、贵州边境，清政府调动了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十几万军队进行镇压，起义军由于力量分散，

内部不统一，结果失败了。这场坚持三年之久的武装斗争，声势浩大，振奋人心，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经受到巨大的鼓舞，他们在南方发动的几次武装起义，主要就是依靠了当地的会党力量。这些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游民，曾一度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演出威武雄壮的武装起义场面的主角。

抗捐抗税斗争的普遍兴起，是这个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特点。清政府的残酷压榨，激起了城乡劳动人民普遍的激烈反抗，抗捐抗税斗争，风起云涌，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一九〇一年山西高平的农民、手工业者，反对地方官吏摊派杂捐，在牛文炳领导下，聚众数千涌入县城，要求“永免各捐”，愤怒的群众捣毁了县狱，救出了义和团首领贾黑汉等六人，又砸了洋教士的房屋。一九〇三年，山西永济爆发了群众反抗柿酒税的斗争。永济地靠山区，农家都种柿树，并用柿子酿酒，向来无税，一九〇三年，官府竟出告示强征柿酒税，规定每一口酒缸抽银十两，卖酒一斤抽钱八文（当时每斤柿酒只能卖二十文），并派差役到处催逼，激起人民愤恨，几千群众进城，要求免除柿酒税，县官竟派马队进行镇压，愤怒的群众砸烂了县衙门，知县逃跑了，蒲州知府不得不同意免除柿酒税。一九〇四年，江西、广西、河南、江苏等地区，都接连不断爆发了抗捐斗争，其中以江西乐平的抗捐暴动规模最大。乐平地区盛产青靛，是当地农民生活的主要来源，自外国洋靛输入后，土靛价格日益跌落，一九〇四年清朝地方官吏勾结豪绅，以办学堂“经费不敷”为名，向农民强收靛捐，逼得农民无法生活下去，会党首领夏廷义就率领群众举行暴动，数千群众几次冲进县城，焚县署，攻教堂，

捣毁了盐卡、厘卡、学堂，与大队清军对阵作战，震慑了清朝统治者，法帝国主义借口“保侨”，把军舰开入鄱阳湖示威，清政府也调集大批军队进行“围剿”，夏廷义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率众英勇抵抗。由于内部奸细的破坏，这次抗捐斗争失败了。

一九〇五年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抗捐斗争也更加激烈，反抗清政府“新政”勒索的“骚动”，弥漫于全国各地，例如素称“民气开通”的江苏，清朝官吏和地方劣绅以实行“新政”为名，增捐勒索，鱼肉乡里，触发了长期以来蕴藏在群众心中的忿恨，吴县、常熟、震泽、吴江、武进、丹徒、金坛、高邮等县，接连爆发了抗捐“骚动”，愤怒的群众闹县城，砸自治局、巡警局、学堂，抓土豪劣绅，烧毁他们的房子，搞得反动官吏、土豪劣绅东躲西藏，不得安宁，狠狠地打击了清朝反动统治者

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蓬勃发展，资产阶级爱国民主运动的勃兴，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民主革命潮流，猛烈地冲击着清朝的反动统治，清政府陷入了土崩瓦解的深刻危机中。

第十一章

辛亥革命和清王朝的覆灭

第一节 清朝反动统治的危机

一、“预备立宪”的骗局和清朝统治的危机

一九〇五年后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清政府的“新政”完全失去了欺骗的作用，而陷入深刻的危机中。在这种情况下，反动势力惊恐不安，急忙寻找对付革命的策略。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政治代表抱怨清政府的“新政”，既没有政治上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又不能阻止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想用叩头请愿的方法，催促清政府赶快实行宪政，以抵制革命运动，并使自己从中捞到一点政治权力。日俄战争后，他们扬言“日俄之胜负”，是“立宪专制之胜负”，鼓动立宪的声浪高涨起来，并开始了要求立宪的实际政治活动。一些拥有实权的地方督抚，一眼望着呼啸而起的革命风暴，惶惶不安；一眼瞅着清朝皇族把持的中央权力，愤愤不平。他们也想借“立宪”之名来扼杀革命，分夺清朝皇族亲贵们所独揽的大权。狡猾的督抚们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政治代表或明或暗地勾搭起来，向清政府不断施加压力，奏请“行施宪政”。

清朝皇族统治集团在革命形势的冲击下，对吵吵闹闹的立宪派和心怀鬼胎的督抚，也奈何不得。他们痛楚地感到，

“时局维艰”，数年以来，变法的“实效未彰”，“似此因循敷衍”，就无法“起衰弱而救颠危”。^①于是接过“立宪”的口号，把他们的欺骗活动升级，妄图用“预备立宪”的幌子，拉拢资产阶级，加强中央集权，躲过革命风暴。

一九〇五年，清政府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随后成立了考察政治馆。载泽等五大臣是一批冥顽不化的大官僚，在日本和欧美诸国走马看花地游历了一番，回国后向西太后上了几个奏折，呈请“仿行宪政”。他们告诉西太后：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其君权之完全严密”，“有过于中国”，实行“宪政”，不仅君权不会“丝毫下移”，还可以削弱地方官吏的势力，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②的好处；而且宣布了立宪，还可以象日本明治维新那样暂不实行，什么时间实行可视情况而定。西太后听了他们的意见，并经过御前会议多次商讨，认为假立宪对应付目前时局，巩固清朝统治有好处，同意预备“仿行宪政”。

一九〇六年九月一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上谕”宣告，预备立宪的宗旨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是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不能马上实行宪政，要有个预备期进行准备，在预备期里，“臣民”要“忠君爱国”，“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储立宪国民之资格。”^③这份“上谕”，清楚地说明了

① 载泽，《考察政治日记》，商务印书馆大清宣统元年六月版，第一页。

② 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四），第二十八——二十九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版第五册，第五五六三——五五六四页。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是个大骗局。

一九〇六年清政府开始官制改革，作为“预备立宪”第一步，借此削减地方督抚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一九〇七年将实权最大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免职，授予军机大臣虚衔兼外务部尚书，置于清皇族控制之下；将另一个拥有实力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明升暗降地调到中央任职。为了显示“立宪”的“决心”，把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制定“宪法”；派达寿往日、汪大燮往英、于式枚往德三个君主立宪国家“考察宪政”。与此同时，还宣布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在各省筹设谘议局，作为中央和地方的谘询机关，说是准备将来改为国会和地方议会。一九〇八年至一九〇九年间，清政府又先后颁布了《各省谘议局章程》、《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和《资政院院章》，摆出了“立宪”的架势。

清政府的假立宪，使改良派欢欣若狂。以康、梁为首的保皇党分子准备乘机回国参加“宪政”，国内拥护君主立宪的人也纷纷成立团体，准备参加“宪政”，这些人被称为立宪派。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八日，康有为在纽约《中国维新》报上发表公告，通知各地保皇会于一九〇七年元旦改称国民宪政会，作为推动宪政的政治团体。一九〇七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制订纲领，发表宣言，无耻地宣称“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①政闻社成立后，即派人回国进行活动，狂热地鼓吹君主立宪，反对人民革命。尽管康、梁一再表示忠于清朝皇室，但西太

^① 《政闻社宣言书》，《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四），第一一五页。

后却宿怨未忘，说他们“保皇上不保太后，保中国不保大清”，下令查禁政闻社，严拿康、梁党徒。但他们仍不悔悟，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为清政府的立宪骗局奔走呼号。

国内的立宪派分子也活跃起来。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立宪派在各地成立了类似政党的团体，为清政府的假立宪摇旗呐喊。江浙地区的张謇、汤寿潜等在上海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湖北武汉汤化龙等组织了宪政筹备会；湖南长沙谭延闿等组织了宪政公会，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团体出现。参加这些团体的人，主要是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工厂主、铁路股东等，他们的首领有的是清朝中央农工商部的顾问，有的是各省的商务、农务、教育总会的主持者，路矿公司的经理、协理等。这些人与地方督抚和封建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

一九〇八年六月，以张謇为首的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发起请愿活动。接着，各省立宪派代表齐集北京，向清政府叩头请愿，呈递请愿书，请求速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这时，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清朝统治集团感到，不能再在立宪的时间问题上延宕敷衍了，九月，抛出了宪政编查馆拟订的钦定《宪法大纲》^①，宣布预备立宪期为九年。这个《宪法大纲》共二十三条，规定君上大权的有十四条，把封建帝王的所有权力都写上去，宣布：“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大清帝国，万世一系”；规定“臣民”权利义务的共九条，除了当兵、纳税等义务外，人民无权利可言。所以“钦定宪法”是以立宪

^① 见《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版第五册，第五九七九——五九八〇页。

为名，行君主专制之实。它再次暴露了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险恶用心。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十一月间，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三岁娃娃溥仪继承了皇位，改明年（一九〇九年）为宣统元年，由他父亲载沣任摄政王，代管国家政权。清朝皇族集团对汉族大官僚和地方督抚日益扩大的势力，惴惴不安，害怕他们迟早会背叛，就加紧实行中央集权。载沣首先对拥有北洋军实权的袁世凯开刀，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为名，把他撵回河南“养痾”。袁世凯到河南彰德府的洹上村住下，窥测方向，准备伺机再起。接着，载沣就自任代理大元帅，任命他的弟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谘大臣（即总参谋长），兄弟三人统揽军事大权。他还不放心，又下令加强对各省督抚在军权、财权方面的限制。这种加强皇族专权的措施，引起了汉族大官僚的普遍不满。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地加深和扩大了。

一九〇九年十月，各省谘议局正式成立，立宪派的许多代表人物被督抚们挑选为议员，这就巩固了立宪派在地方上的阵地。他们利用谘议局的合法地位，又联合发动立宪请愿运动。江苏谘议局局长张謇召集十六省谘议局代表在上海开会，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约定在清政府速开国会之前决不解散。各省谘议局代表齐集北京，于一九一〇年进行了三次大请愿，要求速开国会，组织内阁，但第一、二两次都被清政府拒绝。十月，清政府成立中央资政院，一些立宪派头面人物被选为议员，立宪派又乘机串通一些地方督抚，发动第三次请愿。资政院通过决议案，各地督抚也联电军机处，相继提出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的要求。清政府迫不得

已，允许缩短“预备立宪”期限，提前至一九一三年召开国会，并在国会召开前二年组织新内阁。同时，清政府采取高压政策，下令遣散各地请愿代表团，将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又将天津国会请愿学界同志会负责人，发往新疆充军。

一九一一年五月，清政府颁布新订内阁官制，任命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成立新内阁。在内阁总理、协理大臣和各部尚书十三人中，皇族占了七人，军政大权操在皇族手中，因此，这个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它排斥了汉族大官僚的势力，立宪派连个边也没有沾到。清朝皇族统治集团与汉族大官僚、立宪派的矛盾急剧地恶化了。皇族内阁的建立，表明清政府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预备立宪”的骗局完全戳穿。

立宪派碰了壁，即以资政院议员为骨干，成立宪友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等三个近似政党的团体，一方面与清政府纠缠，一方面准备投机革命。各省的立宪派以谘议局为阵地，也加紧了活动。有些地方，立宪派参加了反对清政府的保路运动，夺取运动的领导权，准备伺机钻进革命阵营。心怀不满的地方督抚也在暗中窥测方向，并加紧和立宪派的勾搭。

由此可见，立宪派是一批坚决反对革命，维护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统治的反动派、投机革命的政客。但苏修齐赫文斯基，〈中国近代史〉中却胡说立宪派有“相当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工人阶层卷入……，导致了立宪运动的社会基础的扩大”，胡说〈政闻社宣言〉“把人民争取到自由反对派方面和利用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来对清政府施加压

力”等等^①。苏修百般美化立宪派的险恶用心，是为了兜售其“和平过渡”的黑货。

清政府原想利用假立宪来笼络立宪派，加强中央集权，消弭革命，结果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它的顽固本性，使它与立宪派之间闹成僵局，丧失了一个反革命助手；与汉族大官僚之间也闹得不可收拾，貌合神离。清朝统治集团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境地。

二、民主革命潮流的高涨

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和欺骗伎俩，没有能阻止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人民群众的自发反抗斗争，一九一〇年前后出现了一个高潮。据初步统计，一九〇五年，群众自发反抗斗争共九十多起，一九〇九年增至一百三十多起，一九一〇年达到了二百九十多起。饥民暴动，“抢米”风潮，抗捐斗争，风起云涌，参加的群众比以前更为广泛，除工人、农民外，城市手工业者、贫民、小商小贩都捲入了斗争。

在江淮地区，由于清政府的横征暴敛，一九〇九年前后连续遭灾，十室九空，度日如年，几十万灾民流离失所，饿殍载道。清江、宝应、宿迁、如皋、海州、泰兴等地，饥民接连暴动。

一九〇九年，湖南洞庭湖沿岸的澧州、常德、岳州等地发生水灾，衡山、宝庆等地又闹旱灾，大批灾民逃到长沙谋生，地主、富商和帝国主义的行商，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米价。著名的米市长沙发生米荒，粮价飞涨，平时一升米二十

^① 齐赫文斯基，《中国近代史》第五章。

文左右，一九一〇年春竟暴涨到七十余文，居民无法生活，群情愤激。四月十二日，一位贫民用七十多文钱买不到一升米，归而自杀，群众怒不可遏，捣毁了那家米店，并要求官府减低粮价，救济饥民。湖南巡抚岑春煊竟命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打死打伤了几十人。几万群众奋起抗暴，烧毁了巡抚衙门、长沙税关，捣毁了巡警局、大清银行、税卡、钱庄和帝国主义的领事馆、教堂、洋行，震动全国。后来，清政府从外省调来大批军队，帝国主义也从上海等地调来军舰进行威胁，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暴动群众被迫解散。

长沙“抢米”风潮后不久，一九一〇年五月，山东莱阳爆发了规模很大的抗捐抗税斗争。莱阳地方由于清政府的残酷压榨，人民生活早已十分困苦。清政府又摊派所谓“新政”费，地方官吏乘机巧立名目，增捐勒索，如田亩捐、房屋捐、文契捐、骡马捐、学捐、庙捐等，增加了几十种，群众无法生活下去。一九一〇年莱阳遭受霜灾，农民缺粮的十有八九，奸商、劣绅又哄抬粮价。群众要求追查被豪绅侵吞的原属农民的备荒积谷，地方官吏不仅置若罔闻，还强行继续增捐抽税。莱阳近郊联庄会负责人曲诗文，带领群众奋起抗捐抗税。五月十二日，万余名群众涌进县城，要求追回备荒积谷，免除杂捐，撤换残害群众的衙役、乡长，知县假意答应。第二天，又有和尚、道士等一千数百人聚集县署，要求免除庙捐，知县也假意允诺。但事后知县都不实行，而且逮捕了二十多个和尚、道士，严刑拷打，并继续强征苛税。于是曲诗文就组织群众于六月二日围攻县署，焚烧官吏、劣绅的住宅。山东巡抚孙宝琦派大批军队来镇压，群众奋起抵抗，清军竟

用大炮轰击。曲诗文率领几万群众，与清军作战，相持了二个多月，最后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长沙的“抢米”大风潮和莱阳的抗捐抗税斗争，预示着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

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蓬勃发展，造成了极为有利的革命形势，但同盟会领导人对此并不重视，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仍醉心于他们自己搞的武装起义，希望一处起义，各地响应，马上推翻清朝的统治。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孙中山到槟榔屿召集同盟会主要负责人举行会议，决定全力在广州发动起义。

这一次广州起义，是同盟会成立以来准备最充分的一次起义。孙中山亲自筹划，向海外爱国华侨募集巨额经费，购运大批武器弹药，设指挥机关统筹部于香港，并在广州分设几十个起义机关，由黄兴负责指挥起义；又从留学生、华侨中挑选了大批骨干，组织了一支八百人的敢死队，担负发难重任，同时联络了新军、会党、防营武装，以备响应。孙中山准备占领广州后，分兵进攻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夺取长江中下游，大举北伐。起义计划原定于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三日发难，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和立宪派的告密，起义日期被迫推迟。四月二十七日，一部分革命党人在各方面力量来不及集中的情况下，毅然起义，分四路向清军进攻，黄兴率一百多人攻破了总督衙门，与大队清军展开激烈的巷战。但是寡不敌众，许多人在一昼夜的苦战中牺牲，一部分人被捕后就义，黄兴逃亡香港。广州人民不顾清政府的迫害，收殮殉难者尸体七十二具，埋葬于黄花岗，所以这次起义也叫做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使清朝反

动政府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反抗精神。

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资产阶级发起的收回利权运动也更加高涨。一九〇九年，山东各界赎回德国占有的茅山等五处矿产。四川赎回了江北厅煤矿的英国股份。奉天人民反对日本改筑安奉铁路，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而湖广铁路（粤汉、川汉铁路的总称）争回路权的斗争，尤为激烈。

一九〇九年清政府打算向英、德、法借款修筑粤汉、川汉铁路，遭到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的强烈反对，一九一〇年清政府被迫同意“集股自办”。两湖和川、粤四省都相继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陆续筹集了资金四千余万两。广东全是商股，湖南、湖北一部分是商股，一部分是用各种捐税征集的民股。四川、湖南还按田亩收租作股，这种“租股”由政府代征，在股款中占很大的比重。广大贫苦农民在征租时备受困苦，他们对官吏和绅商任意侵吞铁路股款，早已十分不满。一九一一年五月清政府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对它的皇族内阁的支持，悍然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全国商办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派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去强行接收四省铁路公司，接着邮传部尚书、大买办盛宣怀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把粤汉、川汉两路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所谓铁路干线“国有”，实即为帝国主义所有。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许多绅商也因铁路国有侵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表示不满。因此，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迅速掀起了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保路运动。

三、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开始时是由立宪派发起和控制的。铁路借款合

同签订的第二天，湖南绅商聚集在谘议局开会，散发传单，揭发清政府大借外债，出卖国家主权的罪行，并成立了保路团体。湖北的斗争尤为激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詹大悲在《大江报》上，以《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为题，发表文章，鼓吹革命。湖广总督瑞澂逮捕了詹大悲，查封《大江报》，这更激起了各界人士的反抗。湖北谘议局召开了几千人的大会，会上群情激愤，高呼救国，有人砍断指头表示反抗清朝的决心。他们派代表到北京去请愿，在邮传部外绝食三天三夜，要求收回成命。广东的铁路公司也召开了股东会议，决议继续商办，并设立了保路机构。两广总督出示取消股东会议案，市民们以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相对抗，一些铁路股东逃到香港，成立保路组织，继续斗争。四川铁路公司在成都开会，成立保路同志会。立宪派头目蒲殿俊、罗纶被推为正、副会长。不久，四川各府州县相继建立保路同志会，参加者达数十万人。清政府下令各地严禁保路运动，把各省派往北京的请愿代表拘押起来或押回原籍。许多立宪派分子在清政府的压力下，纷纷退让，同意铁路由政府自办，只希望发还股本，保障自身的经济利益，竭力把群众斗争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里。四川的立宪派要市民供奉光绪帝的牌位，两旁抄录光绪帝“谕旨”中“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两句话，作为争路的合法根据，并以保路同志会名义出布告：“一、勿在街市群聚。二、勿暴动。三、不得打教堂。四、不得侮辱官府。”^① 压制群众的革命斗争。立宪派非常害怕群众起来革命，但也想利用群众斗争的声势，逼清政府向他们开放政权。他们接连向清政府提出改组皇族内阁的要求。清

^① 三余书社主人编，《四川血》，《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四），第四一—三页。

政府断然拒绝。立宪派又碰了壁。

广大群众对立宪派的妥协态度非常不满，迅速冲破他们的控制，展开了更激烈的斗争。湖南长沙、株州万余工人举行罢工示威；湖北宜昌几千铁路工人与清军搏斗；留日学生举行集会，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旅美广东籍华侨通过决议：“粤路股银，皆人民血汗，当执定成案，有劫夺商路者，格杀无论。”这一切活动，都表达了各界人民反抗斗争的坚定决心。

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最激烈广泛。八月，成都各地发动罢课、罢市斗争，全川各地接踵响应。九月，保路运动发展为全省的抗粮抗捐斗争，群众宣布：不纳粮，不纳税，不负担外债分厘。清政府手忙脚乱，急忙派端方从湖北带兵入川镇压，并命令川督赵尔丰镇压群众斗争。赵尔丰逮捕了蒲殿俊、罗纶等人，群众至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者，赵尔丰竟丧心病狂地下令枪杀请愿群众，当场打死三十二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惨案发生后，人民群众义愤填膺，全川各地迅速掀起革命风暴。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联络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吴玉章等在荣县宣布独立，成立革命政权。

四川保路运动发展为武装起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四川的反动统治，同时震动全国，促成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第二节 武昌起义和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一、武昌起义

武汉三镇地处长江中游，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重镇。

十九世纪末，由于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残酷掠夺和压迫，使这个地区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人民的反抗斗争和会党起义绵延不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在这里积极联络会党，发动新军，先后成立了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等革命团体。并曾几次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不幸都失败了，这些团体也相继受到清政府的镇压和破坏。一九一一年春，蒋翊武、刘尧澂等人在振武学社的原有基础上，成立文学社，推蒋翊武为社长，在新军各标营设立秘密代表，积极发展组织。武昌起义前，文学社在新军中已拥有社员三千多人，成为武汉地区一个有影响的革命团体。

武汉地区另一个重要革命组织是共进会。一九〇七年一部分同盟会会员在东京成立共进会，专以联络长江中上游的会党。一九〇八年共进会领导人孙武、焦达峰回到两湖地区活动，翌年设共进会总部于汉口，设分部于武昌，联络江汉地区的会党，策划武装起义，结果没有成功。共进会领导人转而以湖北新军作为工作重点，积极在新军中发展组织，准备起义。

一九一一年，宋教仁等一些原籍长江流域的同盟会会员，不满意同盟会领导多年来集中力量在华南搞武装起义的做法，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并在湖北设立了分会，直接参与对湖北地区革命活动的领导，积极促进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推动了武汉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

保路运动爆发后，革命形势一日千里向前发展，文学社、共进会领导见时机成熟，经多次议商，于一九一一年八月，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推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设总指挥机关于武昌小朝街，又设机关于汉口俄

租界宝善里，积极筹划武装起义，并派人到上海邀黄兴、宋教仁来鄂主持大计。此时黄兴尚在香港，宋教仁犹豫不决，没有及时来到武汉。

九月初，清政府派端方率湖北一部分新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认为时机有利，又怕新军陆续调走，分散革命力量，决定从速起义。九月二十四日，孙武、刘尧激等召集会议，定于十月六日（中秋节）发动起义，并制订了起义计划。此后，武汉城里街头巷尾遍传“中秋杀鞑子”的故事。湖广总督瑞澂得到消息后，日夜派兵巡逻，并把自己的行辕设在楚同兵舰上，晚间时常偷偷地到那里去睡觉，以作逃跑的打算。由于准备工作尚未做好，起义日期被推迟十天。十月九日，孙武在汉口宝善里机关配制炸弹，不慎爆炸，机关被沙俄巡捕破坏，搜去了所有起义用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等物件，统统转交给瑞澂。瑞澂派反动军警四出追捕革命党人。蒋翊武等鉴于形势紧迫，决定于当晚十二时起义，并派人向各标营下达命令，以炮队炮声为起义信号。但命令发出后不久，起义机关又被清军包围，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蒋翊武逃出武昌，杨洪胜因运送弹药也被逮捕。奉命向炮队传达命令的人，又没有将命令送到。是夜，革命士兵枕戈待旦，因未闻炮声，起义计划没有实现。第二天，刘、彭、杨三人被杀害。瑞澂下令紧闭城门，准备照搜获的名册捕人，并命令各标营封锁营门，严禁士兵出入。武昌城里风声鹤唳，情势紧张。在危急关头，各标营革命士兵代表就自动串连，决定照昨天的命令不惜一切于当晚起义。十月十日晚七时，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士兵在熊秉坤率领下首先发难，杀死了阻拦起义的排长、队官和代理管带等，直奔楚

望台军械库，驻守军械库的革命士兵立即鸣枪响应，占领了楚望台。接着，步兵、炮队、辎重各营和陆军测绘学校学生都行动起来，奔集楚望台，领取军械弹药，会攻总督衙门。瑞澂慌忙从督署后墙上凿开的洞里爬出，逃到楚豫兵舰上，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率残部逃出武昌。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士兵占领了武昌。十一日、十二日，驻汉口、汉阳的新军起义，革命军占领了武汉三镇。

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面临着组织革命政权的迫切任务。当时，同盟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不在武汉，直接筹划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人，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有的逃亡在外，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同时，由于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只有反清革命观念，对汉族大官僚、立宪派认识模糊，迷信那些“大人物”的威望和能力，希望他们出来组织政府，号召全国。十月十一日，革命党人邀请了一些立宪派绅士、旧官僚在諮议局开会，推举都督，结果竟把新军协统黎元洪抬出来当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地方革命政权的都督。第二天，他们又邀立宪派头目湖北諮议局议长汤化龙出任政事部长，组成了湖北军政府。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了处理当前急务，指挥战事，组织了谋略处，负起军政府的实际领导责任。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废除清朝皇帝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并陆续颁布了一些革命文告。在号召各省起义檄文中，对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并号召各地会党发动起义，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在豁免捐税布告中，宣布永远裁撤除海关以外的税关，取消除盐、烟、酒、糖等税捐以外的所有税捐，免除本

征本年和历年积欠的田赋，免缴除供地方所用以外的杂捐。这些措施促进了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①武昌起义的胜利，使革命群众长期以来蕴藏在心中的革命热情迸发出来了，汇成了支持武汉革命战争的强大力量。湖北军政府扩充革命武装，原定增募四协，由于人民的踊跃参军，五天内即告足额，但四乡农民赶来报名的还源源不绝。湖北地区的青年学生也纷纷参军，有的学生从上海赶到武汉参军，因而成立了二营学生军。这批被招募的新军，虽然未经训练，但勇猛异常，在汉口前线作战，几次打败了清军。附近的工人、农民热情支援革命军，拿起刀斧、扁担奔上前线杀敌；武汉市民积极捐献食物，慰劳战士，每闻捷报，就奔走相告，热烈庆祝。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革命军占领宜昌、沙市、荆州、监利等地区；江湖会也在光化举行暴动，占领了襄阳，附近谷城、枣阳、南漳等县四起响应，革命浪潮激荡了整个湖北。

湖北军政府是资产阶级政权的雏形。军政府的两个主要职务被旧势力的代表黎元洪、汤化龙占据，革命党人设置的作为革命领导核心的谋略处，很快被撤消。大权旁落了。黎元洪，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任职于北洋舰队，甲午战争失败后投靠张之洞，任“自强军”管带、陆军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曾参与破坏和镇压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武昌起义时，他坐镇军营，严禁士兵参加起义，并亲手杀死过两名革命士兵。武昌起义的第二天，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抓他出来

^①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九十八页。

当都督，他坚决不干，还威吓革命党人，要士兵们放下武器，向清政府投降。革命党人用枪逼他签署都督文告，他连连摇头说：“勿害我！勿害我！”当了都督后还说：“我的脑袋被你们这些人送掉了。”^①黎元洪是个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反动家伙。汤化龙也是个反动家伙，他表面上宣称对革命“自当尽死效命”，暗中却电告清政府说：“化龙决不从逆”。当革命形势日益发展时，黎元洪、汤化龙一伙就呼朋引类，集结反动势力，从内部破坏革命。他们以“维持社会秩序”为名，严禁下层人民进行反封建斗争，通告省内各州县官绅赶办团练，防止农民暴动，并派军队镇压会党起义。这些家伙还利用一切机会破坏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关系，把一些不坚定分子拉入他们的怀抱，打击革命党人，并暗中与北方反革命势力勾搭。因此，新生的第一个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一开始就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二、全国革命高潮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分化瓦解

武昌革命士兵点燃的星星之火，迅速燃遍全国，各省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会党响应起义，夺取政权，广大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也奋起暴动。清朝的反革命大厦倾颓了。

首先响应起义的是湖南。十月二十二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率领新军、会党在长沙起义，斩巡防营统领黄忠浩，驱逐巡抚余诚格，占领长沙，建立了湖南军政府，焦达峰任都督，陈作新任副都督。湖南军政府成立后，焦达峰调集大军支援武昌，有力地支持了武汉的革命战争，推动了南

^① 卢智泉、温楚珩：《记詹大悲办〈大江报〉和汉口军政分府》，《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五十页。

方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同日，陕西革命党人策动新军在西安起义，击败了西安将军文瑞的旗兵，推同盟会会员张凤翥为全陕复汉军大统领，宣告陕西脱离清政府独立，震动了黄河流域各省。十月二十九日，山西革命党人率新军起义，击杀山西巡抚陆钟琦，革命烈火蔓延到清朝统治中心附近。十一月三日，上海的革命党人和部分军警发动起义，进攻制造局和警察局等机关，第二天占领上海，成立沪军都督府，由资产阶级政客陈其美任都督。驻上海的清朝海军也宣布独立，归附革命。革命在东南经济中心上海的胜利，对长江下游和全国的革命形势产生很大的影响。江西、云南、贵州、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都先后发动新军、会党起义，建立军政府，宣告独立。十一月二十二日，四川重庆革命党人起义，成立了蜀军军政府，川东南五十余州县闻风响应。二十五日，四川的一部分革命党人和入川的湖北新军在资州起义，杀死前来镇压保路运动的刽子手端方。江苏巡抚程德全、广西巡抚沈秉堃，在革命形势的压力下，也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到十一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已有十四个脱离清政府的统治。直隶、河南、甘肃、新疆、东北等地区，革命党人也不断地发动武装起义。

在全国革命形势的激荡下，工农群众的革命风暴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广大贫苦农民把武昌起义的胜利和革命在全国的发展，看作是反封建斗争的信号。湖南的衡州、嘉禾、醴陵等十几个州县的会党和农民先后起义，围攻县署，逐杀反动官吏和地主豪绅。陕西咸阳、凤翔、陇州等地区，会党、刀客和农民纷纷暴动，杀官吏，劫监狱，打乱了地方的封建秩序，并与清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有力地支持了陕西资产阶

级革命党人的斗争。山西高平、长治等县爆发了声势很大的干草会运动，农民用鸡毛传单串连起来，手执农具和干草，四出抄没土豪劣绅的家产，焚烧他们的房子，并涌进县城，捣毁巡警局，迫使县府出告示免除一切捐税。江苏常熟、无锡、江阴三县交界地区，贫苦农民奋起抗租，砸毁劣绅的房子、店铺，但遭到了无锡军政分府和常熟“新县府”派出的军队的镇压。江苏扬州还爆发了孙天生的贫民起义，建立了扬州军政分府，“通令人民安居乐业，三年不完粮，诸捐杂税全免”，并下令压低米价。^①但是，这个新政权仅仅存在三天，就被绅商勾结反动军队扼杀了。河南的许多地区不断爆发会党起义。永城、柘城一带地方的会党二万余人，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帜，举行暴动，攻入县城，查抄城里三个大地主的家产，分给贫民。洛阳地区的农民，组织一个团体，对外叫“在园”，对内称“复汉军”，^②有几万群众参加，声势很大，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准备举行暴动，因组织不够严密，举义前就被清地方官破坏了。河南信阳的京汉铁路工人和农民组成民军，在铁路两侧，用扳道岔、拆铁轨等方法，使载运清军的列车翻车，并袭击粮库、弹药库，支援了武汉的革命战争。四川、浙江、安徽、广西、东北等省区，都爆发了大大小小会党和农民起义，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各省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新军的起义，工农群众的武装暴动，汇成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三次革命高潮。但是，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却在分化瓦解，没有力量把这场革命

^① 祁龙威：《扬州孙天生起义调查》，《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三一六页。

^② 杨依平：《略谈“在园”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三七七页。

推向前进。他们所关心的已不是推进这场革命，而是如何与旧势力结合起来结束这场革命，镇压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维护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旧制度。这批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右翼，例如，同盟会的重要骨干胡汉民，被广东立宪派、绅商推举为都督后，就与旧势力站在一起，解散民军，镇压群众斗争；山西的阎锡山当了都督后，很快与封建势力结合起来，残酷地镇压农民和会党义起，成了山西的土皇帝；云南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掌握政权后也与立宪派、旧势力融合在一起，镇压会党起义；武汉共进会领导人孙武等一帮人，与黎元洪为首的旧势力勾结起来，成为支持黎元洪反动统治的政客。资产阶级革命派内的少数人，虽然还想最后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也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对于轰轰烈烈的农民反封建斗争，不敢领导，不敢在发动群众的道路上前进一步，因此，一筹莫展，处处寻求妥协，幻想以妥协来换取“胜利”，不敢向反动势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例如，黎元洪当湖北军政府都督后，集结反动势力，危害革命，少数革命党人虽然也看出来，但不敢依靠群众，组织有效的反击，反而处处迁就，大力支持黎元洪。

总之，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清朝反动统治崩溃了，那个想要推翻清朝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分化瓦解了，例如章太炎竟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它的右翼跑到大地主一边去了，许多地方的新生的“革命政权”成了人民群众的对立物。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左翼，虽然没有和反动势力站在一边，但是在妥协的道路上不能自拔。这种状况，为反动势力在各地的篡权活动大开方便之门。

三、各地反动势力的篡权活动

武昌起义后，全国革命形势高涨，清朝反动统治已维持不下去了，立宪派看到这种时局，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共和制度的拥护者，千方百计钻进革命阵营，篡夺权力，控制革命力量的发展。康、梁之流公开宣称，他们要“乘此而建奇功”，要“因祸得福”，对各地起义的“处之之法，则运动各省暂倡自立，以杀革党之势”。^①一些受革命势力冲击较大的省分，大官僚们见势不妙，赶忙易帜独立，“拥护革命”，以保持他们的反动势力。立宪派与旧官僚朋比为奸，利用革命派的妥协、软弱，在各地展开了阴险的夺权活动。各地旧势力的篡权活动，大致有三类情形。第一类：立宪派策动清朝大官僚自动宣告独立，宣布拥护共和，建立都督府，由旧官僚任都督，原封不动地保持旧政权、旧秩序。江苏的独立就是个典型。十一月三日，上海起义的消息传到苏州，立宪派和绅商纷纷要求江苏巡抚程德全早日独立。次日程德全在巡抚衙门举行仪式，宣布江苏脱离清政府独立，把巡抚院部的牌子换上都督府的牌子，自任都督，由上海派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登台授印，以后各商铺悬挂白旗，算是完成了“革命”。一位目击者说：“苏州光复时，没有丝毫变动，仅用竹竿挑去了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云。”^②这是对于江苏独立的真实写照，也是深刻的讽刺。广西的独立也与此类似。第二类：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掌握了政权的省区里，立宪派串通反动势力，策动反革命政变，篡夺军政大权，屠杀革命党人，镇压革命群众。

^①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油印本第六册，第554—555页。

^② 钱伟卿，《谈程德全二三事》，《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一二五页。

湖南、贵州就是如此。湖南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旧势力斗争不力，没有全部瓦解反动军队，而让立宪派头目谭延闿当上军政府的民政部长。立宪派又阴谋夺取军权，把諮议局改为临时参议院，规定都督府的一切措施都要经过参议院许可，借以限制削弱都督的军权。这个参议院议长就是谭延闿。立宪派不仅掌握了民政，也控制了军权。焦达峰、陈作新一再让步，并没有满足立宪派的要求，反而助长了他们的野心。当焦、陈发现大权旁落，要解散参议院时，立宪派分子、地方豪绅就兴风作浪，收买新军中的反动军官，煽动叛乱，竟于十月三十一日杀害了焦达峰、陈作新。谭延闿爬上去当了都督。同盟会领导人对立宪派不仅不组织反击，反而害怕湖南“再乱”，指示会员支持谭延闿的反动政权。^①贵州的反革命政变更为酷烈。十一月四日，贵阳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发生争论，一派主张镇压反动势力，一派主张采取“宽大主义，免增怨毒”。结果“宽大主义”占了上风。立宪派在新成立的革命政权中占一半名额，拥有相当的实力。同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丧失警惕，没有遣散残留的反革命军队，反而把他们收编起来，供给武器、弹药。立宪派就利用这些反革命军队，发动叛乱，捕杀大批革命党人，以后，又引进云南军阀唐继尧，把革命党的主要骨干，几乎斩尽杀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宽大主义”，造成了历史的悲剧。第三类：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起义胜利后，印把子一开始就落入了军阀、官僚、立宪派的手里。这批反动家伙就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屠杀革命群众，巩固旧势力的统治。除前面

^① 参见周瑞麟：《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一五二——一五三页。

讲到的湖北是这种情况外，浙江也是个典型。武昌起义后，浙江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等在杭州发动新军起义，占领抚署，结果由立宪派头目汤寿潜当了都督。其他如山西、福建等省区也类似这样。由于立宪派、旧官僚、军阀在各地的篡权活动，独立后各省的政权，大多数落入这些反动家伙手里。这些地方政权，名义上是革命政权，骨子里还是旧的，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上层的联合专政。这些反动家伙，镇压群众革命斗争，积极策划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方反动势力妥协，形成了一股很大的逆流，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此也无能为力，这是他们软弱、妥协的恶果。

第三节 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反扑 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一、帝国主义干涉辛亥革命的罪恶活动

毛主席指出：“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①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迅速的强烈的反响，使帝国主义惊恐万分，美国银行团驻华代表司戴德的妻子在十月十二日的信中描述她目睹的情景说：“全北京现在都因汉口的革命而处于人心惶惶的状态。……此间的外交家们吓得要死，整天有人来看维拉（即司戴德），并对他说，革命要蔓延开了，另一次义和团要起来了，清朝要被推翻了。……总的来说，目前人人都战战兢兢。”^②帝国主义分子虽不知道辛亥革命的详情，

^①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〇二页。

^② 克罗莱，《司戴德传》，第四一二页。

但凭着他们反动的阶级本能和丰富的侵略经验,都认为“革命决不会使我们得到任何好处。”^①《字林西报》则直截了当地说:“就某种意义说,这一事件是反对我们自己的。”于是,帝国主义者使出种种手段,帮助中国反动派绞杀这场革命。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湖广总督瑞澂请求英船阻止“叛军”渡江赴汉口,英国公使朱尔典立即请驻华海军总司令“给他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汉口的俄国领事也马上建议,“让租界义勇队出动”,协助清政府扑灭革命。英、美、日、德、法等国的大批军舰也赶到武汉江面,伺机干涉。德国炮舰曾公然站在清政府一边,炮击革命军,“卷入‘热烈的战争’中”。在武昌起义之初,汉口的帝国主义领事团曾正式开会讨论武装干涉问题,但当时的军事形势,革命党占了很大的优势,武汉三镇全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汉口租界已成孤岛。这就迫使各国领事不得不在十月十七日声明“严守中立”,借以逃避革命风暴的打击。可是事实证明,这种“中立”纯粹是麻痹革命党人的欺骗手法。帝国主义者一方面高喊“严守中立”,另一方面加紧调兵遣将,对革命横施种种压力。至十一月中旬,游弋在中国领水的外国军舰达五十一艘。同时,帝国主义又向中国沿海各口岸和北京使馆区增兵。仅上海一地即有外国侵略军三千余人。帝国主义还派兵占领了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企图阻止革命在华北地区的发展。沙俄、日本等一些帝国主义国家,还阴谋乘机出兵,肢解中国。俄、日协议对中国革命的干涉要“取得一致行动”。^②武昌起义后,俄国报刊

① 克罗莱:《司戴德传》,第四一七页。

② 《俄国驻日本大使馆顾问布罗涅夫斯基密电》,《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四八页。

公开鼓吹利用中国的“无政府状态”，在远东进行领土扩张，叫嚣“俄国应当迅速派遣国防军进入中国各个已经倾向于俄国的地区”，带头“共同瓜分这个世界的赘物”。^①沙俄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叫嚷：“由我国利益的观点看来，现在的中华帝国的解体在各方面都是合意的。”“我们可以利用情况以便完成我国的移民事业及巩固我国的边疆”。^②沙皇尼古拉二世在给驻华公使的训令中凶恶地说：“将中国分为几个独立国家，从我们来看，最适合我们的广泛利益。”^③沙皇政府还下令两周内修好日俄战争时的远东兵营，命令边疆各地区军队进入戒备状态，准备入侵中国。辛亥革命时期，沙皇政府派兵侵入外蒙古，运进大批枪枝、弹药、军刀，策动一小撮蒙古王公发动武装叛乱，阴谋占领蒙古，分裂中国。俄帝国主义分子维特供认：“根据我所得知的消息，在最近几个月，我们看来已卷入在蒙古的冒险。而利用中国的混乱、造成蒙古脱离中国，则是在我们的秘密影响或唆使下发生的。”^④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沙俄还策划乘机占领新疆，只是由于我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斗争，沙俄的阴谋才没有得逞。日本帝国主义也阴谋发动武装侵略，企图以武力维持清政府的统治，把革命势力“限制”在长江以南，制造南北分裂的局面，并把清政府变成它卵翼下的傀儡。沙俄与日本曾多次接触，策谋共同出兵干涉中国。

但是，帝国主义用武力扑灭辛亥革命的阴谋并没有实

① 《新时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②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五一页。

③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第二辑，第十九卷，第五十六页。

④ 《维特回忆录》第三卷，第五二四页。

现，因为强盗们困难重重，矛盾成堆，无法进行联合干涉。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日益临近，英、法和德国的对垒，紧张的军备竞赛，争夺非洲摩洛哥的斗争，使西欧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无力在中国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干涉。英国不愿意看到在远东拥有相当力量的日本和沙俄出兵干涉，来侵犯它在华的既得利益。美国也不希望沙俄和日本因干涉中国革命而继续扩大它们的在华权益，影响它在中国日益增长的侵略地位。日本和沙俄虽然急想入侵中国，但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也不敢贸然行动。更重要的是，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使帝国主义用武力来挽救清政府的一切企图成了泡影。帝国主义很快发现：清政府的前途“实属黑暗。本国人民，多不信服。”^①“这个运动广泛蔓延的性质以及它到处获得成功的事实，已使一切用武力来挽救这个国家的企图失去了可能性。”^②

帝国主义在企图用武力威吓革命党人的同时，还力图用劫夺各省军政府的关税收入的办法，从财政经济上扼杀革命。按照往例，关税税款，在征收后向来是在中国银行中存储的，帝国主义也从未向清政府提出异议。但当南方一些口岸被革命军占领后，帝国主义突然一反惯例，提出了由外国人来直接掌握关税的无理要求。英国公使朱尔典宣称：税款被革命军支配，“存在着严重的危险，即可能被他们用来充作军费，或供叛党政府的其他急需之用。”帝国主义控制海关

①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六日，〈英使朱尔典致英外部格雷文〉，《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二九二页。

②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六日，〈英使朱尔典致英外部格雷文〉，《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三三六页。

税收的用心，是十分恶毒的。长沙英国领事在朱尔典指使下，首先劫夺了长沙的关税收入，接着汉口、上海、汕头、广州、厦门、烟台等埠的海关税收，也被当地税务司扣留。不久北京外交使团指定由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联合组成的非常委员会，专门负责中国关税的分脏事宜。而当革命党人经济十分拮据不得不举借外债时，各国银行乃至一般洋商，在各该国政府的影响和控制下，对于革命党人的借债要求，应者寥寥。这样就大大加深了革命党人的财政经济的困难。

帝国主义在“中立”的幌子下，一方面在军事上、经济上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在暗中继续支持清政府的同时，物色、扶植新的反革命走狗，用“计谋”来达到它们“用武力做不到的事情”^①。帝国主义看中了拥有北洋军实权的反革命头目袁世凯，积极扶植他东山再起，并与袁世凯策划南北议和，用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绞杀辛亥革命。

二、袁世凯东山再起

袁世凯这个老反革命被清王朝赶回河南老家后，表面上闲居乡间，“不问国事”，实则无时无刻不想东山再起。他多方联络，察时观势。在朝廷和北洋军中，布满了他的心腹。亲信老友徐世昌是清朝内阁协理大臣，儿子袁克定在邮传部任丞参，老部下冯国璋、段祺瑞掌握着北洋军的实权，巡警部侍郎赵秉钧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等等。在国际方面，他同各国使节特别是英使朱尔典经常接触。武昌起义，举国沸腾，袁世凯洋洋得意地准备再度粉墨登场。在帝国主义的心目

^①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字林西报》社论，转引自《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二四二页。

中，袁世凯是条坚决镇压革命运动和“慷慨”出卖民族利益的可供驱使的有力量的忠实走狗，它们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感到“清朝的末日已经临头了”^①，急切要求起用袁世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公开扬言：“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物的襄助，叛乱自得平息。”^②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在驻华外交使团会议上，提出促使清政府起用袁世凯的主张，得到了各国公使的同意，并由美国公使在入宫觐见时提出这样的要求。帝国主义竭力制造“非袁则亡”、“非袁莫属”的舆论，积极敦促清政府起用袁世凯。

当时，清政府已派陆军大臣廕昌率北洋两镇新军，南下武汉镇压革命。但是，北洋军的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都是袁世凯的爪牙，对廕昌的指挥爱理不理。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的的压力和为了迅速地扑灭革命，不得不起用袁世凯。十月十四日，任命他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要他早日南下督师。袁世凯早存夺取清朝权力的野心，他看透了清朝统治集团的困难处境，决心利用时机，攫取权力，取而代之，于是以“足疾未痊”为名，拒绝了清政府的任命。但在背后又进行紧张的活动，派亲信到帝国主义使馆串通，求助外国主子出来支持他夺取权力。美国驻华使节立即为他奔走，要求各国公使为袁世凯攫取更大的权力制造舆论。美帝国主义的喉舌《大陆报》以《时代宠儿袁世凯》为题，发表社论，竭力吹捧袁世凯，胁迫清政府，说什么“任何低于内阁的位置，

① 克罗莱：《司戴德传》，第四一二页。

② 瑞德：《清室逊位与西方列强》。

是与他的才干和成就不相称的。”各国公使也指责清政府不应该把袁世凯当作一般高级官员看待，应该给予更多的权力。皇族内阁总理奕劻迫于形势，写信给袁世凯要他出来“挽回危局”，并派徐世昌到彰德去“劝驾”。袁世凯通过徐世昌向清政府开出六项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次事变之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予十分充足的军饷。袁世凯这六条的用意，一方面要从清朝那里夺取军政大权，另一方面麻痹革命党人。清朝皇室对于袁世凯所提的要求，踌躇不答。但是正当他们狐疑不决的时候，全国革命形势飞速向前发展，十月下旬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相继独立，廕昌指挥的军队在前线连吃败仗，张惶失措的清朝统治集团不得不于十月二十七日召回廕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他统率水陆各军的全权。十月二十九日临近京畿的山西爆发了革命，同日，驻直隶深州的革命党人新军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协统蓝天蔚发动“兵谏”，通电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实行宪政。清朝统治集团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只好按照帝国主义的意图和袁世凯的要求，把整个权力交给袁世凯，以求得他的庇护。十一月一日，清政府宣布解散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表示要实行“立宪”，妄图苟延残喘。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终于拿到清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

十月下旬，袁世凯眼看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连忙由彰德南下信阳，指挥清军向武汉革命军进攻，并着手巩固他的反革命后方。十一月六日他收买凶手，在石家庄暗杀了正在筹划武装起义的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吴禄贞是同盟会会

员，也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武昌起义后，他与驻滦州的新军密约反清，又与山西的革命党取得联系，组织晋燕联军，准备三路举兵直捣北京。袁世凯把他视为心腹之患，用卑劣的手段杀害了他，并乘机解除了滦州新军中倾向革命的主要将领的兵权。同时，他还残酷地镇压了直隶、河南地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会党的起义，派兵进攻陕西和山西的革命军，制止了山东独立，并利用同盟会叛徒汪兆铭^①瓦解、破坏京津地区的革命组织和起义活动，巩固他在北方的反革命阵地。十一月十三日袁世凯进京组阁。十六日组成了所谓责任内阁，他的心腹赵秉钧（内政大臣）、王士珍（陆军大臣）、唐绍仪（邮传部大臣）都延入内阁。为了装点门面，把立宪派梁启超（法部副大臣）、张謇（农商部大臣）也列入内阁名单。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东山再起大加捧场。英国外交部长格雷说：“我们对袁世凯怀着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这样的政府将会得到我们能够给予他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②各国驻华公使也立即向袁世凯致贺，并授权英国公使与袁世凯会谈“妥善行动”，谋划绞杀辛亥革命的办法。

帝国主义者和袁世凯都清楚地知道，清政府早已不得人心，用武力讨平这场革命是办不到的。因此，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采取狡猾的“打”和“拉”的策略，一方面凭借帝国主义的势力和袁世凯的反革命军队，压迫南方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又抛出停战议和的钓饵，以清政府的下台来诱使资产阶

^① 汪兆铭，也叫汪精卫，早年留学日本，混入同盟会，任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一九一〇年三月与黄树中、罗世勋在北京谋刺摄政王，事败被捕，汪在狱中叛变，后由袁世凯保释，成为袁世凯手下的大特务，在革命阵营内部干了大量破坏活动。参见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

^② 参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三一四页。

级革命党人妥协、投降，达到窃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罪恶目的。

三、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

南京临时政府是在中外反革命势力重新组合和阴谋破坏革命的情况下成立的。

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以指导当时的革命斗争。当时出现了两个势力中心：一个是首义地区武汉，一个是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所在地上海。两地都发出通电，邀请各省都督府派代表开会，筹组中央政府。十一月十五日，聚集上海的各省代表开会，定名为“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会议推伍廷芳、温宗尧为外交代表，承认武汉军政府为民国中央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武汉方面对上海抢先一步表示不满，认为会议地点应在武汉，派代表赴沪力争。上海方面只得改变决定：各省留一人在上海对外联络，组织临时政府问题改在武昌讨论。十一月底，各省代表到达武汉，讨论组织中央政府。当时，正值黄兴所统帅的湘鄂联军战事失利。汉阳失守，接着汉口被占，武昌处于清军的炮火之下，会议只好移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安徽、湖南、湖北、广西、四川、直隶、河南等十一省二十三名代表。会议从十一月三十日到十二月四日，开了五天，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大纲”规定中央政府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产生，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选举，临时参议院由各省都督府各派三名参议员组成。会议在英国驻汉口领事的“调停”下，接受了袁世凯提出的停战议和条件，决定与袁世凯举行“和平谈判”。

十二月二日，江浙革命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们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当武昌危急、南京攻克的时候，武汉方面革命军势力显著削弱，陈其美乘机于十二月四日，会同汤寿潜、程德全邀集各省留沪联络代表举行会议，认为武汉代表会已失去了组织临时政府的条件，当场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武汉方面得悉此信，马上由黎元洪致电各省都督表示反对，声明只承认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十二月十日，沪、鄂两地代表陆续到达南京，议定十六日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成立中央政府，因袁世凯派唐绍仪南下议和，传闻袁世凯已赞同共和政体，于是决定推迟选举大总统，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正当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难产的时候，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自海外回国。孙中山为推翻清朝反动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是革命民主派的公认领袖。他到上海后，立即召开同盟会会议，讨论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问题，并表示：“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①这给左翼革命党人带来了勇气和希望，他们积极奔走，酝酿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十二月二十九日，奉、直、豫、鲁、晋、陕、苏、皖、赣、浙、闽、粤、桂、湘、鄂、川、滇等十七省代表，开会推选大总统，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但是，为了继续寻求妥协，各省代表又决定请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拥护共和，孙中山当即辞职，把总统位置让给袁世凯。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

^① 孙中山，《革命原起》，《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一），第二十页。

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以阳历一九一二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红、黄、蓝、白、黑）为国旗。一月三日，代表会议又选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临时政府国务员名单，共九人：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财政总长陈锦涛，教育总长蔡元培，交通总长汤寿潜，海军总长黄钟英，司法总长伍廷芳，内务总长程德全，实业总长张謇。一月底，又将各省代表会议改为参议院，由原代表任参议员。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这个政府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三种势力组成的，革命派居于领导地位。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些有利于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法令。在保护人民权利方面，命令各官厅焚毁刑具，停止刑讯，取消法律中对于各类“贱民”的一些特别限制，通令保护华侨，严禁贩卖华工，禁止贩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和一切主奴名分。在革除社会恶习方面，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禁止赌博、蓄辫、缠足等。在教育方面，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否定清朝“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取消了“读经”科，提出实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的学校教育。在奖励实业方面，宣布了振兴实业的方针，颁布了一些保护工商业的规章措施，鼓励兴办实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三月十一日，临时政府颁布了孙中山提出的《临时约法》。《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选举等项权利。当然，这里讲的人民，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实际上并不包括广大劳动人民。很明显，这是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约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它一定的进步意义。

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宣告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帝制的终结，这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胜利。但是，这个资产阶级政权太软弱了，几乎没有采取什么重大的措施，来进一步推进革命，它在妥协的气氛中诞生，又在妥协的轨道上滑行。这个政府一成立就发表了《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重申全部承认革命前清政府与帝国主义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一切既得的侵略权益，呼吁帝国主义赞助中国革命，天真地向帝国主义国家提出：“当民国改建一切未备之时，务守镇静之态，以俟其成。其协助吾人，俾种种大计，终得底定”^①，幻想以此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同时，南京临时政府又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与袁世凯的和平谈判上，梦想用妥协来换取建立全国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就决定了这个政权很快夭折的历史命运。资产阶级革命派无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政权，处处与旧势力妥协，在各省都督府和临时政府里，旧势力拥有相当大的力量，以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法有效地领导这个政府，行使中央权力，最后，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压力下，被迫交出政权。

第四节 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果实 和辛亥革命的失败

一、南北议和与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果实

袁世凯搞议和阴谋，是抓住了南方革命阵营的弱点的。武昌起义后，革命阵营混入了大批立宪派分子和旧官僚，这

^① 《临时政府文件辑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二十三页。

批人篡夺了许多省区军政府的领导权，是袁世凯反革命议和阴谋的应声虫。他们希望由袁世凯来稳定“动荡”的局势，排斥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政权，以免革命革到他们头上。许多革命党人也渴望寻求妥协，希望用“廉价”的办法来换取清政府的下台，达到他们的“革命目标”。还在袁世凯刚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时，湖北军政府的领导人就急匆匆地给他写信，希望他“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庭扫虏”。^①身为湖北革命军总司令的黄兴也写信给袁世凯，希望他出来建立拿破仑、华盛顿的功业，并表示如果这样，“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②袁世凯对南方革命阵营的软弱和妥协的心理了解得十分清楚，他与立宪派头目张謇早有勾搭，这时张謇已混入革命阵营，与汤寿潜、程德全勾结在一起，成为袁世凯在革命阵营里策划议和的内奸。因此，袁世凯一上台就大胆地展开了他的反革命议和活动。

十月下旬，袁世凯在下令北洋军队在前线发动进攻的同时，派遣蔡廷干、刘承恩携带英国使节的介绍信，到武昌试探和谈，没有结果。袁世凯又命令北洋军猛攻汉口，十一月二日，汉口失陷。十日，袁的密使第二次到武昌试探议和，遭到武昌方面的拒绝。十一月二十七日，北洋军队攻下汉阳，架炮于龟山之上，猛轰武昌，但只是轰击，不渡江攻占武昌，以便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进行和平攻势。由于汉口、汉阳战事的失利，黄兴离开武汉到上海，湖北革命党人中的悲观、妥协空气浓厚起来。这正是袁世凯

① 《鄂人致袁世凯书》，杨敦颐，《清史稿夏始末记》第八编，第七十五页。

② 黄兴，《致袁世凯书》，《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一期，第七十一页。

所希望的“和谈”的时机。还在攻占汉阳的前一天，他就与英国公使密商，决定由英国公使出面提出停战议和条件。英国公使朱尔典即电令驻汉口总领事，将袁世凯的要求转告黎元洪，并声明：英国旅汉侨民所受之危险，“不宜再任其迁延，且无用之流血，亦宜停止。”^①向军政府施加压力，促使革命党人接受袁世凯的条件。十一月底，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向正在汉口开会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转达袁世凯的三项条件：“（一）即日停战；（二）清帝退位；（三）袁世凯为大总统”。并谓“如能照办，则共和即可成立。”^②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军事压力下，代表会议在征求黎元洪、黄兴、程德全意见后，接受了上述要求，决定以汉口为议和地点，由伍廷芳代表黎元洪与袁世凯的代表议和，并通过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③十二月三日武汉地区局部停战。

十二月十一日，袁世凯的议和代表唐绍仪到达武汉，由朱尔典介绍会见了黎洪元。帝国主义为了便于控制议和，希望会议地点改在上海；这时，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领导人、立宪派的头目也集中在上海，他们也希望会议地点改在上海，加上伍廷芳一时也赶不到武汉，于是双方决定会议地点改在上海。

十二月十七日，唐绍仪到达上海，第二天在英租界市政厅与伍廷芳正式举行南北议和。当时，在南北议和问题上，

①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英使朱尔典致英外部格雷电》，参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三二八页。

② 张国焘，《辛亥革命史料》第二八二、二八三页。

③ 张难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十三页。

革命阵营里存在着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一部分革命派坚决反对议和，认为议和是袁世凯的阴谋，应乘占领南京后的有利形势，万众一心，誓师北伐，推翻清政府。以黎元洪、谭延闿、程德全、张謇为代表的旧官僚、立宪派坚持妥协议和，并搞了许多阴谋活动。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也跟在旧官僚、立宪派后面附和。十二月十六日，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发表了《告唐绍仪》的社论，社论说：“吾深有待于唐绍仪之婉转陈达，俾袁氏迫令满虏以退让为能，则民国之建，无以为梗。吾族健儿必乐于满虏以特别之优待，而总统之席，袁氏终有时当选。”^①鲜明地表现了妥协求和的态度。

伍廷芳和唐绍仪的公开谈判，共举行五次。但议和中的重要问题和大纲，都由黄兴和唐绍仪秘密商定。^②公开谈判只是一种正式手续而已。第一次会议达成了陕西、山西、湖北、安徽、山东、奉天、江苏七省一律停战的协议；第二次会议上，主要讨论了民主共和政体问题，伍廷芳提出，清帝退位，优待皇室和满族，选举总统，确立民主共和制度，并声明只有先承认共和方能开议。唐绍仪说袁世凯也是赞成共和的，只是说不上口来。会后，唐绍仪电告袁世凯，建议对南方的要求，不采取拒绝态度，政体问题可以召集临时国民会议解决。袁世凯见谈判的目的已经达到，就用南方的要求挟逼清朝皇室。清政府经御前会议讨论，不得不同意把自己的命运付之于不可知的国民会议。第三至第五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方法、地点和优待清朝皇室等问题。这时南京临时政府组成，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虽在旧官僚、立宪派

^①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二三〇页。

^② 参见刘厚生：《张謇传记》第一九五页。

的压力下，孙中山一再表示“暂时承乏，虚位以待”，而袁世凯对此仍不放心，唯恐这种诺言不能兑现，立刻耍出无赖手段，“声言南北协约以君主立宪为前提，而唐、伍两全权擅用共和政体，踰其职权；且协约未决，南人先组织政府，公选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①迫使唐绍仪辞职。唐绍仪在辞职后宣布加入同盟会。袁世凯并在孙中山就职的那天，唆使北洋军将校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余人联名通电，主张维持君主政体，宣称“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反抗。”这时，帝国主义也加强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攻击和压迫。外国报纸公然诬蔑南京临时政府“远非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仍然是几乎与清政府一样的寡头政治”，^②攻击孙中山的“思想太高”，不适合于“中国社会”，声称只有袁世凯一人才能“底定中国”。^③它们还颠倒黑白，胡说“议和破裂，伍(廷芳)与其党徒，实尸其咎。”^④帝国主义还相约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宣称只有袁世凯出来统一南北，才肯承认中华民国。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鼓动下，混在革命阵营里的旧官僚、立宪派等反动分子又出来兴风作浪，公开要求解散同盟会，指责孙中山“理想太高”，“贪恋禄位”，要求孙中山放弃他的“奢望”。叛徒汪兆铭甚至攻击孙中山不肯与袁世凯妥协，是舍不得丢掉大总统的职位。这时，南北两方的公开谈判已经破裂，双方转入了文电往返和秘密交易。南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十页。

② 《北华捷报》，一九一一年一月六日，转引自《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二五三页。

③ 《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五〇八页。

④ 《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五〇〇页。

方已不再提召开国民会议问题，双方在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优待清室问题上达成妥协。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孙中山再度电告袁世凯，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与清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即履行前言，并提出五项具体条件：（一）清帝退位；（二）袁世凯宣布绝对赞成共和主义；（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之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五）袁被选为总统后，须暂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始能接受事权。袁世凯看了这些条件后，知道大权可以到手，就布置演完他的逼宫戏。袁世凯把南方所提清帝退位的条件透露给奕劻，清室连日召开御前会议，亲贵们表示不接受“退位”这个条件。袁世凯一方面扬言要在天津组织政府以与南方议和相威胁，同时唆使北洋军将校于一月二十六日，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发出通电，要求“立定共和政体”^①，段祺瑞等还扬言，要“率全军将士入京”，与阻挠实现共和政体的王公“剖陈利害”。清朝统治集团至此已气息奄奄，无力挣扎，只好被迫同意溥仪“逊位”。袁世凯立即电告伍廷芳，商谈清室优待条件，经双方协议，定出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八款，主要是：（一）清帝退位后，其尊号仍存不废，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二）清帝退位后，岁用四百万两，由中华民国政府付与；（三）清帝退位后暂居禁宫，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照常留用等。^②此外，尚有皇族待遇四条和满、蒙、回、藏待遇七条等两项协议。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帝溥仪正式下诏退位。二月十四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二月十五日南京参议院

^① 《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一七三页。

^② 参见张国焘：《辛亥革命史料》第三一〇页。

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以十七票全票当选。参议院竟然向袁世凯祝贺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二月二十日，参议院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二、临时政府北迁和辛亥革命失败

孙中山虽然被迫让位，但他仍希望保卫在革命中创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他在向参议院辞职时，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二）参议院选举的新总统到南京就职时，大总统与国务员再辞职；（三）新总统必须遵守参议院通过的《临时约法》，临时政府颁布的一切法令、章程，非经参议院改订，继续有效。孙中山想叫袁世凯离开他的反革命老窝，到革命势力比较强盛的南方来当总统，以便限制他，同时，利用《临时约法》来防止他日后独裁。

袁世凯当然不会同意南下就职，他在北京搞了一个“兵变”闹剧，利用帝国主义和旧官僚等的帮腔，压服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九一二年二月下旬，南京方面派蔡元培、宋教仁等专使，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大总统，袁世凯表面上隆重接待，并装模作样地表示“极愿早日南行”。二月二十九日，袁世凯设宴款待专使团，是夜，北京城里突然枪炮轰鸣，在他的亲信指使下，北洋军队在街上大烧大抢，蜂拥闯入专使团的寓所，一些专使团人员狼狈地逃出避难。第二天，保定、天津等地也发生了类似的“兵变”。帝国主义立即配合行动，增调军队进京“护卫”使馆，制造紧张空气。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将领按照袁世凯的示意，发出通电，叫嚷“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难暂离京一步”。

南方的旧官僚、立宪派又乘机鼓噪，指责资产阶级革命派不顾国家安危，固执定都意见，造成北方危机。黎元洪发出通电说：“舍南京不致乱，舍北京必致亡”，坚决反对临时政府设于南京。

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再也无力抗争下去，只好听任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迁临时政府于北京。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四月一日，孙中山被迫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临时政府迁设北京。至此，资产阶级革命派只剩下在袁世凯看来随时可以废弃的《临时约法》了。南京临时革命政府被袁世凯的反革命政权所取代，辛亥革命失败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夺取了辛亥革命的全部果实，建立了新的反革命专政，近代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

三、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革命的目标是要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此奋斗了十几年，一度搞得轰轰烈烈，曾经建立起短暂的政权，但是最后失败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谈到近代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个强了，一个弱了，所以革命没有胜利。所谓敌人的力量太强，是说帝国主义（这是主要的）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太强。所谓自己的力量太弱，

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表现的弱点，但是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所以表现了弱，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①

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

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辛亥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这两个敌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在当时是强大的。那时，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垄断了交通运输事业和几乎整个工业；在中国驻扎大量军队，大批军舰在中国领水到处游弋，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枢纽；无数的教堂、商业机构遍及中国城乡，与地方封建势力结合起来，形成了很大的反动势力；北京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牢牢控制着清政府，使馆区架炮筑垒，俨然国中之国，操纵中国的政局。帝国主义是不容许中国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它们运用其在军事、经济、外交方面的优势力量，支持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城乡封建势力，接着又扶植新的反革命走狗袁世凯。当时，中国的封建势力也是相当强大的，在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反动统治者不仅掌握着一支相当可观的反革命军队，而且在广大农村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因此，当清朝反动政府瓦解时，封建势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很快又集结起来，北方是袁世凯反革命的崛起，南方是黎元洪、程德全为代表的旧势力，篡夺了各省的地方政权；广大农村的地主、豪绅也纷纷起来，组织团练武装和地方政

① 《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八页。

权，代替清朝的反革命统治机器，对农民的反封建斗争进行残酷的镇压。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打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这种联合进攻，所以革命失败了。

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这主要表现在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太软弱了，它提不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不敢动员、依靠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群众，去战胜敌人，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经济上的孱弱，由于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政治上也十分软弱，富有妥协性。在革命实践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广大群众的反帝斗争，老是埋怨，评头品足，深怕打乱了他们悉心设计的所谓“有秩序的”革命方案，错误地提出了“文明革命”、“文明排外”的口号，限制群众的反帝斗争。武昌起义后，一些省的地方革命政权和南京临时政府还通告保护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权益，严禁人民的反帝斗争，这不仅完全脱离了迫切要求反对帝国主义的广大革命群众，而且把自己置于群众的对立地位。在反封建的课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采取的是联络会党、新军，发动武装起义的路线，加上它所提的土地纲领是原价归原主、增价归国家的富于妥协的平均地权，虽有一定的号召力，但对贫苦农民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这就不能把农民群众广泛地发动起来去彻底摧毁农村的封建制度，挖掉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甚至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不支持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反而与封建势力站在一起，限制和镇压农民运动，维护农村的封建制度，使它完全脱离了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在强大的敌人面前，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最后只好向反动势力妥协，

在南北议和中，丢掉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①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在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这是近代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结果，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中国原来是个封建社会，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逐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君主专制，一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落后反动的统治形式，成了近代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理想工具，辛亥革命打掉了君主偶像，给帝国主义的统治以相当沉重的打击。它唤起中国民主精神的高涨，推动中国人民革命的发展。自此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稳定的反革命统治秩序。帝国主义虽然一再扶起了新的反革命走狗，支持国内封建势力复辟帝制，但都短命地失败了。这不能不说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②

辛亥革命的失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它告诉中国人民，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对于帝国主义，绝不能存在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要独立，中华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十六页。

② 《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八页。

民族要解放，人民要翻身，就只有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把它们打倒，此外没有别的出路。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也不怕帝国主义的恐吓。同时也告诉我们，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完成的，只有依靠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完成这样伟大的历史任务。

第十二章

北洋軍閥的黑暗统治和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酝酿

第一节 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 反袁的白朗起义

一、资产阶级对袁世凯政权的幻想和民国初年的政党组 合

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意识到它所领导的革命已经失败。相反，清朝统治的终结，共和制度形式的建立，《临时约法》的颁布，以及革命带来的一股民主空气，使他们一阵兴奋。他们天真地以为，现在是“破坏告成，建设伊始”，可以安心地发展资本主义了。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的各种实业建设团体，如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民生团、经济协会、西北实业协会、镇江实业协会、安徽实业协会、苏州实业协会、黑龙江实业总会等，纷纷出现，热烈鼓吹实业建设，它们宣告：要乘共和政体建立的时机，实行产业革命，“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的各派政治势力，对袁世凯政权都想入非非。资产阶级革命派，以为在袁世凯政权下，依靠

《临时约法》就可以实现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实业，达到“国家富强”。宋教仁提出的“政党政治”，孙中山提出的“十年建设”和修建二十万里铁路的计划，集中地反映了这种奢望。原来的君主立宪派，在袁世凯窃夺政权中卖了不少力气，这时进一步追随袁世凯，希望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躯壳，从袁世凯那里分享一杯羹。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的政党活动颇为活跃，大大小小的政治团体象泡沫一样浮泛起来，一部分旧官僚、豪绅也混迹其间，追逐自己的利益。从武昌起义到袁世凯窃夺政权这段时间里，这样的政治团体就有三百多个。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以孙中山为旗帜实际由黄兴、宋教仁主持的同盟会，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和张謇的预备立宪公会合成的统一党，黎元洪的民社，汤化龙的共和建设讨论会。此外，还有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协进会、宪政党、自由党、社会党等。这些政党在参议院里展开了激烈的政争。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由秘密变为公开，其妥协性显著增长。同盟会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颁布了九条政纲：（一）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二）实行种族同化；（三）采用国家社会政策；（四）普及义务教育；（五）主张男女平权；（六）厉行征兵制度；（七）整理财政，厘定税制；（八）力谋国际平等；（九）注重移民垦殖事业。^①这个纲领虽然保留了一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色彩，但比起同盟会秘密时期的革命纲领已倒退了一大步，失去了它原来的革命光泽。例如，“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就是要在袁世凯统治的前提下，资产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八十二页。

阶级民主派有较多的地方自治权力而已。

一九一二年四月，参议院迁到北京，为了争夺权力，资产阶级政党又进行了新的组合。

一九一二年五月，统一党为了和同盟会对抗，联合民社、国民协进会等政团，组成共和党。这是一个追随袁世凯政权的反动政治集团，其主要成份是立宪派、旧官僚、军阀和一些同盟会中的蜕变分子，它的头目是黎元洪。

一九一二年八月，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为了实现他们追求的“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在“新旧合作”、“朝野合作”的口号下，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政治团体，组成国民党。提出五项政纲：（一）保持政治统一；（二）发展地方自治；（三）厉行种族同化；（四）采用民生政策；（五）维持国际和平。^①这个纲领，比同盟会公开后提出的九条政纲，又后退了，民主主义色彩更加暗淡。就拿对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问题来看，“维持国际和平”，就是保持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而用含糊的“民生政策”代替“平均地权”，反封建的气味一点也没有了，而所谓“保持政治统一”，还不就是保持袁世凯反动统治的统一吗？国民党名义上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实权却操在妥协派首领宋教仁的手里。为了争取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宋教仁又四出张罗，滥事扩充国民党员，把更多的官僚政客，甚至袁世凯的心腹特务、当时的代理内阁总理赵秉钧也拉进了国民党，黄兴还荒唐地请袁世凯参加国民党，请他当党魁！因此，国民党表面上声势很大，实际上越来越成为一个庞大的脱离人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二七页。

民群众的官僚政客集团。

一九一二年十月，立宪派的政治团体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统一党、共和促进会、共和俱进会、宪政党等，为了在国民党和共和党之间操纵取利，组成以梁启超为头目的民主党。这也是一个依附袁世凯政权，乞求分享残羹的资产阶级右翼政党。

但是，正当这些政党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权利的斗争，资产阶级陶醉于“政党政治”并为之奔走的时候，袁世凯的反革命屠刀就杀过来了，他决心铲除软弱的资产阶级民主势力。

二、袁世凯向资产阶级民主势力的进攻和“二次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风暴，使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受到极大的震荡，反动派急切地希望摧毁残存的资产阶级民主势力，重建他们的反动统治。袁世凯一上台就企图逐步实现这个罪恶目标。

袁世凯刚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由于国内的民主气氛还比较浓厚，〈临时约法〉刚刚颁布，同盟会在南方几省还拥有相当的力量，他还不肯公然脱离民主政治的轨道进行活动，而是采取了卑劣的两面派手法来实现他的目的。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虚伪地表示：“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①接着又任命已经参加同盟会的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成立“同盟会中心内阁”。但是，不到三个月，他就迫使唐绍仪辞职出走，搞垮了“同盟会中心内阁”，而以他的亲信赵秉钧代理内阁总理，用“御用内阁”代替“责任内阁”，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二十七页。

使内阁制名存实亡。同时，袁世凯又用卑鄙的手段残杀革命党人。一九一二年五、六月间，他驱使黎元洪在汉口杀害了武昌起义的参加者、文学社社员祝制六、江光国、滕亚光等人。八月间，又勾结黎元洪以“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①等罪名，在北京杀害了武昌起义中的有功人员张振武和方维等人。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参加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被袁世凯和黎元洪杀害的就有二千多。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此，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

当时，袁世凯看到国民党在临时参议院里还有相当的力量，为了掩饰其破坏内阁和残杀革命党人的罪恶行径，又大施骗术。一九一二年八、九月间，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到北京会谈，表面上对孙、黄十分敬重，称他们为“革命元勋”，对孙中山提出的所有主张，甚至“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也表示赞同。孙中山、黄兴完全被袁世凯的花言巧语所蒙蔽，决心“尽让政权于袁氏”，并同意了袁世凯提出的有利于他加强集权统治的“立国取统一制度”、“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等八大政纲。^②这更增加了国民党对袁世凯的幻想。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三年二月，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在国会中获得了压倒其他党派的多数议席。宋教仁像着了迷一样，俨然以未来的国务总理自居，以为这是通过合法斗争取得政权的好机会，要求以国会的多数党资格组织内阁。他遍游湘、鄂、皖以及南京、上海等地，发表演说，鼓吹“政党政治”和实行责任内阁。袁世凯见到这种情况，就先

^① 蔡寄畴：《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一九五八年版，第二〇七页。

^② 参见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四十七页。

发制人，对宋下了毒手。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两日后身死。他在临死前，还打电报给袁世凯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教仁虽死犹生。”^①宋教仁至死还抱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他不知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那是永远不会实现的。宋教仁之死宣告了资产阶级议会道路的破产。袁世凯得到宋教仁被刺的消息时，还装模作样地惊叫，光天化日之下，竟有这件事，“人心险恶，法纪何存”。他命令江苏都督程德全“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②穷究确情的结果证明，直接行凶的凶手叫武士英，组织这一谋杀案件的是袁系特务、长江侦探科长应桂馨，从应家搜出的行凶手枪、机密电报和信件等物证，确定指使谋杀的是特务头子、内阁总理赵秉钧和他的秘书洪述祖，而向赵秉钧发出谋杀密令的就是袁世凯本人。“宋案”真相大白，袁世凯的反革命狰狞面目已暴露无遗。

这时，全国舆论大哗，人们开始看清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派面目。孙中山在日本发表谈话，认为现在“非去袁不可”。三月底他赶回上海，召集国民党主要干部开会，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但是，当时国民党内部对于倒袁问题，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只有李烈钧等少数人拥护孙中山的主张。黄兴、陈其美等多数派力求妥协，主张“法律解决”。在国会中的许多国民党员，都想保持自己的名位利禄，也主张“法律解决”。庞杂涣散的国民党，无法团结一致进行反袁斗争。

① 《民立报》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② 《时报》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袁世凯看到他的反革命阴谋再也遮盖不住，就秘密下动员令，决定立即以武力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实力。在袁世凯与国民党斗争的紧要关头，帝国主义又公开大力支持袁世凯。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英、法、俄、德、日五国银行团与袁世凯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以盐税收入为抵押，并规定由外国人协助管理盐税征收事务，使帝国主义直接控制中国的盐务机构。正如列宁所指出：“中国的新借款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① 这笔非法大借款，激起了全国舆论和国民党的激烈反对。袁世凯得到帝国主义撑腰后，猖狂地叫嚷：“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② 接着，就以国民党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曾通电反对“善后借款”，不服从中央为借口，下令将三人撤职，并派遣北洋军队大举南下，进逼江西、南京。这时，国民党才被迫应战。

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揭开了“二次革命”的战幕。黄兴也赶到南京，宣布讨袁。接着，上海、安徽、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等地也响应讨袁。但各省的讨袁行动很不一致，国民党已丧失同

^①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五〇页。

^② 《五月二十四日时报北京专电》，见白薇：《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四十九—五十页。

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内部又有严重分裂，他们不可能也不敢发动人民群众参加讨袁。不到两个月，江西、南京两地的讨袁军先后被打败，其他各省也相继取消了独立，孙中山、黄兴再次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

三、白朗领导的农民反袁武装起义

袁世凯独裁政权建立后，疯狂地摧残资产阶级民主势力，残酷地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一九一三年初，河南爆发了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

白朗，河南宝丰县人，辛亥革命前夕曾在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手下充当参谋。吴禄贞被害后，白朗流落河南民间，集结破产农民武装，自称“中原扶汉军大都督”。一九一三年初，白朗在河南中部率领贫苦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占领禹县。接着，转战于湖北、河南、安徽、陕西、甘肃等省，攻城夺地，杀得军阀军队、地主豪绅武装闻风溃逃。白朗起义的目标是要打倒袁世凯的军阀统治。他们愤怒地谴责袁世凯“托名共和”，“厉行专制”之罪行，明确提出了“打富济贫”和“建立完美政府”的口号，颁发了声讨袁贼的文告，自称“公民讨贼军”。起义军到处诛杀贪官污吏，惩办地主豪绅，焚毁地契、债券，夺取豪富的财产接济贫民，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起义队伍由几百人发展到两万多人。当时有这样一首歌谣：“好白朗，白朗好。劫富济贫，替天行道。人人都说白朗好。”这里所讲的“替天行道”，是指率领广大贫苦农民行革命之道。这首歌谣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白朗起义军的拥护。起义军不仅横扫国内的反动势力，同时对外国侵略者也给予坚决的打击。例如，起义军进入湖北老河口（今光化县城）时，烧毁了教堂，处决了一名民愤极大的外国传教士，大长了

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

白朗起义军声势浩大，猛烈地打击了豫、鄂、皖、陕、甘诸省的反动势力，帝国主义横加干涉，一再责令袁世凯加紧镇压，并扬言要直接出兵。袁世凯政府赶忙向驻华外交使团保证“消灭起义者”，先后调集豫、皖、鲁、晋、陕、甘等省的军队二十多万，进行追剿围堵，并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到河南指挥作战，袁世凯政府仅有的几架飞机也被调用去轰炸起义军，沙俄派飞行员库士坦丁直接参加作战。但是，几架飞机损伤了，飞行大队长也受了重伤，北洋军到处挨打，吓得袁世凯坐卧不宁，一再下令撤换、处分大吃败仗的高级军政头目。

白朗起义军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由于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也没有更广泛地发动农民参加反袁斗争，在敌众我寡的困难条件下，长途奔袭作战，起义军十分疲惫。一九一四年六月他们由陕西转回老家河南时，队伍就逐渐失败，白朗也病死在家乡。起义军终于被优势的反动军队镇压下去了。白朗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加速了袁世凯军阀政权的崩溃。

孙中山对白朗起义曾寄以很大的希望，亲自写信给白朗，并派人进行联络，希望与白朗商量共同讨袁的办法，但是没有实现。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同样提不出明确的革命纲领，无力领导农民进行反袁斗争。

四、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最后破灭

袁世凯以武力镇压白朗起义军和扫除南方几省的反袁势力后，认为由临时大总统变为正式大总统的时机已到。他为了早日作正式总统，在镇压“二次革命”时，非但不驱逐国

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反而宣布要尊重这些议员的权利，其目的是要利用国民党议员选举他当正式大总统。另一方面，袁世凯于一九一三年五月，命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但进步党是由清末立宪派演变而来的，他们拥护袁世凯，梦想制订宪法，走上“宪政轨道”，从而得到一官半职。所以袁世凯对进步党并不放心，于是在九月间，又指使其亲信梁士诒用高价收买一批议员，组成公民党，作为在国会中的打手。这个“公民党”的“第一步政策”，就是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本来照国会选举法与组织法规定，必须先制宪法，后举总统。但袁世凯迫不及待，唆使党徒在国会中提议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同时示意全国十九个省区的“军政长官”，联名发表通电，要求先选总统，后制宪法。公民党也在国会中大肆活动。一九一三年十月六日，北京国会投票选举总统，袁世凯派便衣军警、兵痞、流氓等数千人，号称“公民团”，从早到晚包围议院，强迫议员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否则选举人不能出议院一步。这些国会议员不得不忍饥挨饿，一天内连续投票三次，最后才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第二天，国会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十月十日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英、法、俄、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立即承认并表示一致支持袁世凯政府。

袁世凯作了正式总统，随即向《临时约法》和国会开刀。十月十六日，袁世凯向国会提出增修约法案，他说《临时约法》对总统的权力限制过多，狂妄地表示：“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①要求在宪法制定之前修改《临时约法》，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七十二页。

增加总统的紧急命令权和财政紧急处理权；又授意他在各省的爪牙反对国会制定的《宪法草案》，要求解散国会。

袁世凯为了搞垮国会，借口国民党议员与讨袁军有过联系，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撤销国民党议员资格，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证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十二月，袁世凯召开由各省长官和内阁各部代表及由大总统指定的八人组成的政治会议，以篡夺国会的职权。一九一四年一月，袁世凯根据所谓政治会议的讨论意见，正式下令解散国会，二月，撤销各省议会，停办地方自治，连清政府假立宪时所搞的一套也一笔勾销。

袁世凯在解散国会和地方议会的同时，指使政治会议为他制造一个“改造民国根本法”的造法机关，——约法会议。一九一四年一月下旬，政治会议公布“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规定了约法会议的名称、职权、组织、成员的选派方法，规定了议员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及有利于袁世凯驾驭的条件。三月约法会议正式成立。袁世凯亲临约法会议致词，大肆攻击《临时约法》限制总统的权力，胡说它是“不良之约法”，照它的规定施行，“民国前途，危险不可名状”，因此必须另行制订新约法。约法会议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加紧“造法”。五月一日，废除了《临时约法》，公布了袁记新约法——《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袁记“约法”规定：“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大总统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兵额”，“统率全国陆海军”；“大总统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职官”；“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大总统有权颁布与法律同效力之“教令”。^①军政大权集于总统一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一二五——一三五页。

人，不受任何约束。袁记“约法”又不设国会，以立法院为立法机关，规定在立法院未成立前由袁世凯任命的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的权力。这个参政院为袁世凯制订了一个《总统选举法》，规定：一、总统任期十年，连任无限制；二、现任总统认为“政治上有必要得连任；三、总统继任人应由现任总统推荐，名字写在称作“嘉禾金简”的纸上，藏于密室，选举时才取出。根据这个规定，袁世凯不但可以终身做总统，还可以由他的子孙后代继任。这个《中华民国约法》，是一部彻头彻尾的袁记总统独裁法，以共和国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但是，即使这样一部独裁法，袁世凯也只是把它当作走向帝制的过渡桥梁。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宪法，中国已有过了，……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第四个是冯国璋，第五个是徐世昌，可谓多矣，但是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①袁世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取消了辛亥革命以后所建立的各项民主制度，所剩下的只有中华民国一个空名。就连这个空名他还处心积虑地要去掉，以便登上皇帝的宝座。

第二节 俄、英对我国边疆的侵略和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一、沙俄对我国北部和西部的侵略

辛亥革命前后，沙俄继续疯狂地推行它的扩张计划，抱

^①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九四页。

着“直接占领一直到长城脚下的大片领土，并获得在东北的霸权”^①的狂妄野心，加紧对中国内外蒙古、新疆和东北北部的侵略，妄图把约占中国全部领土百分之四十的土地分裂出去，纳入它的版图。

沙俄首先把魔爪伸向外蒙古，一批批的“俄国商人代表团”、“俄国科学考察团”、“俄国经济调查团”，纷纷窜入外蒙古，搜集情报，策动反动王公贵族叛乱。沙俄收买了反动活佛哲布尊丹巴和以杭达多尔济亲王为头目的一小撮反动王公贵族，想通过他们实现分裂中国的野心。一九一一年七、八月间，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代表团，偷偷摸摸地到彼得堡去，经过同沙皇政府密谋策划后，这个大叛国分子回到库伦便加紧密谋“独立”，沙俄供给大批枪械弹药，并出兵入侵库伦。十一月，俄国军队和外蒙古傀儡武装占领了清朝库伦办事大臣的衙门和电报局、兵备处等地方，办事大臣三多被俄国哥萨克兵强行押解“出境”。十一月二十三日，外蒙古傀儡集团宣布成立所谓“大蒙古国”，以反动活佛哲布尊丹巴为“大蒙古国”皇帝。沙俄立即宣布承认，并于翌年十一月与傀儡政权签订了所谓《俄蒙协约》和《俄蒙商务专条》。“协约”规定：俄国“扶助”外蒙古“自治”，帮助练兵，“不准中国兵队入蒙古边境”；“其他外国人自不得在蒙古享加于俄国人民所享之权利”；蒙古与其他国家订约，“不经俄国政府允许”，不能“违背或变更”这个“协约”及专条内各“条件”。^②沙俄还取得了在外蒙古收税、贸易、采矿、发行纸币等特权，实际上把外蒙古变成了沙俄的殖民地。

① 列宁，《帝国主义笔记》，《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第七六五页。

② 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下卷，第二——三页。

沙俄破坏中国统一，侵占外蒙古的滔天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全国舆论一致主张抵抗沙俄的侵略。居住在北京的蒙古人民和蒙古爱国王公首先起来声讨外蒙古叛乱集团投靠沙俄、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坚决要求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并以“蒙古王公联合会”名义，通告世界各国，决不承认非法的《俄蒙协约》。内蒙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和哲里木盟的爱国王公也纷纷集会，声讨哲布尊丹巴的叛国罪行。孙中山代表全国人民的公意，多次给外蒙古活佛打电报，要他不要投靠沙俄，不要背叛祖国，立即取消“独立”，并谴责沙俄阴谋瓜分中国的罪行，他提出“发奋一战，以胜强俄”。^① 大卖国贼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向俄国侵略者屈服投降，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声明》。接着，根据这个“声明”，中、俄、蒙两国三方代表于一九一四年九月在恰克图开始会谈，一九一五年六月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将“声明”内容进一步予以具体化，规定：“俄国承认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实际上就是承认沙俄在外蒙古的控制地位。由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日，库伦活佛宣布取消独立，袁世凯政府又派出都护使陈箴为驻库伦办事大臣。

当沙皇俄国一手制造外蒙“独立”的时候，又阴谋策划吞并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唐努乌梁海地区，北枕萨彦岭，南临唐努山，面积约十七万平方公里，包括四十六个佐领。在清代分别隶属于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和三音诺颜部、

^① 孙中山：《钱币革命之通电》，《总理全集》，上海民智书局版第三集第十七页。

札萨克图汗部以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而统由库伦办事大臣节制。一七二七年《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界约》明确规定：萨彦岭之“阳面作为中国，阴面作为俄国”。一八六九年《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又重申了上述规定。但是，沙俄侵略者自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不断地侵入这一地区。他们闯入唐努乌梁海任意挖取金沙，掠夺毛皮，广设商站，倾销商品，到辛亥革命时期，俄国商人已在这里“公司林立”，投资额达一百万卢布以上。沙俄侵略者还把这一地区作为军事战略要地来看待。唐努乌梁海的东、北、西三面与沙俄相邻，它象一座前沿堡垒拱卫着西部蒙古和新疆北部地区。沙俄为了扩大侵略，对这个地区极为重视，它的总参谋部不断派遣所谓“探险队”“考察队”前来窥探，二十世纪初叶这种侵略活动尤为频繁，妄图吞并，一九一一年初沙俄《新时报》发表文章，公然叫嚣唐努乌梁海“当属俄境”。但确凿的历史事实，迫使当时沙俄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不得不承认：

“俄国在乌梁海地区并没有法律上的权利”，那末，“我们要占领萨彦岭至唐努乌拉山之间土地的动机”是什么呢？他供认：“仅由我们利益的观点才有采取此种措施的必要。”^①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沙查诺夫的奏折上批道：“从讨论乌梁海地区问题以来，业已三月，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按指辛亥革命），我们更必须积极解决此事，否则我们在中国边界上就得不到什么利益。”他要他的臣子们“回忆我们占领阿穆尔区的历史”。^②那就是要象穆拉维约夫所做的那样，派兵

① 《外交大臣呈沙皇奏》（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见《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七五页。

② 同上书同页注①。

进行实际的占领,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迫使清朝政府承认。随后,沙俄侵略军即纷纷进入唐努乌梁海,实行军事占领。与此同时,俄国向这个地区大批移民,到一九一四年,居住在唐努乌梁海的俄国移民达到一万人左右,而当地居民总共才六万人。一九一四年秋,沙皇军队大批开进唐努乌梁海,正式宣布将唐努乌梁海这块中国领土并入俄国,任命格里哥列夫为乌梁海事务长官。格里哥列夫无耻宣称:“大俄罗斯帝国宣告将唐努乌梁海地方置于它的保护之下。”一九一六年,沙俄侵略者强迫唐努乌梁海各旗、各佐领王公、官吏接受俄国发给他们的印信,缴出中国发给他们的印信。热爱祖国的唐努乌梁海人民对沙俄侵略者进行了愤怒的反抗,但遭到沙俄侵略者的残暴镇压。“所有土人日遭蹂躏,以致海人侧足而立,道路以目。”^①但是,唐努乌梁海人民和爱国的王公官吏并没有就此屈服,他们不断派人到乌苏雅苏台中国官吏那里“报告俄人苛虐情状”,他们“声诉痛苦,并沥陈眷恋祖国之心,呈请援救。”^②然而,当时统治中国的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根本不敢同沙俄帝国主义进行严正的交涉和斗争,因而使中国的六万唐努乌梁海人和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继续处于沙俄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沙俄不仅制造外蒙古“独立”和侵吞唐努乌梁海,还将魔爪伸进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地区。该地区的面积为一万五千多平方公里。一九一二年一月,海拉尔的一小撮反动王公贵族,在俄国驻海拉尔领事、驻军的指挥下发动叛乱,占领海拉尔。

^① 远东外交研究会编:《最近十年之中俄交涉》,哈尔滨国际协报社版,第一五七页。

^② 同上。

二月，俄国侵略军七百多人和外蒙古傀儡武装三百多人侵犯
牯滨府(满洲里)，遭到了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该城失陷后，
俄国侵略者立即策划成立了所谓“呼伦贝尔自治政府”，宣
布“独立”。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袁世凯政府再次屈从沙俄
政府，签订了《中俄呼伦贝尔条约》，将呼伦贝尔划为“特别
区”，置于俄国的控制之下。但是，中国人民坚决不承认这
个卖国条约，呼伦贝尔各阶层爱国人士通电全国，声明：“呼
伦贝尔地方，向为中国完整领土”。一九二〇年一月，呼伦
贝尔终于重新划归黑龙江省。

一九一二年八月，沙俄又在东部内蒙古策动哲里木盟科
尔沁右翼前旗郡王乌泰叛乱。乌泰在他发布的所谓《东蒙古
独立宣言》中供称：“今库伦皇帝派员劝导加盟，俄国供应
武器弹药，给予援助，故宣告独立，同中国断绝关系。”^①这
一“宣言”明白供认出这场叛乱的策动者是沙皇俄国。由于全
国人民的坚决声讨，中央政府派兵进入内蒙古平乱，在当地
人民的积极支持下，迅速平定了叛乱。但俄国侵略者不甘心
失败，又组织雇佣军侵入内蒙古，到处烧杀抢掠。在全国人
民的敦促下，中央政府又出兵讨伐俄、伪匪军，经过长期奋
战，到一九一六年，终于收复了失地。沙俄妄图把版图扩张
到中国长城脚下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沙俄在侵略中国西北和北部边疆的同时，发动了对中国
新疆的侵略。一九一二年夏，它挑起了策勒村事件。

策勒村是新疆南部和田县的一个大镇，大批俄国商人经
常来此贸易，他们凭借“在新疆全境免税贸易”的特权，掠

① 柏原孝久，《蒙古地志》上卷，第一五四四页。

夺榨取，牟取暴利，当地人民备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特务与当地俄商乘机造谣惑众，胡说什么中国内地已经“混乱”，人民生命财产已无保障，煽动当地人民加入俄籍，受沙皇“保护”。当地绝大多数居民热爱祖国，不上圈套。但一小撮民族败类却依靠沙俄侵略势力，在村镇里为非作歹，群众忍无可忍，打死了作恶多端的俄商与歹徒二十余人，给予沙俄强盗及其走狗以应得的惩罚。

策勒村事件发生后，沙俄侵略军按照预定计划分三路侵占了新疆西北部的伊犁、东北的阿尔泰地区和西南的喀什噶尔，并在喀什噶尔收买当地叛国分子马福兴，指使他在南疆成立“独立回教国”，然后进犯天山北路。

富于反帝斗争光荣传统的我国新疆各族人民，对俄国侵略者进行了坚决斗争。南疆各族人民组织起军队，开进喀什噶尔，在强大的人民武装的痛击下，俄国侵略军不得不撤出喀什噶尔，叛国分子马福兴也畏罪潜逃。南疆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

在阿尔泰地区，沙俄侵略军伙同外蒙古伪军，侵占阿尔泰东部。沙俄驻阿尔泰领事收买民族败类帕勒塔，宣布阿尔泰“独立”。一九一三年七月，俄、伪军两次大举侵袭驻扎在察汗通古的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在当地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下粉碎了俄、伪军的进攻。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新疆各族人民奋起打击俄国侵略军，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统统驱逐出境，保卫了我国西北边疆。

二、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和西姆拉会议

一九〇六年四月《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签订后，英国侵略

势力进一步深入西藏，一九〇七年，清政府在西藏开始实行“新政”，遭到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反对，英国利用条约中所取得的特权，竭力进行干涉，并乘机笼络、诱骗达赖十三世叛国。一九一〇年达赖十三世带领一部分西藏地方政府官员逃入印度，由英帝国主义豢养。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驻印度总督供给达赖十三世金钱、枪械，唆使他派遣亲信潜回西藏，策动武装叛乱，阴谋使西藏脱离中国。亲英分子这种背叛祖国的分裂活动，立刻遭到藏族人民和爱国的上层喇嘛、贵族的坚决反对。驻藏的中国中央政府军队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坚决镇压叛匪。一九一二年六月，中央政府命令四川都督进兵平定叛乱。英国政府公然威胁：如果中国中央军队继续前进，英国将不承认中华民国，并将“以实力助藏独立”。同时，又借口“护商”派兵进入拉萨。袁世凯屈服于英帝国主义的壓力，采取了妥协态度。

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解决西藏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但是，英国政府为了扩大侵略，胁迫袁世凯政府同意召开所谓中、藏、英三方面的会议。会议于一九一三年十月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地方召开，亦称西姆拉会议。会议是在英国的把持和操纵下进行的。英帝国主义为了达到扩大侵略的目的，蓄意制造了中国其他部分和西藏地方之间以及所谓内、外藏之间的界线问题（“内藏”、“外藏”是英国代表在会议上强加的名词），扩大西藏范围，并提出了一个不平等条约草案，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进而归属英国的统治。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三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断然拒绝在英国提出的“条约”上签字，并根据中央政府训令正式声

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当时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曾两次照会英国政府，声明中国政府的这种严正立场。此后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这个“条约”，这个所谓“西姆拉条约”完全是非法的。在会议期间，英国代表亨利·麦克马洪还背着中国政府同西藏地方代表在德里秘密换文，捏造了一条所谓划定中印东段边界的“麦克马洪线”，阴谋把历来属于中国的九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入当时的英国殖民地印度的版图，这也是完全非法的。所谓“麦克马洪线”，根本没有上过西姆拉会议的日程，在非法的《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中，也没有说明什么“麦克马洪线”问题，当时中国政府根本不知道有所谓“麦克马洪线”。英国政府偷偷地搞了这条肮脏的、不可见人的“麦克马洪线”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在地图上标记出来。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政府获悉英国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逐步侵入后，曾多次向英国政府、印度政府提出抗议，从不承认什么“麦克马洪线”。西藏地方政府也对这条线表示强烈不满，要求印度政府归还“麦克马洪线”以南历来属于中国的领土。因此，不管任何国家，企图以所谓《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作借口，进而挑起边界事端，实现它们侵占中国领土的扩张主义野心，都是枉费心机的，是永远不能实现的。

三、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山东及其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辛亥革命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一九一二年日本政府与沙俄签订密约，把我国内蒙古分为东、西两部分，两个强盗互相承认了它们在内蒙古东部和内蒙古西部的特殊利益。接着，日本政府又诱胁袁世凯政府通过秘

密换文，确认了《铁路借款修筑豫约办法大纲》，日本攫取了海开（海龙至开原，全长一百二十三哩）、四洮（四平街至洮南，全长二百三十哩）、长洮（长春至洮南，全长一百八十哩）三铁路的借款权和洮热（洮南至承德，全长四百七十哩）、吉海（吉林至海龙，全长一百一十哩）两铁路的借款优先权。通过这个“满蒙五路”计划，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了在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的侵略特权。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又乘机疯狂侵略中国，妄图把整个中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它借口对德、奥、意同盟国集团宣战，派兵在我国山东半岛北面的龙口登陆，强行占领胶济铁路沿线和青岛，取代了德帝国主义在山东的侵略地位，并进而妄图霸占山东以及整个中国。

日本灭亡中国的阴谋是由来已久的。日本特务组织黑龙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就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乘世界大战的时机完全控制中国的罪恶计划。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二十一条分为五大项：

（一）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

（二）旅顺、大连两港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租借期限都延长到九十九年，并承认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及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

（三）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未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

（四）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人；

（五）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

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与九江、南昌，南昌与杭州，南昌与潮州间的铁路的建造权让给日本，日本在福建有投资筑路和开矿的优先权。^①

十分明显，二十一条是要把中国的广大地区和中国政府都直接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把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看到袁世凯想做皇帝，就以支持他当皇帝为诱饵。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对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表示：“改共和为帝制，是中国内政问题，袁大总统可以放心进行。”要陆宗舆把这个意见转达给袁世凯。日本公使日置益把二十一条要求当面递交给袁世凯时直截了当地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袁世凯醉心于黄袍加身，看到大战时期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相对减弱，日本势力迅速扩张，只有取得日本的支持，才可以进行帝制活动，对日置益的话完全心领神会，立即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亲日派汉奸曹汝霖与日本代表秘密谈判。经过几个月的交涉，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袁世凯于五月九日接受了除第五项“容日后商量”外的全部要求。

自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无比激愤，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上海码头工人首先举行罢工、游行，散发传单，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上海各阶层人民成立了“爱国对日同志会”，号召抵制日货，勿忘国耻。其他各地也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湖南长沙日本经营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举行罢工，开展抵制日货的宣传。广大爱国学生和

^① 参见王芸生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九十一——九十五页。

群众也自动组织起来，成立纠察队，查禁、焚烧日货，打击继续贩卖日货的奸商。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召开抗议二十一条的大会，声讨袁贼卖国罪行。袁世凯卖国政府竟然下令严禁抵制日货运动，妄想扑灭已经燃烧起来的群众斗争烈火。广大群众异常愤怒，以更大规模的斗争回击袁世凯。

五月九日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一传出，全国人民更是怒不可遏。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浪潮遍及全国。北京人民集会、游行，参加者达二、三十万人。上海的工人、学生、店员带头节衣缩食，发起捐献爱国储金，准备长期进行抗日斗争。沈阳的示威群众，向几家日本大商店投掷炸弹，严惩凶横的侵略者。厦门和福州人民奋起焚毁日货，拒绝日本人租借房屋、购买粮食和一切日用品。海外爱国华侨也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例如：菲律宾华侨自动组织救亡团、敢死队，捐出巨款作为对日战费，并准备回国参战。由于全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二十一条实际上未能实现。毛主席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得经过那时的卖国头子袁世凯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条约二十一条，不得不宣告无效。”^①

第三节 中外反动派尊孔大合唱 和袁世凯复辟帝制丑剧

一、中外反动派尊孔大合唱

袁世凯为了实现其独裁统治和复辟帝制，一方面对外依

^①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二九页。

靠帝国主义的支持肆意出卖国家主权，对内消灭反抗力量残酷镇压革命人民和民主势力；另一方面，在思想战线上大造复辟舆论，大搞尊孔活动。而中外反动派为了自身的利益，适应反对革命和复辟帝制的需要，共同利用守旧、倒退、卖国的孔道，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

还在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袁世凯窃夺政权之初，即叫嚣要“整饬”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纪纲”。^①接着于九月二十日，他通令全体国民要尊崇孔孟之道的伦常说：“本大总统深惟中华立国，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人伦通德之原，初无歧果。”胡说抛弃三纲五常，建立新的革命秩序，就是“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必为人类所不容”。^②袁世凯倡之于上，喽囉们和之于下。流亡海外的保皇党头目在这年夏天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说：“今在内地，欲治人心，定风俗，必宜偏立孔教会。”^③康有为的门徒清末进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陈焕章，马上纠集沈曾植、梁鼎芬等孤臣孽子于十月间在上海发起组织孔教会。孔教会的宗旨是：“昌明孔教，救济社会”，“挽救人心，维持国运”。也就是利用孔孟之道，反对革命，复辟帝制，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国运”。孔教会很快得到袁世凯批准立案，并聘陈焕章为总统府顾问。也博得驻军于兖州、徐州一带头上拖着长辫子的复辟头目张勋等军阀官僚的赞同和支持。一九一三年发行《孔教会杂志》，九月在山东曲阜召开第

① 参见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三十八页。

② 袁世凯：《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二，第十七—十八页。

③ 康有为：《中华教国论》，《康南海文钞》卷一，第二十一页。

一次全国孔教大会，会后孔教总会由上海迁往北京，推康有为任总会会长，陈焕章为主任干事。继孔教会之后，各地不同名称的尊孔会社纷纷出现，什么孔道会、尊孔会、孔圣会、宗圣会、尊孔社等等，而一九一三年在曲阜成立的孔道会和青岛成立的尊孔文社，是比较有影响的两个。这些参加尊孔会社的封建余孽经常聚集一起，搞什么谈话会、聚餐会，饮酒赋诗，发泄对辛亥革命的刻骨仇恨，他们象曾国藩一样，惊呼革命措施和废止孔教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变”。康有为还办了《不忍杂志》，在“序言”中一口气讲了十个“不能忍”，什么“痛人心之陨落，吾不能忍也”，“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嗟纲纪之亡绝，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等等，胡说要以孔教“为人心风俗之本，言奉以为法，行奉以为则”，否则就是“陷于洪水猛兽”。^①康有为甚至对人们不向孔老二跪拜也大为恼火，说什么“不拜教主之孔子，……试问留此膝盖何为乎？”^②嚣张到了极点！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③当中国反动派狂叫尊孔复古的时候，帝国主义分子也展开了尊孔活动。外国侵略者早就看中了有利于它们侵略的孔学。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分子特别是那些洋教士极力鼓吹尊孔，胡说什么洋教与孔教本来是“同条而共贯”^④的，他们寻找洋教与孔教所谓共通的“理”，借以更

① 康有为，《覆教育部书》，《康南海文钞》第七册《书牍》第二页。

② 康有为，《中国颇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同上书第三册，第四十四页。

③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五五页。

④ 花之安，《自西徂东序》。

有效地愚弄奴役中国人民。在辛亥革命后尊孔黑浪中，这些侵略分子更积极地参加孔教会和尊孔活动。文化侵略机构尚贤堂经理美国人李佳白、袁世凯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英国租借地威海卫殖民官员后来担任废帝溥仪英文教师的庄士敦、德国同善会教士尉礼贤等都列籍孔教会。他们写文章，发演说，拼命吹捧孔老二。庄士敦说：“中国苟停止而不崇敬孔子，或停止而不诵习孔教之奇伟经典，则其为中国之祸害，必有非常可惊者。”^①没有列籍孔教会的沙俄文化特务盖沙令这时也窜来中国，说什么孔教会就是“意味着权威”，“孔教之精义，将必永为中国之中心，其长久也，殆与国运相终始”，并胡说推倒孔教，“中国将无进步之日。”^②李佳白更直截了当地把孔教与政治联系起来，说：“今欲改良政治，必须尊崇孔教。……至君主民主，不过名目之分，无关宏旨，不论可也。”^③这个“君主民主”“无关宏旨”的用意就是提醒人们尊孔是为了复辟帝制。“改良政治”就是复辟帝制的同义语。

既然尊孔与“改良政治”密切攸关，掀起定孔教为国教的叫嚣就是必然的了。康有为说：“中国数千年来奉为国教者孔子也”^④。陈焕章说：“孔教乃中国之国教也”^⑤。一九一三年八月，陈焕章、梁启超等以孔教会名义向参众两院提出

① 庄士敦：《与孔教会书》，见《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第七页。

② 盖沙令：《孔教乃中国之基础》，见《民国经世文编》第三十九册，第二十一页。

③ 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第一——三页。

④ 康有为：《孔教会序》，《康南海文钞》第五册，第十二页。

⑤ 陈焕章：《明定原有之国教为国教并不碍于信教自由之新名词》，见《民国经世文编》第三十九册，第十五页。

请愿书，“请定孔教为国教”，载入“宪法”。妄图将孔孟之道变成法定的绳索束缚人民的革命行动。请愿书胡说中国的“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此皆孔子为国教主之由来也。”^①“国教案”不仅博得北洋政府军阀、官僚的赞扬，也得到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捧场。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有贺长雄写了《宪法须规定明文以孔教为国家风教之大本》^②，说什么定孔教为国教“与立宪政体，未尝相戾”，大力鼓吹中国必须以孔教为国教。早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英人卫西琴就在英文京报上发表《以儒教为国教》的文章。另一英国人麦禅也发表过《论中国当以孔教为国教》^③。一时以孔教为国教的毒焰甚嚣尘上。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一九一三年的《天坛宪法草案》未敢定孔教为国教，但还是写上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一语。

袁世凯在中外反动派尊孔大合唱声中，也在加紧搞尊孔活动，借助孔老二的幽灵实现独裁统治和复辟帝制的迷梦。他继《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之后，于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发了《通令尊崇孔圣文》，胡诌孔道是“反之人心而安，放之四海而准”。当时正是白朗起义蓬勃发展 and 即将爆发“二次革命”，“通令”胡说这种情况是“波邪充塞，法守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是违背孔教“古义”的。^④这个“通令”显然是借孔老二的黑旗镇压人民起义和民

① 陈焕章等，《孔教会请愿书》，见《民国经世文编》第三十九册，第四十八—四十九页。

② 见《民国经世文编》第三十九册，第三十五—三十七页。

③ 见《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

④ 见《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二，第五十一页。

主力量的反革命檄文。同年十月，袁世凯就正式大总统职时，又借孔老二的黑旗制造卖国有理和毁弃《临时约法》实现独裁的舆论。他说他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就是实行孔老二的“民无信不立”的“信”，含沙射影地骂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是“毁弃一切”，是“越礼犯义”，袁世凯要人民“奉公守法”，也就是要恢复旧的“一切”，纳人们于“礼义”的轨范之中，服从他的反动统治。^①

接着，袁世凯逐步恢复了清朝皇帝的祀孔祭天典礼。一九一四年二月七日袁世凯宣布：春秋两丁为祭孔之日，仍从大祀，其礼节、服制、祭品与祭天一律。京师文庙应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文庙由地方长官主祭，等等。这时，袁世凯正在炮制袁记“约法”毁弃《临时约法》。五月一日公布袁记“约法”之后，袁世凯俨然象皇帝一样于九月二十八日亲率百官举行祀孔典礼了，他发布的祭孔告令，再一次向革命进攻，说辛亥革命“误解平等自由，踰越范围，……纲常沦弃，……几成土匪禽兽之国”，重申“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②十二月二十三日，袁世凯亲临天坛祭天。一九一五年二月公布《教育纲要》，完全恢复读经，要青年学生“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到这时，袁世凯借孔老二幽灵复辟帝制的野心暴露无遗了。孙中山揭露袁世凯尊孔的阴谋说：“盖自以帝业之成，而天下莫予毒矣，卒以非法攘攫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③

然而，清朝遗老们的借尊孔以复辟帝制的目的与袁世凯

① 参见《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书》，同上书卷首，第六——十页。

② 见《历代尊孔记》第二十六页。

③ 孙中山：《讨袁檄文》，《总理全集》上海民智书局版，第二集第十六页。

是不同的。袁世凯尊孔是为自己爬上皇帝宝座造舆论，遗老们则是为了复辟清朝的帝制。他们一面勾结，一面争夺。当时有个尊孔复辟死硬派劳乃宣，辛亥革命后窜到青岛主持尊孔文社，他的一切尊孔活动都是为了清室重登帝位。还在一九一一年他作《共和正解》，为维护清朝统治效劳。辛亥革命后尊孔复古声浪中又作《续共和正解》、《君主民主评议》，^①喋喋不休地反复说明周召共和故事，说什么共和的真正含义，应该是维护清朝的统治，溥仪年初，为了大权不致旁落，袁世凯应象周召一样的暂时执政，十年之后宣统皇帝满十八岁，即当还政于清帝。劳乃宣劝告袁世凯，还政于清室，清帝锡以王位，可以世代传下去，“总统无传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荣，后世子孙胜于总统何啻倍蓰。”^②这当然是急于称帝的袁世凯不能容忍的，他对于坚决拥清复辟派康有为、劳乃宣之流，施加压力，对于那些不那么坚决的人则百般拉拢，使为自己的帝制复辟效劳。后来在袁世凯称帝的“劝进”人中就有不少是拥清复辟的遗老遗少。

不论是袁氏复辟派还是拥清复辟派，他们虽在谁当皇帝这一点上同床异梦，但坚决反对革命，坚决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则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资产阶级民主派一些人，在尊孔复古逆流中，敏锐地感觉到：“尊孔必尊君”，“欲恢复帝制，故借尊孔之名”。他们不少人对当时的尊孔派进行批判，如章太炎于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发表《驳建立孔教议》，直斥孔教会为“怪妄”。他这

^① 以上三篇毒草均见《桐乡劳先生遗稿》卷一。

^② 劳乃宣，《致赵次珊书》，同上书卷四，第五十五页。

时在北京讲学的寓所门前帖有“凡入孔教会者不准入会”字样，除讲学外，“专以骂康有为、陈焕章为事”。^①有的人骂尊孔派是“口仁义而心盗贼，……倡尊孔愈甚，修行愈恶”^②。但是总的说来，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派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同他们的政治上的软弱性妥协性是一样的，对尊孔思潮的批判是无力的。

二、袁世凯的帝制丑剧

鲁迅说：“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袁世凯在尊孔祭孔的紧锣密鼓声中，并在他得到德、英、美等帝国主义对他称帝的认可，特别是承认二十一条取得日本支持后，就加紧复辟帝制的活动。袁世凯撤销了内阁总理制的国务院，在总统府下设立办事机构“政事堂”，起用清朝老官僚他的亲信徐世昌为国务卿，又设立权力类似清朝军机处的海陆军大元帅办事处，并逐一恢复封建帝制时代的官名官阶。为了使他的儿子袁克定继承帝位，袁世凯策划组织了“御林军”——模范团，自任团长，袁克定为副团长，军官都是与袁克定有关系的人，以培植死党。模范团成员要宣誓忠于袁氏父子。这个模范团是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打手。

同时，袁世凯除抬出政治僵尸孔老二作为复辟的敲门砖外，又直接制造“中国只适宜于君主制”的谬论。一九一五年

① 黄远生，《记太炎》，《远生遗著》第三卷，第二二五页。

② 秋桐，《孔教》，《甲寅杂志》一卷四期。

③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八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公然污蔑中国人民知识程度太低，只适合于君主制，不适合于共和制。袁世凯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写了一本小册子《共和宪法持久策》，也污蔑中国人民不适于共和政体，鼓吹必须恢复帝制。在《共和与君主论》发表不到一星期，袁世凯的党徒杨度等以“筹一国之治安”的名义组织了筹安会，以研究“共和政治得失”为名，大肆鼓吹帝制。有人要求解散筹安会，袁世凯借口“学者舆论自由研究”^①，百般加以庇护。一时全国被搞得乌烟瘴气，帝制之说甚嚣尘上。

袁世凯造了反革命舆论，还要盗用“民意”来达到他做皇帝的目的。他示意喽囉们：“变更国体”，要取决于“国民公意”。于是，各省袁派官僚、军阀纷纷派代表到北京请愿，要求改民主政体为君主政体。形形色色的“民间请愿团”也纷纷出笼，买办官僚梁士诒等乘机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以进一步策划帝制活动。十月初，在请愿联合会的催促下，参议院“议决”以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是否改行君主政体，进行荒谬的所谓选举和国体投票。袁世凯的亲信操纵选举，在短短的十几天内，各省的所谓代表都已选出，接着又在当地举行“国体”投票。十一月中各省投票结果，全部同意改行君主政体，每张票都附有“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的推戴书，并委托参议院为总代表，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十二月十一日，参议院向袁世凯上书劝进，袁世凯表示“谦让”。参议院于当天再次集会，决定二次劝进，当晚再上推戴书，第二天，袁世凯接受推戴书。他无耻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二四〇页。

地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①不久，宣布将中华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积极布置正式登极的丑剧。

毛主席说：“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②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人民决不容许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复辟。正当袁世凯妄想逆历史潮流而动，踌躇满志，大做皇帝梦的时候，反袁怒涛四起，这个独夫民贼的末日也就临头了。

三、护国运动

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卖国活动，早已激起全国人民的不断反抗。现在他公然复辟帝制，使一些原来对他抱有幻想的人，也看出他破坏共和、复辟帝制的野心，起而反袁。袁世凯陷入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之中。

国民党被袁世凯非法解散以后，孙中山鉴于妥协之失策，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在日本另行组织中华革命党，声明“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③准备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但中华革命党仍提不出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政纲，与广大人民更缺乏联系，实际上是一个狭隘的秘密团体。袁世凯称帝时，中华革命党坚决反对，可是没有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只是在各地组织暴动，进行暗杀，以致不断失败。中华革命党并没有把全国的反袁力量领导起来。

以黄兴为首的另一部分国民党人组织欧事研究会。在反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二八五页。

②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九六页。

③ 《中华革命党总章》，见《总理全集》上海民智书局版，第四集，《遗墨》第一辑，第三十一页。

对二十一条时，这个会主张停止反袁斗争，一致对外。袁世凯称帝时，他们又联络原来的国民党议员和进步党，进行反袁活动。由于他们在反袁问题上出尔反尔，没有固定的政治方向，在群众中影响不大。

进步党本来是袁世凯的追随者。在帝制活动开始进行时，进步党的成员们还希望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梁启超就公开要求过袁世凯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可是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行遭到广大群众激烈反对，快要出现一个“全国鼎沸”的局面时，这批投机政客们在日本支持下就抢先一步把反袁斗争的领导权抓在自己手里。接近进步党的军人蔡锷与梁启超等密商后，到云南联络各派反袁势力，组成护国军，大捞政治资本。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辛亥革命时曾一度任云南都督，后被袁世凯诱骗到北京软禁，这时他潜回云南发动讨袁。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宣布独立。护国军由蔡锷、戴戡、李烈钧分统，分三路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兵。云南都督唐继尧任留守。贵州、广西相继宣布独立。

日本帝国主义原来是想利用袁世凯这条走狗的。但当中国国内反袁的声势高涨时，又打算抛弃袁世凯，另行寻找新的工具。云南宣布独立后，日本拒绝已经商定的袁世凯的特使去日本访问。英国虽曾支持袁世凯称帝，但后来态度并不积极。同时，袁世凯的亲信、北洋军两员主要将领冯国璋、段祺瑞本来都想继承总统位置，这时见到他实行帝制，也表现了消极态度。袁世凯受到全国人民一致声讨的压力，又感到他的主子和得力爪牙都不可靠，乃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宣布撤销帝制，改政事堂为国务院，任命徐世昌为国

务卿，段祺瑞为参谋总长。袁世凯八十二天的皇帝梦，就这样可耻的收场了。可是袁世凯仍希望依靠他的北洋军队，保持总统权位。这同样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护国军坚持要袁下台，并联合滇、黔、两广等各省反袁势力，于五月八日成立以唐继尧、岑春煊为首的军务院，以与袁世凯政权相对立；冯国璋、段祺瑞等也各有打算，冯国璋几次电告袁世凯不宜再当总统，段祺瑞想乘机要挟袁世凯交出更多的权力。五月，袁世凯解除徐世昌国务卿职务，任命拥有实力的段祺瑞为国务卿，并恢复责任内阁制。这时全国反袁斗争更形扩大，袁世凯的忠实走狗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芑铭，也迫于形势通电宣布独立。六月初，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卖国贼袁世凯环顾四周，众叛亲离，洋人主子弃己如敝屣，气急败坏，一病不起，最后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①一切逆历史潮流而行的反动派，不管他们如何猖獗一时，到头来总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受到历史的惩罚。

第四节 军阀纷争和护法战争

一、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纷争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失去了统治中国的共同工具，都各自寻找和培养自己得力的走狗，扩张侵略势力。在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下，中国出现了各派军阀割据和互相火併

^①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九五页。

的局面。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①

在北洋军阀系统中，存在着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两个主要派别。袁世凯死后，两派的分裂逐渐表面化。皖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势力日渐扩张，盘据北京政府，控制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直系的主要地盘有江苏、江西、湖北三省，占据长江流域的富庶地区，得到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在东北，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于护国战争时，乘机驱逐袁世凯在奉天的势力，以后又逐渐在吉林、黑龙江两省扩展地盘，它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下，成为直、皖两系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此外，山西的阎锡山、徐州一带的张勋等较小的军阀，割据着一个省或者几十个县的地盘，虽不是北洋军阀的嫡系，但都与北洋军阀有联系。当时，全国除南方六省外，几乎都直接、间接地处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

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等省，也由各派军阀统治着。其中最大的军阀势力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滇系军阀占据云南、贵州两省地方，护国战争时乘机向四川扩张势力，与四川军阀发生冲突。桂系军阀在护国战争时，驱逐了广东军阀龙济光，占据了两广的地盘。滇、桂两系军阀都接近北方的直系，附属于亲英、

^①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四十九页。

美势力。

各派军阀占据大小不等的地盘，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而充当走狗，都是大地主、大买办和一切反动势力的代表。不少军阀同时又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皖系军阀段祺瑞除占有大片土地外，又是龙烟煤铁矿公司和几个机器煤矿的大股东。直系军阀冯国璋在直隶夹山、遵化、兴隆沟拥有金矿三处，在苏北与张謇合办盐垦公司占地达七十五万亩。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东北霸占土地一百五十万亩，还垄断那里的煤矿。阎锡山在山西霸占大量土地，又筹设晋华纱厂，财产达三千万元之多。其他大小军阀也有类似的情况。大小军阀在各自的主子帝国主义支持下，使中国长期陷入了军阀混战和分裂割据的局面，给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南方护国军方面，撤销了军务院。南北双方暂告统一。但在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二系则展开了权力的争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急于在中国建立独裁政权。总统黎元洪和副总统冯国璋在英、美两国支持下极力同皖系军阀对抗。一九一七年二月，直、皖两系在中国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发生了尖锐斗争。段祺瑞企图以参战的名义得到日本的借款，扩大皖系势力，积极主张参战。美国为了抵制日本同皖系军阀的勾结，示意中国毋须对德宣战。黎元洪、冯国璋等依照美国主子的意图，都反对参战。这就发生了黎元洪的总统府和段祺瑞的国务院之间的所谓“府院之争”。

三月三日，段祺瑞主持的内阁会议通过了对德绝交案。

黎元洪以国会未通过为借口，拒绝在电稿上签署。段祺瑞愤而离京去天津，进行要挟。黎元洪只好对段妥协，表示不干涉政府的对德外交，黎、段关系暂时缓和。三月十四日，国会通过对德绝交案。绝交以后是参战问题。段祺瑞为顺利达到对德参战的目的，便照抄袁世凯的老办法，想利用一下军阀的力量，于四月二十五日在北京成立督军团。各督军和代表二十余人按照段祺瑞的意图强烈要求参战。五月十日国会讨论“宣战案”，院外聚集了各种名目的请愿团：海陆军人请愿团、五族公民请愿团、政商学界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等等，强行要求通过参战案。这些所谓请愿团的人，是段祺瑞雇来的，雇价由七、八枚铜元到半元银元不等。他们手执小旗，散发传单，并“凶殴议员，劫持议会”。激起了议员们的愤怒，宣布停止开会，议决参战案待新阁组成再讨论；而非皖系的内阁阁员，也相继辞职。段祺瑞恼羞成怒，唆使督军团呈请总统解散国会。至此，为英美和国会所支持的黎元洪，与以日本和督军团为后援的段祺瑞之间的政争，益形紧张。这时，段祺瑞向日本借款一亿日元，允许日本控制中国兵工厂和训练中国军队的消息被揭露，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黎元洪就乘此机会，在英、美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等亲英、美势力的支持下，于五月二十三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以伍廷芳代理。段祺瑞则到天津积极策划把黎元洪赶下台，唆使皖系军阀和奉系军阀通电反对黎元洪，并宣布独立，扬言要进军北京。段祺瑞乘机于六月间在天津组织“独立各省总参谋处”，以与北京的黎元洪相对抗。黎元洪不得已乃求救于自成一派的辫子军头子张勋到北京出面“调停”。这就演出了一幕“张勋复辟”的丑剧。

二、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就是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日，以张勋为首的复辟派拥废帝溥仪恢复清朝帝制的一幕丑剧。这幕丑剧不是偶然发生的，是有一个比较长时间酝酿策划过程的。

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清皇室根据所谓“优待条件”，在紫禁城故宫里还继续保存着清朝的体制，维持着一个小朝廷。在小朝廷的内外聚集着一批复辟分子，从事复辟清朝帝制的活动。这批复辟分子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第一是以张勋、升允为代表的武装复辟势力。张勋是清末江南提督。辛亥革命后仍坚决拥清，他所统率的定武军都还留着一条辫子，人们称它为“辫子军”，称张勋为“辫帅”，盘据在兖州、徐州一带。升允在清末任陕甘总督，辛亥革命时曾率领一支反革命武装向陕西革命军反扑。失败后逃到东北，勾结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一支满蒙王公反动武装，与人民为敌。第二，以溥伟、善耆为代表的清室王公贵族复辟势力。溥伟、善耆是清朝的亲王，辛亥革命中是坚决反对共和反对清帝退位的死硬派。辛亥革命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庇护下分别逃往青岛和大连，他们的住处成为复辟分子活动的巢穴，他们依靠满蒙王公贵族在东北一带从事复辟活动。第三，以劳乃宣为代表清朝遗老的复辟势力。这批人担任过清朝中央和地方的要职，他们既是官僚又是封建文人。另外，还有大家所熟知的康有为，是拥清复辟的死硬派，是张勋复辟集团的主将，人们把他与张勋并列，分别称为“文圣”“武圣”。遗老们康有为等是复辟舆论的主要制造者，是尊孔复古逆流中的重要骨干。他们鼓吹尊孔读经、祭天祀孔，提倡旧道德、旧礼教，他们搞聚餐会，结诗社，互通声气。一

九一二年六月，寓居上海的清朝遗老，在愚园召开一次规模较大的聚会，许多遗老纷纷从各地赶到上海参加。一九一四年三月避居青岛的遗老，还召集一次“十老会”，到会的遗老们互相激励垂死挣扎的勇气。他们在酒会上、诗社里，不断发生拥清复辟的反革命叫嚣。

张勋复辟，是得到德、日帝国主义特别是德国的支持的。一九一二年秋，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来中国“访问”，在青岛与溥伟等人往来频繁，他向溥伟表示德国“将竭力支持清朝的复辟”。第二年德国文化特务卫礼贤伙同在青岛的劳乃宣等创尊孔文社，制造复辟舆论，进行复辟活动。一九一七年五月，北洋政府对德绝交后，德国为了抵制美、日把中国拉到协约国方面参战，和维护它在山东的利益，更加强对张勋的支持。张勋在公开复辟前与德侵略分子司格礼达成协议：德国承认复辟政府后，“首宜开复中、德国交”。德国接济张勋大量武器弹药。日本在一九一三年支持善耆、升允在东北阴谋叛乱，妄图成立他们所操纵的“独立国”。一九一六年日本大隈内阁通过大财阀大仓喜八郎，向善耆、溥伟、升允等提供一百万日元经费，并供应军火，武装满蒙王公反革命军队。同时，日本侵略分子不断与张勋联系，策划复辟。

张勋复辟集团曾于一九一三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时，和一九一六年护国战争中，两次策划过武装复辟的试探，都失败了。为了部署复辟力量，张勋于一九一六年六月邀集北方各省代表到徐州开会，自任主席，向会议提出纲要十项，虽未标明复辟问题，但第一项就是“尊重优待前清皇室各项条件”，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一种复辟的说法。张勋作了“实无其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自供。九月再次集会，即

通过了复辟的步骤，出现了“十三省区联合会”的组织，各地军阀虽各有打算，但张勋的复辟阴谋基本上得到了他们不同程度的默认，张勋并取得这个“联合会”“盟主”的地位。张勋复辟只待时机了。一九一七年六月黎元洪请张勋调停他同段祺瑞的关系时，日本侵略分子佃信夫在段祺瑞和张勋之间进行撮合，段祺瑞表示支持张勋复辟。段祺瑞的真正目的是想借张勋驱逐黎元洪，为自己造成东山再起的机会；对张勋所要求的复辟条件，作了“只须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①含混而非正面的“允诺”。张勋认为复辟的时机已到，以十三省区联合会“盟主”身分，带五千名“辫子军”北上，途中通电威胁黎元洪解散国会，一到北京，即逼令黎元洪去职。这时康有为带了他上海早已草拟好的伪诏十数道，匆匆赶到北京，与张勋密谋复辟的对策。七月一日张勋拥溥仪复辟，恢复清朝旧制，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大肆封官授爵，复辟派的核心人物，都被任命为政务大臣、尚书、侍郎等职，张勋当了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康有为当了弼德院副院长，那个主张效法周召共和故事的劳乃宣，也授予了法部尚书的头衔。这些官员就是把已丢弃的政治垃圾装扮起来粉墨登场的。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已经被弃置的清朝袍褂，成了畅销货，每套由三十元涨到一百二十元，被那些“新贵”抢购一空；在做戏装道具的商店里，遗老们纷纷去央求用马尾给他们做假辫子。这些穿着清朝袍褂拖着假长辫的遗老，一个个像从棺材里爬出来的。

“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②张勋的倒行逆施，立即

^① 张勋通电，见《复辟始末记》。

^②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九六——六九七页。

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声讨。例如：长沙在七月三日就召开拥护共和、反对复辟的万人大会，会上有人断指血书“护法讨贼”四字；上海资产阶级也悬挂五色共和旗三天，以示反对；北京一部分报刊在复辟那天停刊，表示抗议。孙中山得知张勋拥清废帝复辟的消息，立即在上海会同各方面代表决议一致声讨。

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对张勋复辟集团与德国紧密勾结极为疑忌，于是要段祺瑞转过身来讨伐张勋，并资助段一百万日元。段祺瑞见到驱逐黎元洪，打击直系反参战势力的目的已达，就在全国人民一致声讨张勋复辟罪行的形势下，立即与冯国璋联合宣布张勋八大罪状，组织讨逆军。段祺瑞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率军入京。张勋彻底战败，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复辟仅十一天即被扑灭。张勋、康有为等企图抬出清王朝僵尸继续统治的梦想，很快地被粉碎了。这是一切妄想挡住历史车轮前进的反动派的必然的可耻下场。段祺瑞又一次以国务总理的名义把持中央政府大权，亲日派势力大为扩张。黎元洪辞职，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但他的实际权力远不及段祺瑞。

八月，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美国这时已参加大战，愿意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暂时妥协，美国国务卿兰辛与日本大使石井于十一月签订协定，这个被称为《兰辛石井协定》规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日本再次承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给了日本独占中国的有利机会。段祺瑞政府在参战后，以“参战”为名，向日本进行大宗借款，组成所谓“参战军”，扩充皖系势力。在借款中，日本政府派西原龟三办理，段祺瑞政府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经办。

这笔被称为“西原借款”的黑帐，至今尚未查清，有人估计，段祺瑞在这一时期向日本所借的款项，总数在五亿日元左右，而所谓“西原借款”是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占总借款的一部分。段祺瑞为了取得这些借款，放手卖国，他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将东北的吉长铁路、吉会铁路及所谓满蒙五铁路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金矿、森林抵押给日本。日本并派遣军官为段祺瑞训练军队，掌握了对“参战军”的指挥权。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以后，段祺瑞政府又与日本订立反苏的军事协定，允许日本在中国驻兵，在作战时，两国军队须互相“合作”，实际上使日本得以指挥中国军队。日本帝国主义梦想通过段祺瑞政府实现它独霸中国的野心。

三、护法战争和军阀的激烈争夺

当张勋复辟、解散国会的时候，孙中山就发出了维护《临时约法》的号召。段祺瑞赶走张勋后，孙中山又致电段祺瑞，劝他恢复《临时约法》，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但是，段祺瑞等声言民国已为张勋复辟所破坏，主张另行成立临时参议院，目的在抛弃旧国会和《临时约法》。这时孙中山认识到在段祺瑞等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中华民国仍然徒有其名，因而提出要打倒假共和、建立真共和的主张，号召拥护《临时约法》，恢复旧国会。一九一七年七月，孙中山到广州，揭起护法的旗帜。海军部分将领在中华革命党的影响下，发表“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宣言，率第一舰队南下护法。部分国会议员也相继到达广州。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滇系军阀唐继尧也想利用孙中山的名义对抗段祺瑞，附和护法。八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在广州的议员开会，因不足法定人数，故称非

常国会。非常国会议决组织护法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九月一日，开会选举，到会议员选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十日建立了与北京段祺瑞政府相对立的南方政权护法军军政府。

护法战争开始后，段祺瑞政府主张“武力统一”，决定向南方各省用兵，十月，命令直系军队进入湖南与护法军作战。他认为这样做既可以借直系军阀力量消灭护法军，又可以利用护法军削弱异己势力，阴谋消耗双方兵力，坐收渔人之利。而冯国璋则打算与南方军阀相勾结，挤出段祺瑞的皖系势力，夺取中央政府权力。于是冯国璋提出与“武力统一”对立的“和平统一”的口号。在冯国璋指示下，进入湖南的直系军队消极怠战，不替段祺瑞卖力。直隶、江苏、湖北、江西等省的直系督军又联合通电，主张与护法军军政府和平解决，迫使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但段祺瑞贼心不死，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指使其爪牙徐树铮联合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进关，对冯国璋进行武力威胁，一九一八年三月，又唆使皖系督军团通电要求段祺瑞复职，冯国璋再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皖系军阀又大肆叫嚣“武力统一”，并压迫直系军阀对南方作战，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在湖南打了胜仗，攻占了长沙，段祺瑞马上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以扩大皖系地盘，曹、吴对此极为不满，就按兵不动，六月，吴佩孚通电主张和平，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南方护法军政府也发表通电赞成和平。在直系与南方军阀联合反对下，八月下旬，段祺瑞被迫停止进攻，“武力统一”宣告失败。

段祺瑞“武力统一”失败后，决心消灭异己势力，决定首先打击直系。九月间，正是总统任期将满应当改选的时候，

段祺瑞为了挤掉冯国璋为首在中央政府的直系势力，事先作了操纵选举的准备。在新国会选举时，段祺瑞从日本借款中拨出八十万元巨款，由徐树铮出面，收买喽囉，在北京安福胡同组织了“安福俱乐部”，被称为安福系。在新国会选举时，徐树铮密电皖系军阀，要求他们支持选举安福系的人。由于安福系对选举的操纵，结果四百多名议员中，安福系占了三百八十余名。以安福系为主的国会，本可以把段祺瑞捧上总统的宝座，但由于全国人民对段卖国罪行的强烈反对，以及他同西南军阀直系军阀的对立，“国会”产生不出段祺瑞其人当总统。而皖系控制的国会，冯国璋当然不能当选。结果被历来在北洋军阀集团中处于清客地位的老官僚徐世昌，获得了大总统的职位。冯、段二人同时去职。

冯、段二人同时去职，并没有使直、皖二系的矛盾缓和，相反的是日益尖锐。曹锟、吴佩孚与南方军阀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进一步取得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成为直系军阀的新首领，继续与皖系军阀相对抗，直、皖战争在酝酿中。

在亲英、美的直系军阀与亲日的皖系军阀明争暗斗时，南方护法军政府中的亲英、美势力也大肆活动。他们认为，阻挠南方军阀和直系军阀妥协的唯一障碍，就是坚持护法的孙中山。孙中山在领导护法军政府时，除了拥护他的一部分海军外，便没有其他的武装力量，军政府所在地的广州的主要兵力，操在桂系军阀陆荣廷手中，孙中山不但不能调动他们，还不时遭到他们的袭击。一九一八年二月孙中山领导的海军将领程璧光被刺死，表明孙中山这一点点海军力量都为军阀所不容。而非国会的议员们，同北方新国会议员一样，也是求靠于军阀的政客，他们是借“护法”来升官发财的。

他们接受了军阀的指使，提议改组军政府，借以排斥孙中山，把大元帅制改为总裁会议制，以削弱孙中山的权力。孙中山在滇、桂两系军阀、政客的排挤下，一九一八年五月，辞去大元帅职务，护法军政府改组，废元帅制，改为总裁制。孙中山与陆荣廷、唐继尧、伍廷芳、唐绍仪、岑春煊、林葆铎等七人被推为总裁，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既没有实权，又不能实现护法的主张，只好离开广州到上海。护法运动遭到了彻底失败。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在反抗北洋军阀的统治这一点上，博得了人民一定的同情。但是，护法运动仍然没有动员和组织人民，只是依靠一些地方军阀势力，它的具体目标又局限于恢复旧国会和《临时约法》，而当时人民所迫切需要的是彻底打倒军阀统治，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因此，护法运动在人民中没有什么号召力，当然不可能取得胜利。孙中山后来痛切地说：在军政府中“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讎所快，终至于解职以去。”^①他从多次挫折中认识到南北军阀是“一丘之貉”。一九一九年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企图有所振作，但结果同样是毫无起色，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南方护法军政府改组，孙中山去职和北方的冯、段去职以及徐世昌继任大总统，是护法运动结束的标帜，同时也是南北议和的前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美、英等国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显著增强，力谋抵制。一九一八年六月，美国向英、法、日三国提议，联合组织四国银行团，共同对华投资，

^① 《复港商陈珪如函》，《总理全集》上海民智书局版，第三集，《函札》第三一一页。

包揽贷款，以打破日本在对华贷款上的优势。在美、英、法三国压力下，日本被迫宣布停止对段祺瑞政府单独贷款，九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致徐世昌就任总统的贺电中，即要他与南方议和，接着美国联合英、法向北京政府和南方护法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们停战议和。日本在这种情况下，也同意南北议和。十一月南北双方宣布停战。一九一九年二月，南北开始在上海举行议和会议，议和过程中，在停战范围实际上是划分地盘等问题上，往返争吵，到四月双方因恢复旧国会问题，争执无结果而散。一九二〇年六月，议和重开。不久，直、皖战争爆发，西南军阀内部也发生粤、桂战争，南北议和无形消灭。军阀们在他们各自主子的指使下，进一步陷入狗咬狗的混战中。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愈益深重，社会矛盾愈益尖锐了。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处在上述形势面前，毫无作为，他们仍然提不出反帝反封建和打倒军阀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历史证明，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前进一步了。

第五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酝酿

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给封建制度以一定的冲击，提高了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刺激了资产阶级投资工业的热情。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摆脱了辛亥革命前夕的萧条状态，又开始了新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德、法、俄都忙于相互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外国资本和商品的输入都大为减少，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一个有利的时机。加之，这一时期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对近代工业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使民族工业有了一个较为广大的市场。同时，群众性的反帝斗争，特别是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而掀起的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由于上述的这些原因，中国资本主义在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到一九一一年间的四、五十年间，投资在一万元以上的厂矿约七百个，资本共一亿三千余万元。而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八年间，建成厂矿四百七十余个，投资近九千五百万元，加上原有企业的增资扩建，新增资本至少有一亿三、四千万。八年超过了过去的四、五十年。

轻工业仍是这个时期发展的中心。纺织业方面，一九一一年全国有华商纱厂二十家，纱锭约五十万枚，资本一千七百万。一九一九年增至三十五家，纱锭六十五万枚。缫丝厂在一九一一年有二百六十多家，到一九一七年增到四百六十余家。面粉工业增长特别迅速。一九一一年全国面粉厂和机器磨坊约有四十家，到一九一九年增至一百二十余家，资本从六百多万元增至四千五百万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面粉畅销至英、法、俄、美和东南亚各地。对外贸易中面粉由战前的入超变为出超。一九一四年入超面粉二百万担，一九一八年即出超二百万担，一九二〇年达到三百多万担，

价值一千七百余万海关两。火柴工业一九一一年全国有厂三十家左右，资本一百八十余万元，到一九一九年增加到九十家，资本达七百余万元。此外，丝织、毛纺织、碾米、卷烟、榨油、造纸、蛋粉、玻璃、肥皂、制革等轻工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重工业在半殖民地国家里是很难得到发展的，但在这一时期，中国的重工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在钢铁冶炼业中，除了原有的汉冶萍公司在一九一四年新建大冶铁厂以外，先后又兴办了五个钢铁厂。各地这时还兴办了许多采铁的矿场。采煤工业这时期有更多的新公司成立。全国华资机器煤矿的年产量在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九年间，由八十余万吨增至三百三十余万吨。

资本主义势力进一步深入农村，农产品商品化继续发展，出现了一些专门生产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区。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农村加工手工业逐渐兴起，各种农业垦殖公司也有了发展。但资本主义在整个农业经济里是十分微弱的，一些农垦公司名义上是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仍是出租土地，进行封建剥削。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也加快了，拥有巨额资本的大公司迅速增长。一九一二年资本百万元以上的大公司约二十五个，一九一九年增加到四十三个。拥有总资本一千二百万元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和资本达一千五百万元港币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是这个时期出现和形成的。银行资本也大为发展，如中国、交通、上海商业储蓄、金城、中国实业等银行各拥有几千万以至亿元以上资产。同时，近代工业的分布区域也扩大了。一九一一年前，

绝大多数工厂集中在沿海沿江少数几个通商口岸。至一九一九年，全国除边远地区外，内地各省都有了十几个至几十个近代工业厂矿，形成了无锡、济南等几个工业城市。

在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依然没有改变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点。第一，近代工业的发展，主要还是在轻工业方面，重工业的基础非常薄弱，机器制造工业几乎还没有建立，机器设备仍依靠外国进口。第二，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外国资本仍然大大超过本国资本。钢铁生产方面，日本资本直接和间接地控制了全国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九十四。采煤业方面，外国资本直接和间接地控制了全国机器采煤的百分之七十五。在纺织业中，外国纺织厂占有百分之四十六的纱锭数和百分之五十九的布机数。十分明显，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依然受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压迫和控制。第三，封建经济在全国经济中仍占绝对优势，许多资本主义企业与封建经济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高额的封建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常使一部分工业资本转向购买土地或放高利贷，许多资本家仍拥有封建地产和当铺、钱庄等高利贷商号。中国的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买办资产阶级的实力迅速增强。许多军阀、官僚、买办大量向企业投资，他们借助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扶持，很快形成了一批以大银行为中心的买办资本集团。例如，上海的“江浙财阀”集团，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浙江兴业、上海商业储蓄、中国通商等大银行为中心，拥有一批巨额资产的工矿航运企业。此外，广州、香港一带形成了“华南财团”，北方的天津、北京一带也出现买办资本集团。这些大资本集团，与外国资本建立了密切的

联系，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有力工具。买办资产阶级在中国反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这个时期民族工业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是薄弱的。它们依然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虽然也进行过几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可是都显得软弱无力，归于失败。显而易见，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一个软弱的具有妥协性的阶级。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斗争的发展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五、六十万，到一九一九年，产业工人已有二百万人左右。伴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工人自发的反抗斗争大大增加和发展。

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一二年一月到一九一九年五月，共发生了一百三十多次罢工，平均每年十八次。其中一九一七年为二十三次，一九一八年为三十次，一九一九年一月至五月为十九次，后三年的罢工次数逐年增加，反映了工人运动日渐走向高涨。同时，工人罢工的规模、参加人数，都超过了辛亥革命前的罢工斗争。例如一九一五年上海租界人力车工人的罢工和日商上海第五纱厂工人的罢工，一九一六年上海太古、怡和轮船公司船员的罢工，一九一七年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的罢工，一九一八年三新纱厂工人的罢工，每次都有几千工人参加。工人的斗争也较前激烈，如一九一五年湖南乾城大王岩煤矿的罢工工人对军警和地主武装的镇压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一九一六年军阀政府财政部印刷工人在罢工中，也进行

了武装抵抗。这些罢工斗争虽然主要还是为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反抗资本家及其走狗的压迫而进行的自发的经济斗争，但许多罢工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量。一九一六年十一月江南造船所发生的工人反对武装警卫迫害的罢工斗争，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江南造船所是江南制造局分设出来的一个修造轮船的企业，它是由帝国主义分子以及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的买办资产阶级直接控制的。武装警卫是封建买办政权在江南造船所实行反动统治的工具。一天，几个铜工师傅携带工具物料去江边修理兵舰，巡缉队排长李孔林上前搜身，诬指“偷窃”，并殴打工人。全所工人听到后，无不义愤填膺，立即举行罢工，提出“如不撤走巡缉队决不上工！”所方被迫作出决定，即日起取消搜身，并解除李孔林的排长职务。工人反对武装警卫迫害的斗争，直接打击了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也表现了“江南”工人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决心，使工人斗争前进了一步。

中国工人阶级也直接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军阀卖国的政治斗争。一九一五年为了反对“二十一条”而进行的抵制日货运动和一九一六年反对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的斗争，是这一时期两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帝运动。工人阶级成了这两次运动中的主力，并且用同盟罢工把斗争推向高潮。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全国许多地方的工人先后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上海所有日本资本家企业中的中国工人，几乎全部参加了这一斗争。一九一六年，法帝国主义为扩展天津法租界，企图侵占老西开地方，北洋军阀政府已承认法国的要求，天津工人为反对法帝国主义及卖国政府，从十一月

十四日起举行大罢工，参加人数有一千四百多名，法国所办的工厂企业的中国工人一律罢工。连受雇于法帝国主义分子家的中国女佣工也纷纷辞退，有的帝国主义分子妄图用高额工资进行收买，说什么每月增薪至四十元。中国女佣工义正词严地表示：“中国人齐心，不与你们作工，漫说每月给我四十块钱，就是给我四百块，我也不能留在这里。”^①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次罢工得到了全国各界的声援，坚持了五、六个月，使法帝国主义的阴谋不能得逞，表明了工人阶级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坚决的力量。

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及其反抗斗争的发展，为迎接新时代的曙光的到来作了准备。列宁曾经指出：“**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②

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其发展

毛主席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③这场斗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已进行了几十年。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把他们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一时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哲学、历史、小说

① 陈铁卿，《天津反抗法帝强占老西开资料》，《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八年第五期，第六十四页。

② 《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二八页。

③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五七页。

等著作，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到一九〇四年译成中文的西方社会学说书籍就有二百多种。到一九一一年翻译出版的小说就有几百种。著名的资产阶级文学家莎士比亚、雨果、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也陆续翻译出版。

孙中山创立的旧三民主义学说，是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代表，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文化中较有影响的部分。

在史学方面，资产阶级开始用社会进化论观点批判封建旧史学，提出建立新史学的主张。出版了若干本用进化论观点写成的历史教科书。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称《中国古代史》）等。

在文艺方面，这个时期出现了现代话剧。一九〇七年，一部分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话剧团体“春柳社”，演出了他们自己改编的揭露美洲买卖黑人和种族压迫的罪恶的剧本《黑奴吁天录》，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此后又有人在上海演出《秋瑾》、《徐锡麟》、《猛回头》、《热血》等话剧剧目。

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需要，对孔孟之道三纲五常，曾进行了猛烈的冲击。辛亥革命后在反动派尊孔复古逆流中，由于辛亥革命派在政治上基本上以承认北洋军阀统治前提下来实现他们民主共和的主张，所以批孔远不如同盟会时期有力，连辛亥革命前抨击孔老二最激烈的章太炎，也只是反对孔教而“不诋孔”了。^①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派在这股反动逆流的冲击下偃旗息鼓，败下阵来了。但是，中国人民看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

^① 《章太炎先生致柳教授（翼谋）书》，《史地学报》一卷四期，一九二二年八月

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①一九一五年九月，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陈独秀等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这个杂志自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一九一六年移至北京出版。一九一七年初，资产阶级自由派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图书馆长。以北大文科和《新青年》为中心，发起了一个新的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反对封建旧礼教和旧道德旧教条，反对迷信。《新青年》发表了大量文章，致力于介绍欧洲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想和新科学，批判封建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宣传男女平等和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想，并开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文化的堡垒——孔丘思想。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又提出了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提倡新文学，打倒旧文学的口号。在文学方面也出现了一场革命，对冲击封建旧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个文化运动，虽然批判孔教，并提倡新文学，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它的基本观点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他们的理论武器是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学说到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思想的混合物，因此，如果停止在这个水平上，也不可能给中国革命指出新的出路。

中国人民七十多年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五六页。

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①在“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阵下来，宣告破产了。”^②这说明，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必须有新的思想理论来作指导，才能把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以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一九一七年，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③它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当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时，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正在缓慢地发展着。十月革命给了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很大的鼓舞。站在新文化运动最前列，对封建旧文化批判最有力、最深刻的是文化革命主将鲁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年），他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在这篇小说里，鲁迅怀着深沉的愤怒，对封建宗法制度和维护这个制度的旧礼教，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一—一四六页。

②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五〇——一四五二页。

③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六〇页。

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小说借着狂人的口气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是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最锐利的批判。《狂人日记》是五四反封建文化革命第一声春雷，它揭开了“反对吃人的礼教”的斗争，引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个口号变成群众的革命口号，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新的飞跃，它意味着推翻了两千年来对孔老二思想的迷信。此后，鲁迅在《新青年》上又发表了《孔乙己》、《药》和一些尖锐的杂感文章，象一把把匕首，击中了封建文化思想的要害。鲁迅的作品出色地把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和白话文的新形式结合起来，是革命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不断前进，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新的武器以后，把对孔家店的批判提到了新的高度。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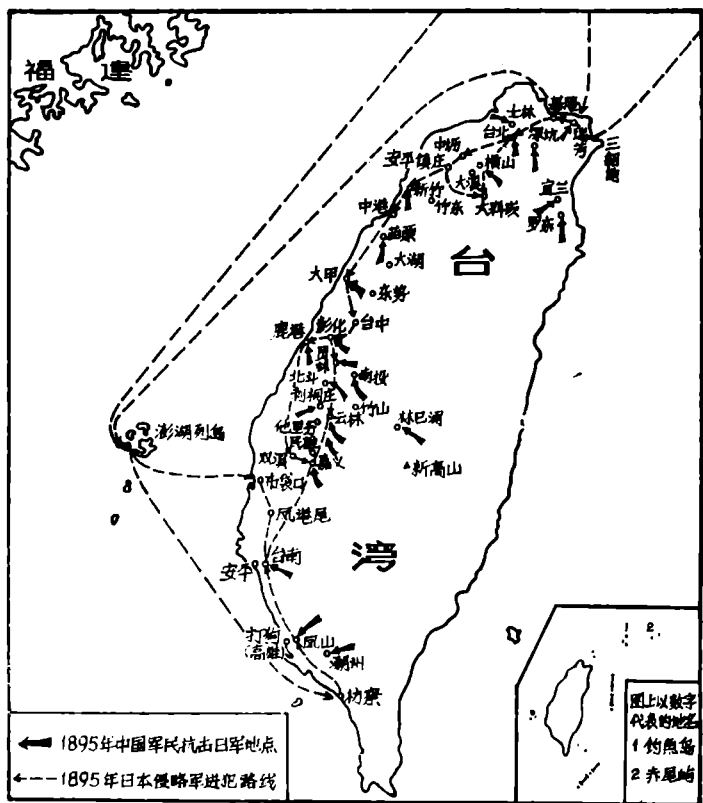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从实践中懂得了十月革命和自己的斗争利益的一致，一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产生。一九一八年十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两篇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时，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五八页。

许多人以为中国成为欧战中的战胜国会给国家带来好处，也跟着协约帝国主义国家一道，高叫“公理战胜强权”。在这种叫喊声中，这两篇文章首先宣传了十月革命，并且勇敢地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曾经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这些文章，在世界观上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十月革命的胜利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终究并不是一回事。历史立刻用严峻的事实纠正了这种误解，迅速提高了人民对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带着辛亥革命不曾有过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姿态，它促使大批赞成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认识到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开始在广大群众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那时起，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马列主义的宣传逐渐加强，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五四运动标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开始。“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代表五四运动这个正确方向的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二一年，新时代的舵手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一支新的文化生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①真是锋芒所向，无不披靡。五四运动标志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告结束，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五八页。



台湾人民抗抗日军侵略形势图

中国近代史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史组编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